

总顾问：王明哲

总主编：张 量



历史不能忘记系列 ①④

台湾抗战

苏 杭◎著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总顾问：王明哲

总主编：张 量



历史不能忘记系列 ⑭

台湾抗战

苏 杭◎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不能忘记系列/张量主编.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 7

ISBN 978-7-5162-0928-8

I. ①历… II. ①张…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IV. ①K265.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1772 号

历史不能忘记系列

张量 主编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吕发成 胡百涛

书名/台湾抗战

作者/苏杭 著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真/63056975 63056983

http://www. npcpub. com

E-mail: mzfz@npcpub. com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32 开 880 毫米×1230 毫米

印张/6. 625 字数/133 千字

版本/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5162-0928-8

定价/370. 00 元 (共 21 本)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 修订版序



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修订再版“历史不能忘记”系列丛书，我感到非常高兴。当年我参加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杨成武同志为第一版作序后，由我为再版作序。虽然水平有限，然出版社坚持，也只好尽力而为了。

1993年以后，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开始猖獗，日本政局也开始出现右倾化的动向，不时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为日本侵华战争涂脂抹粉，企图推卸战争责任的闹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让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牢记这段历史，尤其要让青少年从小就了解、记住这段历史。在我国国内，虽然抗日战争方面的图书资料很多，却难见一套比较系统地对青少年进行抗日战争方面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丛书。1998年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编辑赵卜慧等同志策划了“历史不能忘记”系列丛书。受出版社邀请，我组织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抗日战争研

究》杂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张海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周忠信，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明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主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理事、研究员张量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细菌学专家郭成周以及对抗战史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精心编写了这套丛书。这套丛书收录了大量的史料和图片，有些是首次公之于众的，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如南京大屠杀、日军细菌部队罪行等；讴歌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如八一三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等。该丛书第一版推出12本，于1999年9月出版。丛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当年就名列共青团中央“中国新世纪读书计划第7期新书推荐榜”，并被列为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习图书馆必备书目，荣获第9届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习优秀课外读物三等奖。

近几年，日本政府在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尤其是安倍上台以后，不但矢口否认历史，而且否认对侵略历史表示歉意的“村山谈话”，挑起诸多事端，解禁集体自卫权，对外出售武器，动摇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根基，加快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的亚洲邻国的高度警惕。

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的形式，将每年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4年4月10日，又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国将在纪念日举行空前盛大的阅兵活动，向世界宣示中国维持战后世界秩序的坚定决心。

在此之际，修订再版“历史不能忘记”系列丛书，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担当意识和责任精神。丛书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挖掘和整理最新史学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由初版12册增加到22册，内容更加丰富，事实更加清晰，范围更加广阔，尤其是把儿童抗战、文化抗战、台湾抗战、空军抗战、海军抗战等鲜为人知的抗战史料呈现在读者面前。不难看出策划者把这套丛书作为精品工程精心来打造的良苦用心。

2014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国的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

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的反对外来侵略的彻底胜利，一雪百年屈辱历史，它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

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每一位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美丽中国梦的实现，许多道理需要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人民会铭记这段历史，以史为鉴，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人欺负”的教训，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发奋图强，努力学习和工作，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日益繁荣富强，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央档案馆原馆长

中国档案学会原理事长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原副秘书长

王明哲
2015年5月

► 第一版序

抗日战争，这是个历史性和现实性都很强的话题。

说它具有很强的历史性，那是因为，这场战争的爆发距今毕竟已有62年。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日两国正面向未来，致力于建设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至于有关反映抗日战争的文章和书籍，60多年来则更是难计其数。

说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则是由于：其一，抗日战争毕竟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历次侵华战争中最残酷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最坚决并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场战争。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造成了3500万中国人的伤亡，造成了1000亿美元的直接财产损失，使千百万中国人流离失所。这么一场空前的民族大灾难，无论如何不应该也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其二，抗日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它给我们留下许多血的教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尽管有一时的强弱之别，然而玩火者必自焚，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贫穷、落后就要挨打，就会受人欺辱，只有

国家富足强盛，才能人民安居乐业……所有这些，都将犹如警钟长鸣，时时警示着世人。其三，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中华儿女在这场民族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抗战精神，作为一种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时间再久远，都将永久地熠熠生辉、光芒四射。在和平的年代里，在社会经济建设中，我们仍然需要弘扬这种宝贵的民族精神。其四，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日战争渐渐成为历史，年青的一代只能从历史书籍、从教科书中去了解这场战争的真相了。也正因为如此，在日本，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时地挑起事端，他们或在教科书问题上大做文章，或在日军侵华事实上黑白颠倒，企图篡改历史，误导后人。历史霎时间似乎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为此，要不要把这场战争的本来面貌告诉世人特别是年青的一代，显然成了摆在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有鉴于此，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约请了长期从事抗日战争问题研究、占有大量客观资料的专家学者，历时数载，撰写了这套“历史不能忘记”丛书。丛书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严格尊重史实，凭借事实说话，分《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会战》《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南京大屠杀》《百团大战》《日军细菌战》《中国空军抗战》《中国海军抗战》《中国抗日远征军》

《抗日英烈民族魂》《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纪实》《国际友人与抗日战争》《华北抗日》《华东抗日》《华南抗日》《抗战中的延安》共19个分册，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客观地披露和介绍了抗日战争的爆发背景以及发动经过、侵华日军在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军民抗击侵略者的著名战役、献身于抗战的民族英烈等。其中，一些材料和观点尚属首次公开发表。

日本的一位首相曾经说过：“我们无论怎样健忘，也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可以学习历史，但不能改变历史。”作为一种民族灾难，抗日战争过后的今天，无论是挑起这场战争的加害国还是遭受侵略的被害国，惟有正视事实，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防止悲剧再度发生。而再现历史真相又是问题的逻辑前提。我想，这恐怕正是撰写和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所在吧。

作为抗日战争的亲身经历者，我愿意把这套丛书推荐给需要了解和应当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

杨成武

1999年4月4日

► 目 录

修订版序 / 001

第一版序 / 001

绪言 / 001

甲午战争与台湾的割让 / 003

台湾的地理位置和与大陆的历史渊源 / 003

台湾人自古就是中国人 / 003

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 006

中国最早发现台湾并对其实行有效行政管辖 / 009

《马关条约》与台湾被割让 / 017

甲午战争略记 / 017

赴日谈判及《马关条约》的签订 / 020

台湾人民对割台的反应 / 024

台湾民主国的建立及抗日斗争 / 029

反割台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丘逢甲 / 029

树立教育救国信念 / 029

抗日护台的民族英雄 / 030

台湾民主国的建立 / 032

台湾民主国的抗日斗争 / 034

黑旗军保卫台湾 / 043

刘永福与黑旗军 / 043

黑旗军台湾抗日 / 045

各地抗日游击活动 / 057

1895—1902 年的武装抗日斗争 / 057

北部起义 / 057

“抗日三猛” / 058

1907—1920 年的抗日武装斗争 / 071

蔡清琳领导的北埔起义 / 072

刘乾领导的林圯埔起义 / 073

黄朝等领导的土库起义 / 074

东势角抗日事件 / 075

罗福星领导的苗栗起义 / 076

罗臭头领导的六甲起义 / 080

余清芳领导的噍吧哖起义（西来庵起义） / 080

日据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 085

1931—1937 年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 / 099

基隆港炸弹案 / 099

“众友会”起义 / 100

埔里社事件 / 100

武装抗日运动的成就与教训 / 101

20 世纪 20—30 年代中期的非武装政治抗争 / 102

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 / 102

台湾民众党的建立 / 108

青年学生的抗日斗争 / 112

台湾农工运动 / 116

农民运动 / 116

工人运动 / 120
台湾共产党的组建及开展抗日斗争 / 124
台湾共产党的筹建 / 124
台湾共产党的建立及活动 / 126
台湾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 / 129
台湾共产党后期的活动 / 131
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 / 134
专制独裁的总督体制的建立 / 134
对台湾经济的疯狂掠夺 / 140
殖民同化 文化侵略 / 142
台湾人民在大陆的抗日活动 / 150
台湾义勇队 / 150
东区服务队 / 157
台湾革命同盟会 / 161
台湾人民在大陆坚持抗日复台斗争的意义 / 162
台湾回归祖国的历程 / 167
《开罗宣言》和中国对台湾的接收 / 167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与日本投降 / 167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 / 172
台湾民众抗日大事记 / 177
参考文献 / 198

绪 言

中国的近代史，是中国人民饱受外国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抵御外侮、争取自由独立的泣血的抗争史。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列强奴役的斗争延绵不绝，始终是史不绝书。大陆人民奋起抗争的事迹我们早已是耳熟能详，台湾岛孤悬海外，台湾人民坚贞不屈又慷慨悲壮的50年抗日史更是人们应该了解和深深铭记的。

台湾岛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虽地处祖国大陆的边缘地带，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自16世纪到抗战胜利前的400多年间，据史书记载，台湾岛共遭受外国势力十六次之多的侵袭与占领，犯境者包括日、美、英、法、荷、西等列强。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割台消息传回台湾，广大台湾同胞不甘心再当亡国奴，企盼台湾回归祖国的民族情怀空前高涨。

台湾义军是在日方宣布所谓“全岛平定”的状态下崛起的，他们既无清廷支持，又无外援策应，且装备极为简陋，但义无反顾地殊死抗击着总兵力达7万多人、拥有40余艘军舰的侵台日军。在日军层层进逼、日夜搜剿甚至屠村杀戮的恐怖威胁下，台湾民众自1895—1902年总共进行了长达7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并涌现出许多义军首领。

日本侵占台湾采取的不仅是武装镇压的暴力形式，而且交替使用着剿抚并行的殖民策略。在日资大量拥入台湾，经济掠夺日趋严重的同时，各种奴化与歧视政策和所谓“皇民化”的措施也纷纷亮相出台，企图从民族认同的根基上摧毁台岛人民与大陆的血脉联系。为了抗衡这股恶势力，血管里流淌着中华民族血液的台湾同胞抱着与大陆民众同根同种的执著情感，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局势的变化，开始改变反抗方式，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内继续开展与日本殖民当局的非武装抗争，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日本侵略台湾的50年中，台湾为民族抗日斗争牺牲65万人。广大台湾同胞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可歌可泣英勇事迹，发扬光大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维护国家统一的光荣历史传统，它是千百万台湾同胞用血肉之躯书写在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篇章。历史事实证明，台湾人民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台湾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甲午战争与台湾的割让

台湾的地理位置和与大陆的历史渊源

祖国的宝岛台湾，历史上有多种称呼。秦朝称台湾为“瀛洲”，三国时期称为“夷州”，隋代改为“流求”，宋朝称“毗舍耶”，明初又叫作“东番”，后来则有“鸡笼山”“北港”“笨港”“台湾窝”等诸种称谓。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开始有“台湾”之称。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兵收复台湾，曾改名为“东都”，其子郑经继位时，即更名为“东宁”。清朝定名为“台湾”，并设置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它地处我国东南海域，与福建省隔台湾海峡相望，两地最近距离仅有 130 公里。全省由台湾本岛和周围属岛以及澎湖列岛两大群岛共 88 个岛屿组成，陆地总面积约 3.599 万平方公里，其中台湾本岛为 3.579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97%，是中国第一大岛。

台湾宝岛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大陆架上，与中国大陆有着密不可分的自然地理上的联系。依据国际法院 1969 年欧洲北海大陆架划定案例，“大陆架的主权界限之划定，应符合沿海国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台湾无疑属于中国领土。

◎ 台湾人自古就是中国人

台湾人，不管是几万年前的古人类，还是几千年来早期

住民，他们都与中国大陆住民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至于数百年中移民去台的大陆人，更全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台湾已发掘出的最早古人类为“左镇人”。1972年，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宋文薰和地质系教授林朝启偕日本古生物学会会长鹿间时夫博士到台南县左镇乡菜寮溪发掘古生物化石，顺道参观该地业余采集者郭德铃的收藏时，发现其藏品中有一块数年前采集的化石，他们疑其为人类头骨化石。随后鹿间时夫在日本所做鉴定认为，这是一块距今1万年到3万年的人类头骨右顶骨残片化石。在此期间，考古学者又在同一地点发现古人类左顶骨残片化石。依照考古发掘惯例，该人类依出土地点被命名为“左镇人”。他属于智人阶段、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古人类，这是迄今发现的台湾最早的人类。“左镇人”的体质形态与大陆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柳江人基本相同，也与“山顶洞人”属于同一年代，故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三者间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近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左镇人’是已知由大陆迁徙台湾的最早的古人类，当福建漳州莲花池山距今4万—8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址发现之后，考古学界更具体的推论：‘左镇人’是由闽南沿着已经成陆的‘东山陆桥’长途跋涉到达台湾的。”1998年11月，福建省在台湾海峡海底发现并被命名为“海峡人”的古人类化石，为这种看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继“左镇人”之后，台湾居民是现在的高山族和平埔族的祖先。经过第四冰河期，“左镇人”在台湾岛上消失，之后在数千年前又出现了高山族和平埔族。这些人从何而来？多数人的结论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与大陆人有着共同的血缘、共同的祖先。

台湾学术界认为，台湾早期住民是在六七千年前开始的漫

长时间里先后从大陆移去的南岛语系民族，他们是今天台湾原住民高山族和平埔族的祖先。持这种看法的权威的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凌纯声、陈奇禄、刘益昌、陈婉窈等人。陈奇禄在1984年出版的《民族与文化》一书中从文化的角度指出大陆人与南岛语系民族的关系。他说：南岛语系土著是分批进入台湾的，“他们的移入带来了南岛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文化成分，也即人类学者之所谓文化特质。美国人类学家克娄伯教授研究东南亚文化，发现这地区至少有26种共同的文化特质，值得注意的是这许多东南亚共同的文化特质，绝大部分见于台湾土著之间。凌纯声先生也研究东南亚文化，他在26种之外，增加了另24种，合计50种之多。不但如此，凌先生更指出这些文化特质，大部分也见于古代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因此凌先生认为东南亚的古文化发祥于华南一带，可能为两湖地区。这一学说已渐得到中外学界的支持，则台湾山地土著文化实也为我中华文化的一支流”。刘益昌教授在1998年6月发表在《台湾月刊》“乡土”专栏的《台湾原住民》一文中说：台湾在6500年前左右，出现了新石器人群——大坌坑文化人，“这群人和原先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群有着不同型态的文化，是一步步从旧石器演化而来，还是从大陆东南沿海渡海而来的人群呢？由于海峡两岸同一时期的文化类似，而且华南、东南地区拥有从旧石器向新石器演化的清晰过程，大部分学者主张渡海而来，同时也从文化的特色认为这群人应当是台湾南岛语系民族（也就是今天原住民）的祖先”。在此之后，“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的周婉窈博士，在院长李远哲博士的“热心关照赐助”下，以“台湾历史知识普及”为宗旨，写出《台湾历史图说》一书。他在书中提出：“澳洲学者Perer Bellwood认为南岛语是从台湾扩散（并分化）到东南亚与大洋洲的。这个过程从距

今 6000 年前开始，在公元 9 世纪时抵达新西兰。语言大抵跟着讲话的族群走，因此这个理念也与南岛民族的迁徙息息相关。然而，台湾并不是南岛语的起源地，Bellwood 与一些学者认为南岛语起源于中国东南，但已很少有痕迹可寻。”就连鼓吹“重新寻找”“台湾文化根基”的《台湾代志》一书也说：“从民族文化来看，唐朝以前，福建才有王、谢两氏前往开拓，而当时居住在福建的原住民，亦即南岛语族，与目前台湾的原住民同一祖先……因此在唐朝汉族南下以前，中国的南方民族与台湾实为同一族群，可能是通过中国南方民族（向台湾）传递唐朝文化。”

◎ 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台湾文化不论是在本岛有文字记载之前或以后，都源于大陆，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首先说史前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该族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该民族流动到哪里就必定把其文化带到哪里，反过来说哪里有其文化遗存就说明这个民族曾在哪里生息繁衍过。从前文可知，台湾史前时期的人，基本上都是大陆人的后裔，所以他们的文化自然应当源于大陆。事实就是如此。台湾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为 1968 年在台县长滨乡八仙洞发现的“长滨文化”。主持这次发掘的宋文薰教授指出：“这种石器的组合与在菲律宾及日本等地所发现的旧石器文化不相似，而显然属于大陆系统旧石器时代的砾石砍器文化。”旧石器时代之后是 7000 年前左右到数百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多数学者肯定它与大陆文化的密切关系。如曹永和先生在 1979 年 8 月写的《明郑时期以前之台湾》一文中认为，台湾新石器

时代的文化，“据宋文薰教授等考古学者的研究，可分为早期的粗绳纹陶文化层，中期的圆山文化层、龙山形成期文化层、巨石文化层，晚期的凯达格兰文化层、番仔园期文化层等若干文化层。其文化要素有大陆系统和南洋岛屿系统，而多是来自大陆或迂回中南半岛及南洋诸岛屿而传入台湾。台湾的新石器文化之上层接于近代汉文化层而进入历史时代，又延续至近代”。

至于近几百年来台湾文化，更是以汉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化。自17世纪中叶以降，无论是郑成功祖孙三代还是清政府治台的200余年中，统治者均在台湾大力推行汉文化，在台湾社会实现转型的过程中，台湾文化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另外，在这几百年中，出现几次大陆去台湾的移民潮，数万、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大陆人涌入台澎，他们也将大陆文化尤其是闽越文化带到台湾。经过数代人的辛勤耕耘，中华文化已深植于台湾社会的沃土之中。日本侵占台湾时，虽然搞什么“皇民化运动”千方百计破坏中华文化，灌输大和文化，以将台湾人同化为日本帝国的“忠臣良民”，但遭到台胞的坚决抵制，侵略者的图谋破产。日本投降时广大台胞曾自豪地说：“在日本人强暴的统治下，度过了艰辛苦难的50年之后，我们全体台湾人民终以纯洁的中华血统归还给祖国，以纯洁的爱国心奉献给祖国。”国民党逃台后，尽管在近几十年中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其文化内涵发生一些变化，但台湾文化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主要表现于：

两岸使用共同的汉字、汉语。多少年来，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用汉字这个中华文化的基本细胞，作为交际的工具和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台胞写出的文章、著述，无论是过去的文言体还是时下的白话体，从语言的角度讲，与大陆完全一致。口语也一样，无论是和台胞进行学术交流还是在台北、高

雄作社会交往，话语都是相同的、相通的。一般台胞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才讲他们祖籍地的语言闽南话或客家话，而这两种语言也属中国七大方言之列。

民风民俗是一个民族长时间文化积淀的结果，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前人曰：“风俗之成，或数百年，或数十年，或远至千年。潜移默化，中于人心，而萃为其德，故其所以系于民族者大矣。”台湾民俗可说与大陆相同，尤其与闽越地区更为一致。例如，两岸都过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日常起居、饮食结构、服装式样、审美情趣、房屋建筑式样、消费心理与方式基本一样；民间礼数、待客之道、酒茶文化、婚丧嫁娶之礼等也毫无二致。海峡两岸的人到对方活动，无“人在异乡为异客”之感，而是充满“回家”的感觉。

两岸宗教信仰的主流是一脉相承的。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绝大多数人一样信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仅前两种就有信徒800万之多。各种各样民间的信仰涵盖面更广，且都与祖国大陆有关。台湾民间信仰的神灵，诸如玉皇大帝、三皇五帝、关帝、财神、灶王爷、土地、阎罗、城隍、有应公、义民爷及其他自然和动植物神灵等，都可从祖国大陆的民间信仰中找到他的原形。妈祖、王爷、国姓爷、保生大帝、临水夫人、开漳圣王、清水祖师、三平祖师、广泽尊王、清山王等，其祖宫祖庙大多在福建。如台湾近千座妈祖庙都是莆田湄洲妈祖庙的子孙庙。

台湾传统的思想道德和大陆一样，都以儒家提倡的价值观念为主导。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理，古今之通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儒学的思想精华，不仅在大陆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在台湾也深植于人民心中，且对其言行产生着重大影响。



▲彰化郑成功庙

◎ 中国最早发现台湾并对其实行有效行政管辖

台湾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相传由孔子编选的《尚书》中已有对台湾的记载。该书说其“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台湾府志》对此说法给予了肯定。在此后的许多中国典籍中都有对台湾的记述。如《史记·禅书》中云“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或谓此三神山中之瀛洲即为台湾。《台湾通史·开辟纪》也说，秦始皇曾命徐福求海上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以得长生不老之药，“蓬莱、方丈为日本琉球，而台湾则瀛洲也”。又如，《前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会稽海外有东缙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这里的“东缙”即是台湾。到三国时，吴国丹阳太守沈莹著《临海水土志》则对台湾的风土人情、社会生活等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有学者指出：“汉人之发现台湾之确实年代不得其详，

唯应比在载籍所见之年代更早，是毫无疑问的。”

史书正式记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情况始于230年。《三国志》载：“是年吴主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远征夷州，俘虏数千人而还。”^①从此开始了我国对台澎的经营。其重要活动有如：

隋炀帝三次派人去台湾。一为607年（隋大业三年），派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到台湾“宽慰抚之”；二为608年派朱宽“慰谕”台湾；第三次是610年，炀帝令虎贲中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万人自义安（今广东省潮州）出海至琉球（即台湾），“进至其都”。^②连横认为中国经略台澎始于隋。他提出：“若其（中国）经略台湾，则详见于《隋书·琉球传》也”，隋朝“尝遣虎贲陈棱略澎湖地”，“是为中国经略澎湖之始”。

唐朝，史书沿袭隋代称台湾为“流求”，也写作“琉球”或“留仇”。此时大陆人民已开始自发零散地去台湾开发，如唐元和年间诗人施肩吾，浙江人，曾举族渡海到澎湖定居，并题写了《题澎湖屿》诗一首：

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

黑皮少年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

唐柳宗元任永州司马时，作《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其中说道：“唐制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大小之戒，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厦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而“岭南节度使兼押蕃舶使”，这说明唐时，澎湖、台湾归岭南节度

①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② 《隋书·陈棱传》。

使管辖，已属政府管理了。^①

宋代，台湾仍称为“流求”^②，或写为“琉求”。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泉州知州汪大猷曾遣军民屯住澎湖。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著《诸番志》记载：“泉（州）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

元朝时，加强了对台湾和澎湖的管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宣抚使杨祥、礼部员外郎吴志斗“招谕”台湾；元贞三年（1297年），福建省都镇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率军至台湾，元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管理其庶政，隶属于福建省泉州同安县。《元史·文苑传》中说：“陈信惠，晋江人，曾任澎湖巡检。”

明代，朝廷为了守土抗倭的需要，加强了台澎一线的国防防卫。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明政府恢复了一度废止的澎湖巡检司。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明廷决定增设澎湖游兵，春冬汛守。万历三十年（1602年），明军在福建都司沈有容率领下，主动出击，大败侵台日军，并将其逐出台湾。记述这次战争的《平东蕃记》称：沈有容率军从澎湖抵台湾，倭寇“望见我军，出舟迎敌，将军率诸将士殊死战，无不一当百，贼大败；尽出輜重，投之于海，令我军拾而姑少缓师；我军无一人取其秋毫，战益力，斩馘火攻，须臾而尽。东蕃夷酋（台湾高山族酋长），扶老携幼，竞以壶浆、生鹿犒王师，咸以手加额，德我军以扫荡安辑也”。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明政府下令戍澎湖。明朝末期政府在正式公文上开始使用“台湾”之名。在此期间，明军分别于1604年和1624年，将侵入

① 《柳河东集》卷二六。

② 郑樵：《通志》；赵汝适：《东蕃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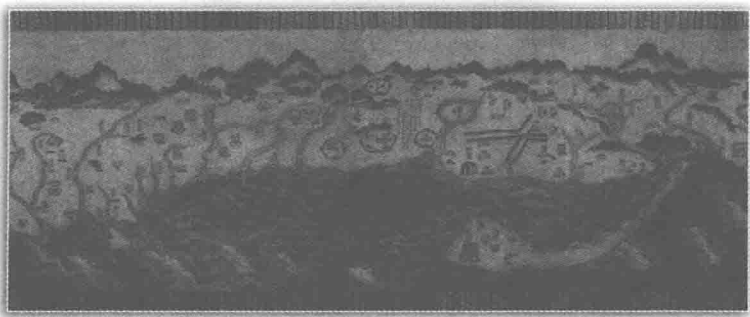
澎湖的荷兰军队驱逐出去，保卫了国家疆土的完整统一。

1624年，荷兰军队入侵台湾，在今台南市建立城堡，并将其势力向北部、东部扩张。1662年2月1日（农历十二月十三日），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主义者并建立政权，台湾进入明郑时期。郑成功将荷兰统治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普罗民遮城即赤嵌城，改称东都明京，根据中国的郡县制度，在台湾设一府两县。府为承天府，以赤嵌城为府治，县一为万年，一为天兴。两县在各自治地查验田园册籍，征纳税银，开展地方行政工作。同时，在澎湖设安抚司，派重兵戍守。郑成功虽奉明为正朔，但他承认“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岛屿上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并耕种这一土地”，所以郑成功收复台湾被连横认为是“台湾复为中国有矣”，称赞其“伟人之功大矣哉！”多少年来广大台湾同胞视之为保护神，直到近年，有的民众在参加环保等社会运动时，还高举着郑成功的塑像，祈求其保佑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

明朝郑成功时期进一步加强了对台澎的治理，到清朝将台湾划为一省，对它的经营治理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入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投降，台湾重新纳入中央政权统一管辖之下。清政府在统一台湾之初，采纳施琅的意见：“台湾虽一岛，实腹地数省之屏蔽”，“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疆”，遂提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从而决意下大力气经营台湾。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下诏：废除明郑时期台湾的行政体制，按清制重设郡县，将台湾置于福建省之下，与厦门同属分巡台厦兵备道。于台湾设置一府，称台湾府，府下管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在军事上，设陆海官军十营，共一万人；置总兵一员，正二品，

归福建水师提督管辖，驻守府城，另设小师副将两员，驻防澎湖、安平；参将两员，驻防南北两路。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政府派员测绘台湾地图，勘丈全境里数。康熙六十年（1721年），增设“巡视台湾监察御使”，改“分巡台厦兵备道”为“分巡台厦道”。雍正元年（1723年），于诸罗县内增设彰化县、淡水厅。雍正五年（1728年），又把“分巡台厦道”改为“分巡台湾道”，把澎湖从台湾县化出，单独成为一厅，定“台湾”为台湾岛的官方统一名称。后来在嘉庆十七年（1809年）、光绪元年（1875年）又增设厅、县，台湾有了二府、八县、四厅。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划台湾为单一行省，任命刘铭传为首任巡抚，行政区扩为台湾、台南、台北三府，领十一县五厅，外加台东直隶州，并将省会从台南迁往台北。



▲大清台湾府全图

1895年台湾被日本占领。1945年日本投降后，按有关国际条约，日本将台湾归还中国，台湾仍被划作中国诸行省中的一个省。从早期大陆移民台湾到历代朝廷对其的经略，大陆人民与台湾原住民一道，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对台湾进行了垦殖开发。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台湾有了巨大发展，并在一些方面走在全国各省之前，使台湾先由粗放农耕和

渔猎社会转型为移垦社会，又由移垦社会转型为定居社会，使台湾由一片草埔，到处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萍”的刀耕火种时期，变成中华文化的文治社会。台湾能有后来的成就，实不应忘先辈的奠基之功！



▲刘铭传

下面仅以明朝郑成功时期和清朝为例，简述大陆对台湾开发所作的巨大贡献。

郑成功为了建立“万世不拔基业”，一收复台湾就着手为其设立各级行政机构，将大陆政治制度搬到台湾，对土著民族基本奉行民族和睦政策，团结其上层人物，维护土著民众的根本利益。在此基础上，他致力发展经济，通过实行“官田”、“文武官田”和“营盘田”制度，建立起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抓政治、经济的同时，郑成功还注意建孔庙、设学校，建立教育体系。在他不幸早逝后，子郑经、孙郑克塽继承其政策，从而促进了台湾社会经济的进步。

明郑时期通过有计划的军事移民和民间自发移民，使台湾的汉族人口迅速增加，到郑氏末期，台湾的汉人已超过 10 万人。他们使用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开垦“文武官田”20271 甲^①、“营盘田”约 15000 甲。由于土地的大量开发和水利的兴修，岛内生产的农产品和相关的手工业品品种相当丰富。粮食作物已有稻、麦等 30 余种，蔬菜 40 多种，水果 20 多种，还有丰富的水产品和家禽家畜。粮食不但可供军民自给，还能“以其有余，供应漳泉，以取其利”。产品的丰富和清廷对台的经济封锁政策，使郑氏政权非常重视海外贸易，当时官方通洋海船就有 60 只，一些文武官员的私船也从事远洋贸易。众多官私商船来往于日本、南亚及东南亚诸国，“每年牟利不可胜数”。郑家祖孙对台湾的经营，为台湾社会转型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郑成功像

清廷对台湾的经营开发情形，正如连横在《台湾通史》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开山抚番，析疆增吏，正经济、筹军防、兴土宜、励教育，纲举目张，百事俱作，而台湾气象一新也。”

从 1683 年清廷收复澎湖、台湾，实现全国统一，到 1894 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台湾确曾有了很大发展，出现“气象

^① 甲是中国台湾农民计算田地面积之单位，换算成公制，1 甲为 9699 平方公尺，即 0.9699 公顷，比 1 町略少。甲这个单位，源于荷兰人统治台湾时的“morgan”，台湾人以台语取其音。

一新”的盛况：人口从十多万增加到300万^①；开垦的土地从几万甲猛增到36万多甲，农业生产从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台湾成为一个大谷仓；行政区如前所述，从一府三县增加到一省三府五厅十一县加台东直隶州；为适应行政区建设，全省大兴土木，修筑府县城池，建起一批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对外贸易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894年的进出口总值就为1865年的5.6倍，达12694495海关两^②，30年中，年平均增长率6.5%，为了商业的需要一批港口应运而生；提倡文教事业，清代在台湾设书院45所、儒学13处、社学51所、书房（私塾）1707所、义学“遍设于府县街村”，共有251人中举人，29人中进士。这不仅意味着中华文化在台湾生根，也显示了台湾文教制度的发展水平与普及程度已逐渐与大陆趋于一致。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沈葆楨、丁日昌、刘铭传等人，致力于洋务运动，推动了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像刘铭传任台湾巡抚的时间虽然不长，在这方面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在台湾购买兵舰，建军械局，自造武器；建基隆到台南的铁路；建立邮局、邮政；设矿务局，负责硫磺等产销业务；提倡种植茶、樟脑等经济作物；设招商局，发展商业；在台北创建马路、电灯、自来水；设新式学校，培育现代人才；等等。其中铁路、邮政局、电灯和自来水“在全国都是走在时代尖端的”。有人指出，由于这些人的努力，台湾“在甲午战争前其近代化程度在全国前列”^③。

① 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7页。

② 海关两，即关平银，又称“关平两”“关银”，系清朝中后期海关所使用的一种记账货币单位，属于虚银两。

③ 《刘铭传与台湾近代化》，载台湾史迹研究会编：《台湾丛谈》，第八章《清代》，幼师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版。

《马关条约》与台湾被割让

◎ 甲午战争略记

由于台湾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是太平洋地区各国海上联系的重要交通枢纽。不光中国东海和南海之间往返的船只从这里通过，从欧洲、非洲、南亚和大洋洲到中国东部沿海的船只也从这里通过。从大西洋、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到日本海的船只一般也经过这里。因此它是日本“海上生命线”的要冲，对日本的国家利益生死攸关。

自明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台湾自然条件的优越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日益显现。于是引起许多侵略者的注意。早期的西班牙、荷兰，鸦片战争后的欧美列强，尤其是近邻日本，数百年来一直觊觎台湾。对中国东南沿海造成很大威胁的倭寇，元朝时已有所活动，明朝时倭寇嚣张一时，倭患大起。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封建军阀丰臣秀吉统一日本。日本岛国的地域特征及资源的贫乏，使丰臣秀吉等军阀决定向南北进行海外扩张，积极推动一切海事活动。这与当时中国对海权的轻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在发动向朝鲜进攻的同时，不断侵扰我辽东半岛，并准备派船队进犯台湾、澎湖。对外扩张的战略意图昭然若揭，但由于明朝加强了沿海的戒备而未能得逞。

明治维新使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日本即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中国和朝鲜是日本的近邻，日本对外扩张

的矛头自然指向这里。1894年4月，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政府军被打败，请求清政府出兵援助。清政府担忧派兵进入朝鲜可能会与日本发生冲突，故对派兵一事迟疑不决。日本政府认为这是他们发动战争的绝好时机，极力引诱清廷出兵。清政府没有识破日本的动机和阴谋，6月，清政府正式决定出兵朝鲜。日本见有可乘之机，随即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与在朝清军形成对峙局面。

东学党问题解决且朝鲜局势稳定后，日本并没有从朝鲜撤军，反而不断增兵，且向朝鲜政府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并限期答复。朝鲜政府无法满足日本的无理要求，日军遂占领朝鲜王宫，胁迫国王，强迫朝鲜政府废除同清政府的条约。朝鲜局势骤然紧张，清政府决定向朝增兵。7月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袭击了清朝向朝运兵的“济远”和“高升”号两艘军舰。“高升”号被击沉，清军700余人遇难。清政府遂向日本宣战。

自1894年（农历甲午年）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后，日军即与中国军队在陆上、海上两个方面进行战斗。清军部署指挥不力，士气又不足，在朝鲜境内的战斗连吃败仗。9月中旬的平壤保卫战中，清军统领叶志超因战斗失利，下令弃城。日第一军也追赶至鸭绿江边。10月24日，日军攻破清军的鸭绿江防线。日军越过江防，拟实现他们占据奉天（即今沈阳）、辽东半岛的计划。奉天有清皇室的祖坟，又是清入关前的政治中心，被视为“根本重地”，故进攻受到清军的拼死抵抗。日第一军进攻奉天的企图遭到挫折。但是日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后，却进展十分顺利，很快就攻下海防要塞旅顺。随后几个月中，数十万清军与数万日军进行了大小数十战，除个别战役外，清军几乎逢战必败。到1895年3月中

旬，日军已占据了辽东半岛大部分地区，直指奉天。中国陆军一路溃败，奉天岌岌可危。对清政府打击最大的还是日军将清廷经营多年、当时在亚洲实力最强的北洋水师完全消灭。



▲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清政府被迫应战。图为1894年8月1日，清朝光绪皇帝发布的宣战谕旨。

在甲午战争开始之际，即1894年9月17日，护送中国陆军的北洋舰队在鸭绿江口大东沟即与偷袭的日舰队发生激战。这次海战中，日舰队遭重创，北洋舰队也损失不小。此后主持

北洋舰队的李鸿章采取了“避战保船”的防御措施。当时北洋舰队有辽东旅顺和山东威海两个基地。当日军在辽东半岛登陆后，北洋舰队无法再进入旅顺港口，只好退到威海。1893年1月20日，日军3.5万人在舰队的掩护下，在威海侧后荣成登陆，并迅速占据威海南北两炮台，使被日舰队阻截在港口内的北洋舰队完全处在日军的两面夹击之下。在日军的猛烈炮轰之下，北洋舰队受到重创。2月17日残存的北洋舰队无奈向日军投降。这支经营数十年，当时是远东最强大的舰队全军覆没。

◎ 赴日谈判及《马关条约》的签订

自朝鲜局势紧张，清军屡战屡败的消息不断传回北京，使光绪皇帝和慈禧大为惶恐。

1888年，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但实际她仍然大权在握。光绪执政后颇想重振国威，希望能有所建树。因此他一再下旨让李鸿章加强备战对付日本。朝中一些大臣也不断上书要求整备军队，取得对日军事上的主动权。当时执掌清廷军事、外交大权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则更寄希望于外交上斡旋来牵制日本，以保和局。李鸿章如此所为，更重要的是他在投慈禧所好。

1894年，正是慈禧六十大寿。她动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和筹办庆典。慈禧的寿诞将近，如果中日一旦开战，庆典将不能如期举行。李鸿章深知慈禧心意，自然力主不战。然而和局未成，战事一起，清军屡屡败北，在慈禧的授意下，朝中求和之声又起。在李鸿章的提议下，清政府决定派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为议和使节赴日谈判。

德璀琳于11月26日到达日本，持李鸿章给日本当时首相伊藤博文的私人信函要与日本首相谈判。日本当时还未达到他们军事上的最大目的，而且更担心由于接受德璀琳会引起列强的介入，从而会使日本处在不利的地位，因此以德璀琳不能作为清政府的正式代表为由而坚决拒绝。战场上不断失利，清政府在1895年1月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作为正式使节赴日进行谈判。2月11日，双方谈判一开始，日本谈判代表伊藤博文即以中国代表“全权不足”为由，拒绝进行谈判。日本认为清政府派出较低级的官员担任谈判代表是中国方面还不能承认处于完全失败地位的表现，清政府也还不能完全接受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因此就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来拖延时间，以期在军事上取得更多的胜利来达到对清政府进行最大勒索的可能。

2月17日，日本政府正式提出和谈的条件：除承认朝鲜独立外，中国要赔偿日本的军费、割让土地，并要求派出全权使节进行谈判。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已经提醒过清政府谈判代表可派恭亲王奕訢或李鸿章作为谈判代表。皇族担任这一屈辱的使命会有损于满族皇帝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决定由李鸿章担任全权使节准备赴日谈判。当时日本已放风，非割地不能言和。李鸿章感到割地事关重大，因此特别奏明光绪皇帝，以决定他能否在谈判时答应割地这一要求。光绪当然不敢做主，还是要就此请示慈禧。慈禧老奸巨猾，知道同意割地必然遭到国内百姓和朝野上下的唾骂，借口有病躲避深宫避不见人，让太监传出话来此事交光绪全权处理。光绪不肯轻易担此骂名，迟迟不肯表态。然而辽东战场的一再失利迫使光绪不得不允李鸿章有允许割地等在内的谈判、签字画押的权利。这样，李鸿章才率随从从天津上船前往日本。3月20日，以李鸿

章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在日本的马关与日本政府的代表伊藤博文开始耻辱的谈判。

早在1894年10月，日本政府内部就开始酝酿如何利用战争向中国勒索的阴谋。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提出的方案就有中国割让台湾予日本的内容。日本决定要求中国割让台湾出于两点考虑：台湾可以作为他们今后进攻中国大陆和南下太平洋的一个落脚点；台湾丰富的资源可以弥补日本物产匮乏的情况，为日本带来巨大的财富。随着战场的胜利，向中国索地赔款的要求在日本更加高涨起来。军部、财相、驻各国大使以及各政党纷纷表达意见，献计献策。一时间要求中国赔偿巨款、割让包括台湾在内中国领土的声浪甚嚣尘上。

谈判在日本进行的情况为外电所报导，逐渐为国内及台湾民众所闻。李鸿章赴日本前后，一些地方大员纷纷电询北京有无割地之事。3月2日，台湾巡抚唐景崧电询军机处有无割地之事，军机处没有正面回答有无日本索台之说，只是让唐景崧加紧戒备，不能大意。实际上当时清政府已决定接受日本提出的在割地赔款基础上才能进行谈判的屈辱条件，光绪也已准备批准给予李鸿章谈判时允许割地之权。但此时又不可对外泄漏，只好搪塞愚弄来自各方的询问。

3月初，两艘日舰诈称法籍船只驶进澎湖天妃港探测进港路线，又登岸侦查清军布防情况。澎湖总兵周振邦竟然设宴招待上岸日军。3月22日，就在中日谈判开始的第三天，台湾南部的恒春及澎湖附近的海面上出现日本兵舰。这是日本准备进攻台湾的一个信号。23日早晨，日军12艘军舰驶进澎湖，澎湖东面的纱帽山、大城北炮台开炮击中其中两舰，日军仓惶败退。不久，日舰卷土重来，清军顽强抵抗。午后，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2000余日军由文良港强行登陆。清军反击不力，

日军登陆成功。次日，日军军舰继续猛攻大城北炮台。双方展开炮战，互有伤亡。午后大城北炮台被击毁。日军陆续攻占岛上各个要塞。25日，日军集中炮火攻击西屿炮台，清军竭力反击，但弹药库被日军炮火击中，终于失去了最后一个要塞。到25日中午时刻，日军已攻占澎湖的妈宫城。三日血战，清军伤亡惨重，澎湖失陷。

澎湖的失守，已使台湾处在危急之中。这时又传来中日停战而台湾不在列的消息。李鸿章赴日谈判后，日本非要中国接受全部条件才能停战。双方争执不下。3月24日，李鸿章在路上遭日本激进分子枪击受伤，这使日方立刻陷入不利境地。日方担心列强借此干预。伊藤博文在看望李鸿章病情时，向他宣布日本决定停战，而台湾不在停战之列。日本政府的这种做法就是为夺取台湾进行铺垫，而不进行全面停战的做法有违当时国际公法。李鸿章虽进行争辩，但是弱国无外交，战败国是没有话语权的。这一消息传回国内，立即引起一片指责之声，台湾的反应尤为强烈。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主要内容为：

- 一、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 三、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
- 四、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可驶入以上各口；
- 五、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时，不按进口货纳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



▲1895年4月，日本威逼战败的清政府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图为谈判现场。

以后又订立《通商行船条约》，承认日本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

《马关条约》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最为屈辱的一个卖国条约。从此，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资本输出阶段。这个条约使中国失去了台湾等大片领土，破坏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社会。

◎ 台湾人民对割台的反应

随着中日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台湾人民已经感到了台湾前途命运岌岌可危。1894年3月30日，中日双方签订的《停战

条约》中，规定台湾不在停战范围之内。此消息一经传到台湾，台湾人民群情激愤。3月31日，台湾巡抚唐景崧奏称：“停战，台不在列，洋行得信喧传，台民愤骇，谓：‘此停战，台独不停，是任倭以全力攻台。台民何辜，致遭歧视？’向臣及林绅维源（督办台湾团防）环问，谓：‘战则俱战，停则俱停。’众口怨咨，一时军民工商无不失望。义勇尤哗。”^①台湾人民既痛恨日本对台湾侵略的野心，又对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愤懑失望。台湾人民寄希望于清政府战胜保台梦想落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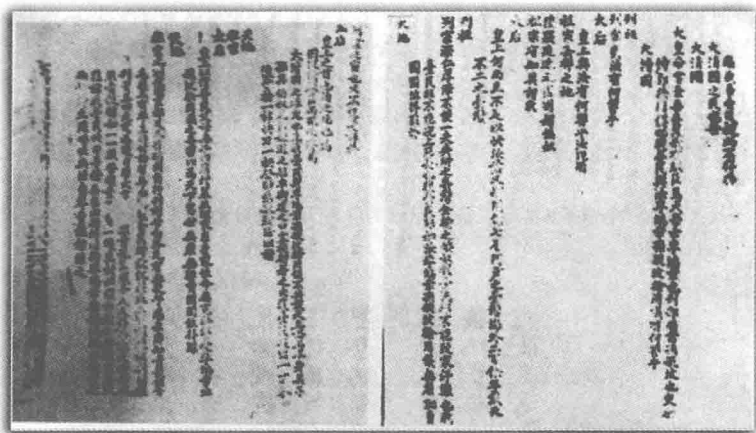
1895年4月17日，在马关春帆楼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当天，割台的消息便传到了台湾。“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至此，台湾绅民皆知让台之事已无可挽回。于是，以丘逢甲为首的台湾绅民，连日会商固守之计。前驻法参赞陈季同提出“民政独立，遥奉正朔，拒敌人”之策。众皆认为：“万国公法有‘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之条，全台生民百数十万，地方二千余里，自立有余。”这是自主保台之议的初步酝酿。

4月19日，唐景崧接总理衙门复电，略谓：“割台系万不得已之举。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又言：“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②此电传出后，台北立即鸣锣罢市，绅民拥入巡抚衙门，哭声震天，表达“万民

^① 《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6），上海书店出版社等2000年版，第381页。

^② 《宫中电报档》，载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3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0、74页。

誓不服倭”的决心，恳请台湾巡抚唐景崧“仍理台事”，盼望驻守台湾的黑旗军刘永福继续“镇守台南”，欲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拼死抗争。唐景崧鉴于台湾绅民强烈反对割台，叠奏电恳，两月之内电陈至二十余次之多。甚谓：“祖宗缔造之艰，史册俱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为存亡，不敢奉皇上之诏。”又谓：“弃地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民为异类，天下恐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且地有尽，敌欲无穷，他国若皆效尤，中国之地可胜割乎？”清廷以和议已有成说，悉置不答。



▲台湾同胞抗议割占台湾书

当时，一些官绅还幻想依靠欧洲各国来保住台湾。张之洞即力主“远交近攻”之策，“以重利求大国力助”。4月22日，他又致电唐景崧，提出“守口聘英将，巡海乞英船”的“庇英自立”之策，当天，唐景崧即与英国驻淡水领事金璋商谈，提出以台归英保护，请其将此请求转达于英国公使欧格讷。他还致电总理衙门称：“方今中外局势已成，非借西法联络各国

无以自立。必先去找疑忌，且必有利与人，始肯助我。”4月27日，正式建议朝廷，将台湾归英国保护，“土地政令仍归中国，以金、煤两矿及茶、脑、磺三项口税酬之”。当然，这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因为此时英国政府已完全站在日本一边，俨然以盟国视之。金伯利即私下对加藤高明说：“英日两国，其利害关系颇为相同。今后日本必将加强其兵力，特别要努力加强海上之力量。……极希望今后两国交往益加亲密，经常保持友谊。果真如此，一朝有事之际，亦可互为帮助。”正由于此，当龚照璠于5月1日会见金伯利商请保台时，金伯利便“坚以办不到辞”之。又电令其驻日代理公使劳瑟向日本外务省辟谣：“近来有英国要占领台湾之谣传，此纯系无稽之谈。英国声明决无占领该岛之意，但此声明请勿登报。”后来，英国政府还将此事之内幕密告日本，并称：“清国已得悉贵国将要求占领台湾岛作为和平条件之一，而欲预先杜绝日本之要求”，“因而断然拒绝其提议”。

求英国不成，又转而求法国。起初龚照璠的态度很乐观。5月1日，他致电唐景崧，告“法有保台澎不让倭意”。2日，又致电总理衙门说：“密商保台澎办法，现台湾吃紧，法已派人护商，先遣员晤台抚，面商机宜，有兵登岸。请电台抚晓谕地方勿警疑。”确实，法国有染指台澎之意，并拉拢西班牙与之联合。但此举遭到了德国的坚决反对。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竟代为日本出谋划策，以抵制法国。他对青木周藏说：“如法兰西或西班牙致送照会，可以明确答复，日本将决心占领台湾及澎湖岛。”由于德国的反对，法国占领台澎的图谋也就无法实现。4日，法国外交部长阿诺托对龚照璠说：“保台一节，已联合西班牙、和（荷）兰，正在筹划，适闻中日新约批准，事势既定，动多掣肘，一切布置，徒费苦心。”借口条约批准

而收回了原先的“保台”许诺。

清政府将台湾让与日本，不仅激起了台湾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也引起了台湾官绅的极度不满，他们纷纷提出抗议。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割台运动迅速在全台范围内兴起。在这场运动中，前工部主事丘逢甲是最重要的领导者。

台湾民主国的建立及抗日斗争

反割台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丘逢甲

丘逢甲（1864—1912），台湾人，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诗人、教育家，抗日护台的民族英雄。原名秉渊，字仙根，号蛰仙、仓海，也称仓海先生，所著诗文常署南武山人或海东遗民。丘氏本为姜尚之后裔，周初封于营丘，因以丘为姓。战国以降，先祖迁徙不定。至南宋末年，二世祖从文天祥抗元，始定居广东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

《马关条约》签订后，为抗击日本对台湾的侵占，丘逢甲亲率义军，与日军抗争。护台失败后，他内渡大陆，广兴新学，以图强国。逝世前，丘逢甲仍不忘光复台湾。丘逢甲至今仍为台湾人民所深深敬仰。



▲爱国士绅丘逢甲

◎ 树立教育救国信念

清同治三年（1864年），丘逢甲出生于台湾苗栗县铜锣湾

一教书先生家。丘逢甲4岁入塾读书，由其父教读。他生性聪颖，6岁能诗，7岁能文，14岁考取秀才，福建巡抚丁日昌很是赏识，赐他为“东宁才子”（东宁即台湾别名）。25岁丘逢甲应福州乡试，中举人，26岁赴京会试，考中进士，成为我国历史上台湾籍有数的著名进士之一。

19世纪晚期，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斗争激烈，我国领土成了帝国主义瓜分的对象。台湾孤悬海外，为我国东南七省门户，各国无不垂涎。在这种背景下，丘逢甲痛感民族、国家祸患重重，日益关心中外事变，接触了西方文化，“慨然有维新之志”，“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恒为大吏陈国家大计”。他虽然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但他深感清王朝腐败无能，无意做官。他认为不如“专意养士讲学，或为民间仗义兴笔，反有意义”。于是在光绪帝接见后，他即告假归台省亲。回到台湾后，福建省台澎道唐景崧对他很赏识，请他出来做官，被他谢绝，他只充任《台湾通志》采访师。1889年，丘逢甲开始走上教育生涯，任台中衡文书院主讲，同时在新竹五峰乡创办山庄书院，不久又任台南府罗山书院、嘉义府崇文书院的主讲。他讲的是新学，要学生在课余勤读报章，关心国事，激发他们的爱国感情和民族意识。

◎ 抗日护台的民族英雄

正当丘逢甲在台湾发展教育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战败，中日签订割让台湾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全国哗然。4月18日，割台消息已经证实，丘逢甲愤然召集台湾乡绅联合致电清政府抗争，要求清廷废约抗战，保卫国土。电文中说：“和议割台，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不

顾身家，无负朝廷……何忍弃之？全台非澎湖之比，何至不能一战？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说割地，皇上亦可以上对祖宗，下对百姓。如倭酋来收台湾，台民惟有开仗！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① 适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等，也联名上书清廷：“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势必勉强支持，至矢亡援绝数千百万生灵尽归糜烂而后已。”“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为皇上赤子，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雠，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隐痛矣。……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并警告说：“睹此全台惨痛情形，岂有不上廑圣虑？但以议者必谓统筹大局，则京畿为重，海疆为轻故耳。不知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雠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此后谁肯为皇上出力乎！大局必有不可问者，不止京畿已也。”^② 他们的上书，字字血泪，爱国爱乡之情溢于言表。

激于义愤，他倾尽家资，在清政府不顾台湾人民死活、台湾人民“无主可依”的情况下组织和率领台湾健儿，组成五万余人的抗日护台大军，与日寇浴血奋战。义军共十营，其中，丘逢甲自带诚字三营、靖字一营、捷字一营；其兄丘先甲分带信字三营；进士陈登元分统良字两营。当时，他奉命防守台北后路的南崁、后垄一线，颇寄希望于驻守台北战略要地的

① 《宫中电报档》，载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3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0、74页。

② 《户部主事叶题雁等呈文》，载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3022），附件一，第39卷，第36页。

清军，认为“但使诸将协心，能与防地共存亡，倭寇虽凶，未必即能全占台省”。他相信，只要台北驻军能够守住，则台北后路的义军尽管力量单薄，也必能坚持到底。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朝廷竟然把台湾一省割给日本。

他与道员林朝栋协守台中，他们于新竹一带与日寇血战二十余昼夜，在牺牲的将领中有不少是他的学生，如姜绍祖（“敢”字营统领）、丘国霖（“诚”字营统领）、徐骧（“捷”字营统领）、吴汤光等烈士。经过浴血奋战，终因弹尽粮绝，丘逢甲于同年7月底，在部将劝谏下，乃挥泪内渡大陆，归返祖籍广东镇平县文福乡淡定村。回乡后他筑“念台精舍”培养后进，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教育事业中。

台湾民主国的建立

台湾绅民一面争取各国援助，一面继续吁恳清廷设法挽回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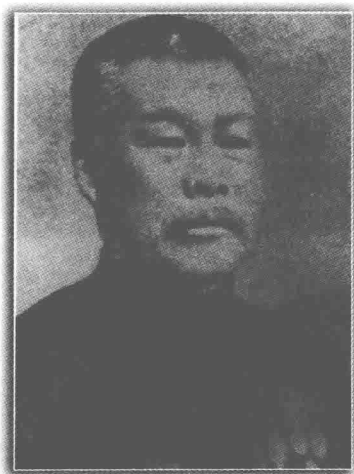
丘逢甲等写下血书，表示“誓不服倭”，并质问朝廷：“皇太后、皇上及众廷臣，倘不乘此将割地一条删除，则是安心弃我台民。台民已矣，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忽行割地议，志士气为塞，刺血三上书，呼天不得宜。”即追忆此事而作。台湾绅民见依靠英、法保台既无成效，呼吁清廷也无结果，不得已于5月15日电总理衙门及各省大吏，其文曰：“台湾属倭，万民不服。叠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16日，唐景崧亦电总理衙门称：台民“愿死守危区，为南洋屏蔽”，

“此乃台民不服属倭，权能自主，其拒倭与中国无涉”。这表明，台湾人民在“事难挽回”的情况下，决心要自主拒日保台了。

台湾绅民和唐景崧的呼吁恳请，不能不使清廷受到震动。先是，《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迫于全国上下强烈反对，“连日纷纷章奏，谓台不可弃，几千万口交腾”，以及“台民誓不从倭，百方呼吁”，即曾电谕李鸿章“再行熟查情形”，“详筹挽回万一之法”。及览5月16日“台民不服属倭，权能自主”之奏，当日又电谕李鸿章“台湾难交情形”，再次命其“熟筹办法”。18日，李鸿章复奏，谓接伊藤博文电告，日本新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已于17日起程赴台，而且“词意甚为决绝”。并恐吓道：“此处恐开衅端，并连累他处，务祈慎重筹办，大局之幸！”所谓“他处”，主要是指京畿和辽沈两处。清廷怕就怕重开衅端，危及京畿和辽沈。所以，李鸿章的恐吓非常有效，清廷也就死心塌地，再也不敢存一丝挽回之想，只要眼前能保持苟安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为了“免致日人借口”，清廷便一面电令唐景崧开缺“来京陛见”，“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内渡”，一面谕李鸿章饬令李经方迅速“前往商办”，以示“中国并无不愿交割之意”。

至此，台湾绅民终于完全绝望。丘逢甲认为，虽然清廷抛弃台民，但台民不能自弃。5月21日，台湾在籍官员工部主事丘逢甲、候补道林朝栋、内阁中书教谕陈儒林等，在台北筹防局聚会。在台湾民众的拥立下，抗日政体“台湾民主国”成立，立年号“永清”（永远奉清朝正朔，永作清朝藩篱之意）。遂铸金印一颗，印文镌刻“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制长方形“蓝地黄虎”旗，“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以示臣服于中国朝廷——大清王朝，誓不臣服倭寇。丘逢甲等共议，推唐景崧出任总统，主持台岛全部的军事防务，重点负责台北地区的设防；刘永福为帮办大臣，负责台南地区的防守抵抗；丘逢甲为

义勇大将军，负责台中地区的防守抵抗。



▲日据时期，日本历任台湾总督共 19 人。图为日本殖民当局首任总督桦山资纪。

5 月 25 日，台北绅民拥至巡抚衙门，由丘逢甲等捧送民主总统印及国旗。唐景崧朝服出，望阙九叩首，北面受任，大哭而入。于是，改年号为“永清”，正式宣告台湾民主国成立。时人有诗云：“竞传唐俭是奇才，局面翻新自主裁。露布已令神鬼泣，玉书曾见凤麟来。”又云：“玉人镌印绶，戎仆制旗常。拥迎动郊野，宣耀照城闾。覆舟得援溺，黔首喜欲狂。”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成立民主国的振奋心情，以及当时集众献印旗的盛况和兴高采烈的动人场面。

台湾民主国的抗日斗争

当台民酝酿自主之际，日本也在做割占台湾的准备。5 月

10日，即烟台换约的第三天，日本政府便将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晋升为大将，任命他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以便使割占台湾迅速成为既成事实。

清廷派李经方赴台交割。5月30日，李经方带道员马建忠、顾问科士达等，乘德国商轮公义号由上海起航，于6月1日抵台湾海面。2日下午2时，日本政府所派台湾民政局局长水野遵至公义号，与李经方商定台湾交割文据。当天深夜，将文据缮成中文和日文两份，先由桦山资纪署名盖章，然后交于李经方，就算交割完毕。

形式上的交割台湾，只是为日本对台湾的军事占领提供一个所谓合法的依据罢了。其实，早在交割的四天前，日军已经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5月29日，日本军舰先向基隆的金包里猛烈炮击，作欲登陆状，以牵制清军的兵力，然后从基隆以东五十里的澳底登陆。于是，台湾武装抗日斗争的帷幕便正式拉开了。

日军进攻台湾的部队有两支：一是总督府直属部队，由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海军大将亲自指挥，包括臼炮中队、要塞炮中队、后备步兵第四联队、临时台湾铁道队等，计将校228人，士卒6494人，役夫5636人，乘马1872匹；一是近卫师团，由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指挥，下辖近卫步兵第一旅团（旅团长川村景明少将）、近卫步兵第二旅团（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及骑兵大队、炮兵联队、工兵大队等，计将校360人，士卒14209人，役夫700人，乘马、驮马、挽马3452匹。近卫师团先驻金州，于5月15日奉命移至营城子，又转旅顺。22日，北白川率部乘14艘舰船由旅顺出发，于26日黄昏时驶至琉球中城湾。桦山资纪一行于24日乘横滨丸自宇品起航，于27日上午也抵琉球中城湾，与北白川的近卫师团会合。桦山即命令近卫师团进兵台湾，“若遇顽民抗

拒，即迅速扫荡，严惩不贷”。当日中午，各舰船起锚驶向台湾。

5月28日傍晚，桦山资纪乘横滨丸驶近淡水海面。提前出发的高千穗丸、浪速丸、八重山丸三舰先已到达此处。据高千穗等舰报告，岸上清军进行抗御，在淡水登陆颇为不利。于是，桦山丸决定在三貂角附近海湾登陆。横滨丸于29日晨6时驶离淡水，至基隆海面后，又与停泊该处的萨摩丸等11艘运兵船东航，以松岛舰为先导，于下午1时抵三貂角湾，并着手进行登陆准备。日军以澳底为登陆地点，由姬路丸、佐仓丸、丰桥丸三船所载之近卫步兵第一旅团第二联队先行登陆，以第一中队为先头部队。澳底港深，可泊巨轮，而清军却视为荒僻之地，仅以总兵曾照喜统带两营驻守。曾军两营皆系新募，“成军甫三日，遇敌不敢战”。下午3时半，日军先头部队开始上岸。双方才交火，曾军死四人，即向西越山而逃。日军一鼓登陆，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澳底。当夜，日军便在澳底宿营。

5月30日黎明，日军以近卫步兵第一旅团为前卫，向西进犯。澳底西北去基隆五十里，沿途重峦叠嶂，山势险峻，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可通，崎岖难行，三貂岭为必经之路。日军炮队只得“将炮身和炮车分解，由士兵分别肩扛”。“驮马由于过度疲劳，或倒卧中途，或坠落涧底，军需均靠人肩运送”，甚至士兵也有“误从悬崖坠落”者。沿途人民都拒绝与敌人合作，日军强令群众搬运物资，并向他们征收粮物，皆“倔强不肯从命。以土人做民夫，中途逃亡者甚众，无奈系绳于其腰间，由士兵监督，鞭打使役”。当询问道路时，多回答“不知”，“欲以小惠结其欢心，反招其轻侮，故不能恩威并行，宁可以威势使之屈服”。日军到达顶双溪后，继续向三貂岭行进。该岭最险峻，却无防兵把守，日军遂不战而占领三貂岭。

唐景崧闻警，命弁目吴国华率粤勇 700 人守三貂岭。吴国华新自广东来，仓促部署，诸事不齐备，于 5 月 30 日上午始率 400 人先行，而三貂岭已为敌所据。同一天，唐景崧复命营官胡连胜、且调顶石角营官陈国柱、金包里营官记名提督陈得胜、狮球岭营官知县包干臣等，各率粤勇数百人赴敌，皆称统领，无所系属。31 日晨，始命刑部主事、督办全台营务处俞明震，亲赴前敌督战，兼料理饷械、电报事宜，并拨亲兵 60 人，派委员三名、武弁六名随往。俞明震乘火车至基隆，住记名提督张兆连大营。31 日下午，吴国华军“至小楚坑，与日军探骑遇，遽开枪，毙敌一，余敌反奔”。吴国华见日军人数甚少，从而追之。适在此时，俞明震遣包干臣率 300 人前来助战。包干臣至小楚坑，见路旁敌尸，遂割取首级。吴国华闻报大怒，撤队下岭。包、吴俱还基隆，俞明震诘以：“奉何人令撤兵？”吴国华自惭，复拔队赴前敌。包干臣以得敌人首级为护符，“竟以大捷斩首无算，赴省城献功”。

6 月 1 日，日军前卫司令官川村景明率近卫步兵第二联队（缺第四、第八中队），宿营于三貂岭之巅。二日拂晓，日军自三貂岭宿营地出发，向瑞芳前进。上午 7 时 50 分，日军便向瑞芳发起了进攻。

先是 6 月 1 日拂晓，广东守备刘燕率炮勇 30 人运格林炮五门至，俞明震急命运至前敌。刘燕以瑞芳西面高地为阵地，列炮扼守。俞明震亦率亲兵 60 人赴前敌督战，拟凭刘燕炮队以固守。2 日晨，张兆连决定进战，吹角列队。即在此时，日军大队已开始进攻，双方遂展开了激战。清兵或“隐于村落的土墙后”，或“潜于茂密树林之间，巧妙地利用地物猛烈射击”。据日方记载：“敌人的抵抗意外顽强，或仅仅以数十名前来逆袭，或单独潜伏房屋竹丛中，待我通过后加以狙击……

我方死伤较多。”在激战中，提督张兆连重伤，记名提督陈得胜战死，余众不支。日军遂两路包围清军炮兵阵地，刘燕督兵抗御，死伤甚众。俞明震率亲兵助战，亦被弹片击伤，被部下抬至狮球岭。瑞芳遂陷。在此战中，日军死伤19人，第二联队长阱并重季大佐被枪弹洞穿军服，侥幸地保存了性命。清军则有30多人战死，30多人被俘。

6月3日晨6时，日本近卫师团又由瑞芳宿营地出发，向基隆进犯。进攻前，北白川能久将部队分为三部：以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及工兵一小队为前卫，沿大道向基隆前进；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缺两个中队）为右翼，继前卫之后，向八斗方向前进，护卫师团之右侧；步兵第二联队第七中队为左翼，在瑞芳附近通向暖暖街的道路上扼守，护卫师团之左侧。上午10时半，日军前卫与清军200余人遭遇，清军略事抵抗后退走。不久，日舰从海上开始向基隆炮击。正中午时，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川村景明指挥八个中队向基隆市街发起猛攻。至下午1时许，忽然阴云密布，大雨倾盆，云雾之中咫尺难辨，日兵浑身淋透，行进困难。双方相持五个小时，直至下午5时，日军始突入市街，于是，清军便与敌人展开了巷战。他们有的持刀剑击杀敌人，有的从民房窗内向敌狙击，直到最后战死。日军在进攻基隆的战斗中，伤亡31人。

在进攻基隆的同时，日军又向狮球岭发动了攻击。狮球岭在基隆市街西北，扼基隆去台北通路，故岭防实为省会之关键；八堵适在其后，当狮球岭之冲。日军欲攻台北，此为必由之路。本来，狮球岭由道员林朝栋率栋字十营驻守。林为抗法名将，曾随刘铭传据此抗法，战功卓著，“所部将士皆前随征之人，地势险要甚悉”，“且训练有法，颇负时望”。他因与张兆连不和，被唐景崧调往台中。时台北绅士十余名皆建议调林

回，“以守为战，事犹可为”。唐景崧虽电令林朝栋回援，然远水不救近火，只得于是日中午先派中军副将黄翼德率护卫营往扎八堵。黄翼德为人狡诈，至八堵即回，谎言：“狮球岭已失，大雨不能扎营，且敌悬六十万金购总统（唐景崧）头，故趋火车急驰回城，防内乱。”唐景崧知其欺罔，而不敢诘问。于是，防守狮球岭的兵力仅知县胡友胜的粤勇四营，实际上已经成为孤军。尽管如此，胡友胜仍督军苦战，坚守不退。一个日本随军记者写道：“我军虽集中射击，而守军却岿然不动。风雨愈急，日近黄昏，枪炮声与风雨声相合，相当凄厉可怕，真不知何时才能攻占！我军再合力攻击，而炮垒后面仅有险峻之栈道相通，前面亦仅可攀，难以发起冲锋。在炮垒与市街之间，是水田与竹丛，且相距甚远，我军架设在炮垒下面的一门山炮亦不能奏效。”日军占领基隆市街后，四面包围了狮球岭。战至下午6时，狮球岭终被日军攻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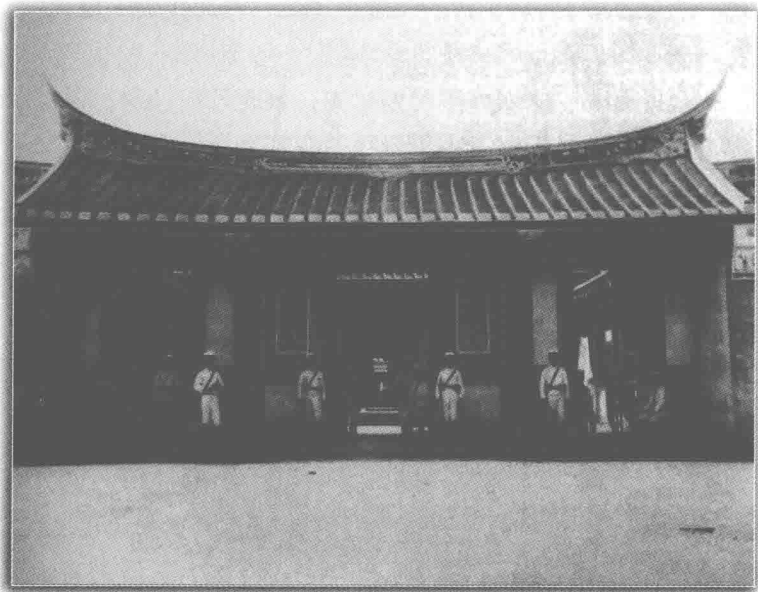
狮球岭既失，省城外围险要尽失，台北危在旦夕。但日军一时尚不明台北情况，又由于日军占领基隆后，有两名清军士兵将火药库点燃爆炸，炸死日军军官1人、士兵20人，炸伤军曹1人、士兵20余人及夫役等100余人，其中重伤17人。同时，港内的水雷尚待扫除。所以，日军未敢贸然立即西犯。6月4日，比志岛义辉率混成支队主力分乘丰桥丸和佐仓丸，由澎湖抵基隆，以增援近卫师团。日本政府所派台湾民政局长水野遵也来到基隆，以便着手筹组殖民机构。

第二天黎明，雨稍歇，台北市街寂然，异常平静。俞明震等见唐景崧，力劝其退守新竹，与林朝栋、刘永福二军联合，以图再举。唐景崧不应。俞明震知事已不可为，退后书密函呈唐曰：“天不佑中国，无可奈何，公心迹可告无罪。惟计不退守新竹，公宜自为计，不可贻笑天下。”实劝唐离台勿落敌手

也。是夜，前敌溃兵入城，台北大乱。未几，巡抚衙门院内火起，唐景崧由抚署后门出，匿于德国洋行。既而微行至沪尾，两天后乘德船鸭打号内渡厦门。

基隆、狮球岭接连失守，溃兵涌入台北城。唐景崧见势不妙，带几名随从自后门溜出，混在难民群中逃出台北，连夜跑至淡水。6月5日，唐景崧挤上已有众多散兵的德国商船，随从搬运八箱白银上船。炮台上兵勇见白银上船，即大哗，开炮阻止，商船中炮，船上十余名士兵被打死。直到白银被卸下，商船才在德国兵舰的护卫下驶离港口。

唐景崧的逃走，使台北一带局势更加混乱。城中难民四处逃散，城内的散兵、难民群起抢劫。溃兵听说府库有存银百万两，争相破门抢劫，为争抢又互相枪击，府库内伏尸数百。



▲台北总督府及守卫日军

日军仅用两周的时间便占领了台北府的大部分地区。桦山资纪抵台北后，即发布告示，表示要坚决镇压抵抗者，内称：“倘若有顽冥不悟，潜伏所在，为害闾阎者，一经查出，即加诛戮。若或有各地居民藏匿败兵，不告诉官府者，家主与败兵同罪，按律重办。”桦山企图用残酷镇压的手段来阻止台湾人民的反抗，当然只是痴心妄想，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6月17日，桦山资纪在台北主持所谓“始政典礼”，宣布台湾总督府正式成立。后来，日本政府便视此日为其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开始，订为“始政纪念日”。

基隆、台北相继沦陷，总统唐景崧潜渡，驻守台中的副总统丘逢甲、林朝栋皆无心再战。6月9日，丘逢甲解散义勇，内渡广东。临行前，他写下了抒发满腔悲愤的《离台诗》六首，内有“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卷土重来未可知……海上谁来建义旗”诸句，仍然对台湾之回归祖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林朝栋也率其一部西渡漳州。余下府县官员也纷纷离台，民主国在北部和中部的政权已名存实亡，这时距唐景崧就任大总统只有十五天。在台南地区，刘永福的黑旗军的抵抗斗争一直持续到10月下旬。

台湾民主国成立后，主要做了三件事：

其一，向中外宣布民主国成立之事，并告知全台。台湾民主国成立的当天，唐景崧即致电总理衙门，同时通电各省大吏，说明成立民主国的初衷。并发布告示，晓谕全台。台湾民主国的这些文献，反复阐明一个意思：台湾虽然被割让，台湾人民决不会拱手将台让予外族，公议成立“台湾民主国”，御外侮而保台。这是在台湾被清政府弃割的情况下台湾人民采取的一种自保的措施，把它说成是台湾谋求独立是全然的误解。

其二，设置新的机构，并重新任命官员以补内渡官员之

缺。台湾民主国总统下设三个衙门：改布政使司为内务衙门，以刑部主事俞明震主之，对外称内务大臣，其关防文曰“台湾承宣布政总理内务衙门关防”；改筹防局为外务衙门，以前驻法参赞副将陈季同主之，对外称外务大臣，其关防文曰“台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防”；改全台营务处为军务衙门，以礼部主事李秉瑞主之，对外称军务大臣，其关防文曰“台湾军务衙门关防”。诸大臣对内称督办，“所有应办事宜，即着该衙门悉心核议，呈请抚台核夺。其余地方民事，仍由道、府、厅、县照旧办理。抚台于外洋各国称台湾民主国大总统，而于本省文武属员仍照銜相称”。台湾民主国之改官制，主要是迫于当时形势的需要，或改衙门的名称，或对外变换官员的职衔，并不意味着原先的封建衙门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在三个衙门之外，还设立了议院，并拟推举台湾首富太仆寺卿林维源为议长。但林维源并未就议长之职。据载：“设议院，集绅士为议员，众举林维源为议长，辞不就，余亦不出。唯拔贡陈云林、廪生洪文光、街董白其祥数人就职。”所谓议院只是一个空架子，仅有数名议员以撑门面，并未真正成立起来，更谈不上“立法机关”的作用了。再就是割台明文下达后，台湾的府、道、厅、县官员及将领大都内渡，民主国一成立，便立即任命新的官职以填补空缺。这样，台湾抗日的领导体系才得以维持，没有因大批官员内渡而趋于瓦解，对其后台湾的反割台武装斗争起了组织保证的作用。

其三，建立清军与义军联合抗日的新体制。台湾原有的驻军甚少，仅二十余营。战争爆发后，巡抚邵友濂陆续招募新营。清廷又谕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南澳镇总兵刘永福酌带兵勇赴台。旧有新募各勇，“统计当在八十营之数”。唐景崧署台湾巡抚后，对编制义勇的工作甚为重视。他认为：“湘、淮

勇丁到台不服水土，又虞吃紧之际，难于隔海招军，惟有就用台民之一法。”由于清政府饬令在台官员内渡，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台湾镇总兵万国本及统兵官廖得胜、余致廷等先后回到大陆，清军营数大为减少，义军的作用更为突出。民主国成立后，除由全台义军统领丘逢甲统十营义勇外，又任命吴汤兴为台湾府台军统领，统六营义勇。其后，刘永福檄简成功为义军统领，带十一营，协防台南。在当时来说，建立清军与义军的联合体制是一个创造，为台湾的反割台武装斗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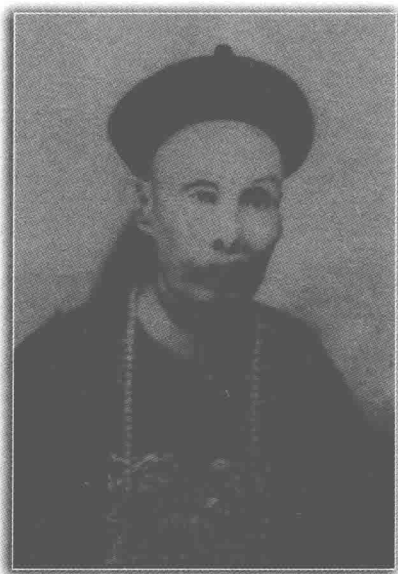
黑旗军保卫台湾

◎ 刘永福与黑旗军

产生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期而又流散出国的黑旗军，是一支农民武装，由于这支武装 1866 年进入越南时，打的是七星黑旗，所以被称为黑旗军。黑旗军在 1884—1885 年的中法战争中多次大败法军，因而中外闻名。

黑旗军的主要领导人刘永福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 年），出生在广东钦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八岁时随父亲流亡到广西上思县，曾当过船工。太平天国起义时，刘永福加入到农民起义的部队中，先后转战多地。1865 年，刘永福率领部下 200 余人到广西南部的安德，参加了在此为王的吴亚忠部。1866 年清政府派大军围攻吴亚忠部，刘永福与吴亚忠在御敌方案上发生分歧，断然率领部下进入越南。刘永福爱兵如子，而且善于谋略，打仗时身先士卒。1873 年，他率领黑旗军大

败法军，战斗后部队日益壮大，达到 2000 余人。此役后法军被迫撤出红河三角洲达十年之久，刘永福也因此被越南阮氏政权加封为三宣副提督。黑旗军此后驻扎在越南兴化、山西、宣光三省境内，扼守红河上游，有力牵制了想经过红河入侵中国的法军。中法战争时期，刘永福率领黑旗军策应清军击败法军，黑旗军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赞誉。中法战争后，刘永福接受清朝政府领导，率领黑旗军撤回祖国境内，在广东任南澳镇总兵。



▲刘永福（1837—1917）。台湾抗日临时政权成立，刘永福被推为大将军，他领导的黑旗军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之一。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刘永福奉命赴台任军务帮办。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的噩讯传来，刘永福愤慨万分，积极备战，加紧练兵。

《马关条约》签署后，清政府命令台湾的驻军和大小官员一律撤回。刘永福在台湾人民抗敌热情的感召下，决定放弃内渡，率领黑旗军誓死守台。唐景崧询问刘永福作何打算，他凛然答复：“与台共存。”考虑到敌众我寡，刘永福派人回广东招兵买马，此后，许多台湾青年也加入到黑旗军中来。台湾民主国抗敌失败后，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与台湾本土的各路义军成为抗倭的主要武装力量。1895年6月7日，台北落入敌手，刘永福的黑旗军成为台湾抗日的中坚力量。鉴于刘永福有誓死保台的决心和抗击法军的威名远播，所以他才能得到台湾各族人民的拥戴，团结一心，浴血杀敌。刘永福曾说：“余之留台，非有他也，为感台民忠义不忍去。”可见，他之所以死守台南，是为国家，而非为一己之利。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在台湾抗日斗争中的义举充分说明他是一位有民族大义的爱国领袖。

◎ 黑旗军台湾抗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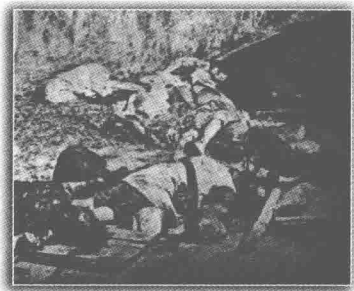
刘永福在台湾民主国成立之初，曾被推举为大将军。由于受到排挤，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只能一直驻扎在台南地区，黑旗军大本营就设在这里。台南的开明士绅在得知台湾民主国抗敌失败的消息后，强烈要求在台南复建台湾民主国，并拥护刘永福扛起保卫台湾的大旗。在这危急时刻，刘永福以台湾民主国镇守台南帮办军务的名义，领导黑旗军继续抗敌保台。

1895年6月28日，刘永福发布《与台民盟约》和《致台民布告》，号召台湾同胞“誓与土地共存亡”。刘永福在文告中还肯定了台民“抗不奉诏，而为自主之国”行动的正义性，并表示了其“甘愿弃职以为”支持台民的正义行动，和“坚心似铁”“年将六十万死不辞”武力保台的抗日决心。为了统一指

挥，有效抗击日军，从6月底到7月上旬，刘永福代表黑旗军以盟主的身份，邀约台南所有抗日将领和台湾民主国留台主要官员，依次进行“盟誓”，并和大家相约结为兄弟，会聚在此，商议抗敌之策。在刘永福的号召下，台南14个不同派系的义军统一到抗敌御侮的大旗下。此后，刘永福一方面继续加强台南的军事力量，一方面派吴彭年率七百黑旗军北上支援新苗军与新楚军。吴彭年到达彰化后，当地民众欢欣鼓舞，纷纷出城迎接。

吴彭年本是浙江余姚人，后定居广东顺德，其人颇具文韬武略，胆识过人。台中战事吃紧，刘永福拟派兵勇驰援，但诸将畏敌不前，吴彭年慷慨请战，为刘永福所器重。至此，黑旗军与其他台湾抗日义军成为保卫台中和台南地区的中坚力量。

随着日军攻陷台北，战火逐渐蔓延到台中。台湾同胞的抗倭斗争也进入了新的阶段。8月中旬，黑旗军的一部在吴彭年率领下与徐骧等台中义军会师于大甲溪。日军攻下苗栗、后陇、通宵等地之后，便开始进攻台湾府城彰化的必经之地大甲溪。大甲溪是台湾中



▲ 抗日作战中牺牲的黑旗军官兵

部重要的河流，上游水流较缓可以徒步涉水而过，而下游仅近海口处可以通竹筏。大甲溪两岸是茂密的竹林，山势险峻，是御敌的天然屏障。吴彭年、徐骧决定在这里伏击日军。8月22日，日军向大甲溪进犯。他们以步兵为前锋，马炮队断后，准备一旦步兵进攻受挫，马炮队则列横阵继续猛攻。战斗开始后，日军弹急如雨，攻势甚猛。吴彭年先避敌锋芒，将黑旗军士兵埋伏于大甲溪南岸，等待敌人到来，伺机发动进攻给其以

重创。日军行至南岸后就遭到设伏于此的黑旗军的痛击，于是狼狈后撤，吴彭年率领部下追击，日军撤至河中，埋伏在北岸竹林中的徐骧，率部自对岸林中冲出，拦腰截杀，向敌射击，顿时杀声震天，日军腹背受敌，或中弹身亡，或溺水而亡。此役毙敌 50 余人，缴获大量枪械。吴彭年收队时，道经海口，又见日军粮船数艘泊港内，便令黑旗军直扑日船，杀死运粮士兵及一些水手，然后夺其粮船。

次日，日军再次猛攻大甲溪。黑旗军福字先锋营首当其冲，与敌交火，徐骧等则率众左右迂回，攻敌两翼。日军不支，开始退却。正在此时，忽闻后路大营陷敌，各军震骇，遂撤出阵地。此乃敌人所用釜底抽薪之诡计。原来，敌人以重金收买了汉奸李维义，他不战弃营而逃。日军自上游渡过大甲溪，绕至义军背后，前敌各军因后路为敌所断，腹背受敌，被迫撤出，大甲溪遂被日军占领。

黑旗军袁熙清部 50 余人在撤退途中遭到围攻。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日军，袁熙清镇静指挥，沉着应战，最后与敌人展开肉搏战，袁熙清及黑旗军 50 余人全部战死。

日军渡过大甲溪后继续向南进逼，先后攻陷葫芦墩、大墩等地。

吴彭年、徐骧、吴汤兴等部被迫退入彰化。为防守台湾府城，刘永福令各军在彰化境内各险要地带扼守。当时吴彭年率黑旗军七星队一营及新楚军四营驻彰化，另外又招募新苗军两营，由吴汤兴统领，徐骧分统。由于可以参加作战的士兵太少，吴彭年请刘永福派援军增援。8 月 27 日，刘永福派王德彪等人率黑旗军一营及早雷营一营，由台南前往彰化支援，与原有部队兵合一处，彰化守军兵力达到 3000 余人，兵力有所增强。有随王德彪黑旗军驻守彰化城北十里大肚溪南岸，吴汤兴

等义军扼守城外八卦山，还有一些屯守城内。

考虑到彰化城东八卦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彰化全城尽收眼底，乃兵家必争之地。吴彭年决定以八卦山为布防重点，想凭此天险阻击日军。

8月27日，日军近卫师团长主力在近卫师团长能久中将和旅团长山根少将率领下，分兵三路直扑彰化。当天夜晚，日军步兵第四联队长内藤正明大佐率第一大队、炮兵第二大队（缺第四中队）及第一联队第二大队第七、第八两个中队趁着夜色的掩护偷渡大肚溪成功。过河后，经昔沙坑、柴梳金，直逼八卦山。同时，日军的炮兵开始炮击黑旗军的正面防线，是日军发起总攻的信号。于是内藤率各中队向八卦山全速前进。

吴汤兴等率领黑旗军进行阻击，双方展开血战。日军当时以六个中队的兵力，从东、西、南三个方面向八卦山炮台发起冲锋，其武器虽精良，并动用了山炮、野炮等重装备，但是黑旗军却利用地形优势对敌军进行了有效抵抗，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日军受阻，进展缓慢。28日晨，日军一部从后山觅得一小路登山，继而抢夺山顶义军炮兵阵地。义军奋起保卫，双方展开肉搏战。吴彭年恐阵地有失，于是率领黑旗军一部由大肚溪前来增援。双方又激战一整天，日军伤亡1000余人，旅团长山根少将在此役中被击毙，中冈大佐、绪方参谋及其他将校亦皆丧命。黑旗军此役也损失较大，李士炳、沈福山先后阵亡。吴汤兴在率领冲锋和争夺山头的战斗中也多次负伤，后不幸中炮身亡。吴汤兴牺牲后，余部守军亦伤亡殆尽，且弹药不得补充，义军遂被迫退出八卦山。

此时西路的吴彭年正在率部督战，见八卦山竖起日旗，便急忙率军回救。军至南坛巷后，吴亲率黑旗军七星队300人夺山。日军猛放排炮，黑旗军伤亡很大，寸步难行。日军自山上

射击，弹落如雨，吴彭年不幸身中数弹，但仍然纵马向前，英勇指挥，亲兵劝其撤退，他坚决不从，最后壮烈殉国。吴彭年捐躯后，黑旗军在王德彪的率领下还在与敌拼杀，后见八卦山起火，炮声滚滚，八卦山被占领，彰化城完全处在敌人的炮火控制下，守军无法抵抗，王德彪被迫决定撤退。在战斗中王德彪和徐骧身负重伤，只率领少数亲兵突围。



▲八卦山乙未保台和平纪念公园存留的日军进攻八卦山情形图

日军遂分兵从东、南、北三门入彰化城。日军进城后野蛮屠杀，男女老幼皆不放过，彰化成了人间地狱，杀戮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

彰化的抗战是整个台中地区最激烈的战斗。黑旗军和其他义军损失惨重，战死的抗日战士近 400 人，还有几位首领。此役后这一带义军元气大伤，无法再组织抵抗。

日军占领彰化后，分三路出动继续南侵：一出西门至鹿港；一出南门至社头；另分一支至云林街。29日，云林被日军占领；30日，日军前锋抵大莆林，进逼嘉义县。整个台中地区都沦入敌手，台南形势十分危急。



▲阵亡的黑旗军

刘永福考虑到当时彰南广大地区即将陷落，日军锋芒又直指嘉义城北的大莆林，为对付来犯之敌，他决定重新部署黑旗军部队（已不足十营）。一方面，他先令王德彪带领自己的亲兵营防守嘉义兼带养伤；另一方面他又令副将杨泗洪率领其所统淮军反攻彰化。大莆林原建有以简大肚为首的义军组织，但是在日军到来之前，简大肚受日军奸细欺骗，以为自动归顺日军，可以求得苟安，于是下令解散起义军，自动悬挂出白旗。然而，日军进入大莆林后，烧杀抢夺，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简大肚悔之不及，决心反正。8月30日，他派出亲信简精华与

杨泗洪取得联系，双方秘密定下杀敌之策。31日夜，简大肚重新召集其旧部与如约而至的杨泗洪一起冲入日军营地。正在酣睡的日军被大量斩杀，余部慌忙夺路逃生，结果又被在蔗田中埋伏的义军拦截追杀，最后逃回北斗的日军仅几十人。9月1日，刘永福命简成功统领义军义民十一营，林义成后率所部赶到，也合并为一个军，刘永福原先所创建制得以重新恢复。这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推动了抗日形势的发展。

大莆林一役日军损失惨重。9月3日，不甘失败的日军调集大队人马来到浊水溪北岸，准备大举反攻。杨泗洪早有防备，故意设计引日军渡溪，待日军渡溪过半，令部下趁势击敌，日军无力还击，大部被歼。此后，日军又多次企图渡溪，都因杨部早有准备而失败。义军的一系列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台民众的抗日斗志，各地义民纷纷前来联系，表示只要大军北上，一定里应外合，共同歼敌。抗日形势为之一振。此时，浊水溪北的日军已成强弩之末，而彰化城内的日军也因瘟疫爆发，患者达五分之二以上。杨泗洪在掌握了这些情况后，果断做出决定，命令各部义军于9月14日同时渡过浊水溪，对溪水北岸的日军首先发动攻击。是日，在各部义军的猛烈反攻下，北斗之日军弃守而逃，接着永靖等地之敌也向彰化退去。义军抓住时机，乘胜追击，日军伤亡惨重，追击战一直打到彰化城下。杨泗洪在追击中发现一股敌人潜藏在一个庙内，就攀上墙头，向敌射击，不幸中弹牺牲。

杨泗洪早年参加抗法斗争，屡立战功，被台湾巡抚刘铭传聘任到台湾教练军队，以副将署台南总兵。日军入侵台湾，杨泗洪又任刘永福黑旗军的协统。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冲杀在前，被誉为“黑虎将军”。为保卫台湾，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杨泗洪牺牲后，刘永福令肖三发统率其部黑旗军，为前敌总指挥；令简成功统帅义军。简成功是简精华之父，骁勇能战。

日军陆路战败，急派十多艘兵舰攻台南各海口，日夜炮击不停，汉奸土匪蠢动响应。刘永福推行联庄法，检举汉奸匪类，地方渐靖。

肖三发认为应该抓住有利战机，一鼓作气，收复彰化，于是连续函请刘永福迅速补充粮饷器械。但是，由于在日本政府压力下，清政府下令封锁沿海口岸，严禁沿海各省接济台湾民众抗日。就连刘永福派人到大陆募集的捐款，也被扣留。厦门、台南间的航船也被禁行。开战以来，刘永福及其黑旗军已苦苦支撑了几个月，府库内已无余粮和枪械弹药，根本无法回应前线的来函。

在大莆林战斗的同时，9月1日，王德彪率七星营及黄荣邦义军2500人、林义成义军3000人、简精华义军数千人，合攻云林县城，日军弃城溃逃。王德彪会合义军追击，将日军冲成两股：一股窜进山林，被林义成部切断退路，予以全歼；另一股退据北斗。2日，苗栗附近义军乘胜收复苗栗，日军逃往彰化。黑旗军和义军近攻获胜，大大鼓舞了台湾军民的抗战热情，踊跃参军。义军准备乘胜收复彰化。

9月4日，肖三发督率各军包围彰化城。彰化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日军拼死抵抗，炮火猛烈，抗日军受阻于日军的猛烈炮火，几次攻击均未得手，只好在彰化城外择地屯驻，包围封锁。抗日军虽取得一些胜利，但缺乏粮饷，幸亏附近庄民蒸饭劳军，抗日军才没有挨饿。

彰化日军连遭打击，士气消沉，无力反击，龟缩城内，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义军组织了多次围攻，紧缩了对彰化的包围。台中附近居民也纷纷组织“联庄”，协同抗敌。一时之

间，台中抗日形势甚好。

但是，黑旗军、义军经过长时间战斗，人力、物力消耗太大，又得不到外援，弹药殆尽。此时台南粮饷军械也即将告罄，刘永福再三派人回内地募集粮饷军械，但因清廷严禁援台，均空手归来，接济无望。外国洋行指使商人到官银票局兑现银，市面大乱。台湾商人持银票索现银更急，市上禁用银票，交易停止。清廷封锁，加上洋行、奸商破坏，使台湾抗日难于支持。围攻彰化的数千军人得不到接济，断粮难熬。

而在这种严重形势下，肖三发与简精华等商议，相持下去决非良策，不如全力攻城，夺回彰化。这时，徐骧从卑南募来高山族健儿 700 余人，组成先锋营，从台南赶来助战。

与此同时，日军的不利形势却在发生着转变。在日本天皇的直接授意下，为了尽快实现“全台占领”的侵略计划，支援近卫师团，日本政府任命高岛之助为台湾副总督，从辽东半岛抽调了第二师团以及国内的后备部队、要塞炮兵及宪兵队等共 2 万多人赶往台湾进行援助。高岛 8 月 30 日接到命令后于次日从东京启程出发，于 11 日到达台北。9 月 16 日，日军成立“南进军司令部”，以台湾副总督高岛之助中将为司令官，大岛久直少将为参谋长，伊地知乃清炮兵中佐、武富邦鼎海军少佐为副参谋长，平岩亲德炮兵少佐为副官部长，小野重勤步兵少佐为管理部长，村井长宽少佐为炮兵部长，三村乙艺工兵少佐为工兵部长。

9 月 23 日，各路义军向彰化发动总攻。义军猛攻彰化，昼夜不停，轮番进攻。然而，日军凭城固守，不出城应战。义军缺乏攻城大炮，仰攻城头，伤亡很大，加上日军枪炮密集，彰化难以攻克。24 日，黄荣邦率部猛攻炮台，不幸中弹牺牲。25 日，林义成率部再战，亦受重伤。其后，日军大队反攻，

肖三发指挥部队力战，受重创。徐骧、简精华率义民往援，由于损失惨重，弹药告竭，实力大减，已无力再攻彰化。从此，义军只得采取守势。

9月29日，彰化城内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接到发自台北南进军司令部的密电，在得知援军到来和三路总攻台南的计划后，他调整了彰化日军部署，向义军发动了反扑。

10月1日，日军分前卫和左右翼三路，大举反攻，肖三发、徐骧、王德标、简精华率各军奋力作战，抗击向刺桐进犯的敌前卫主力，不顾敌优势炮火的疯狂轰炸，坚持了四天之久。同时，义军在西螺镇、土库抵抗右路之敌。当土库变成一片火海时，义军才撤了出来。

日军左路攻打刺桐东面树仔脚一带，激战数小时，义军转移到了云林。敌人随即进攻云林。抗日军勇敢迎击，初战时占了一定上风。后来敌人援兵开到，最终攻陷了云林，林义成等将士壮烈阵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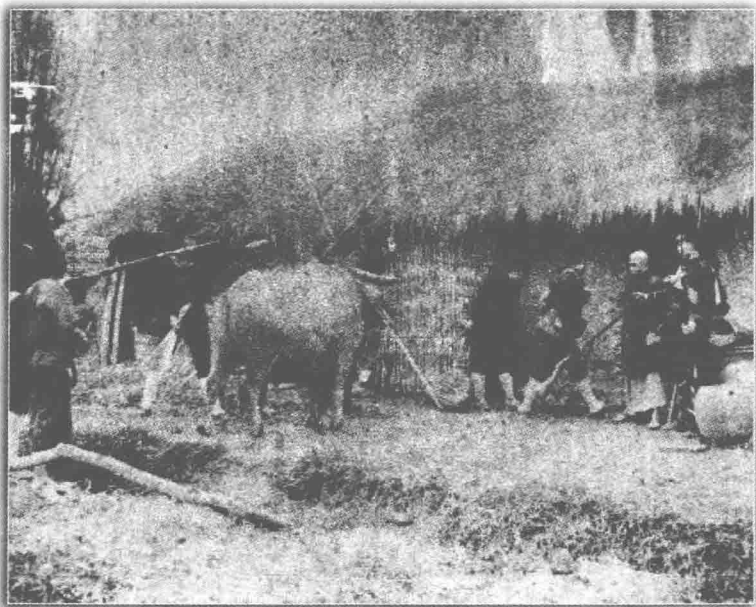
徐骧、简精华奋战击退日军，相持数日，弹尽粮绝。抗日军退守他里雾。7日，日军又来进攻，徐骧率数十人遇敌伏击，徐骧负伤倒地，跃起大呼：“丈夫为国死，可无憾。”众人将其救出。10月8日，日军猛攻大林，肖三发中弹牺牲。经再次激战，抗日军战败，死2000多人。10日，云林、大莆林又相继陷落。

为泄前次大莆林失利之恨，在重新占领台南广大地区后，近卫师团放火焚烧了大莆林。日军一步步向嘉义地区逼进，战事从此向台南地区推进。

此时，在马公湾停泊的日本“吉野”“浪速”等41艘军舰，共计34050名日军大规模地进驻台湾。

嘉义危急，刘永福一面派总兵柏正材率领黑旗军一部增援

嘉义，一面亲自前往嘉义视察，并出谋划策。10月11日，日军总攻嘉义，王德彪和徐骧等在嘉义城外埋设地雷，诱敌深入，炸死日军700余人。日军被迫撤出，又在途中遭遇义军伏击，日近卫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负重伤，不久毙命。这是侵台日军中被击毙的最高将领。日军不甘失败，10月12日又再次对嘉义发动猛攻，并架起大炮疯狂轰击嘉义东北西三城。黑旗军仍奋勇抵抗，“自城墙上进行非常猛烈的射击”。不久，东西两座城门楼皆被轰毁，日军趁机架竹梯登城，黑旗军和防军顽强抵抗。到中午时分，日军已经先后占领了西、北、东三门，并突进城内，嘉义城被敌人攻破。嘉义知县孙育万从南门奔回台南，王德彪、徐骧、柏正材率众与日军展开巷战，不久撤出嘉义退至曾文溪。日军遂占领该城。



▲日本侵占台湾后大肆搜捕台湾抗日义军

嘉义失陷后，日军第二师团所属第四混成旅团在布袋港登陆，集中4万兵力，沿海滨一线南侵，从陆、海两路包围抗日大本营——台南。刘永福遂命驻守在那里的陈罗部进行阻击，日军被迫停停走走。10月11日，日军进至学甲乡附近，遭到在林崑岗率领下嘉义十八堡联合义军的英勇抵抗。64岁的林崑岗是武秀才出身，他痛恨日军对台湾的侵略，不仅捐出全部家产，而且还聚集数千人合力抗敌。10月18日，林崑岗率众据竹蒿山以拒敌，并开炮向日军进行轰击，敌伤亡较大后撤。19日，敌又派重兵日军分三路将山冈围住，然后调来大炮进行轰击，竹蒿山失守。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刘永福于10月19日撤离台南，秘密搭乘英国轮船返回大陆。21日清晨5点，日军开始攻击台南府城的最后一道屏障——安平港。10月21日，日军趁守军内无援助的情况下，攻陷台南。至此，台湾全岛沦陷。

台湾虽然沦陷了，但台湾军民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斗争精神是可歌可泣的。至10月底，抗日军民以土枪土炮抗击了用近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训练有素的日本侵略者达五个月之久，并使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万侵台日军中，在战场上伤亡、因病中途被遣送回国的就达3万多人。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和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也在这次侵台战争中毙命。

在整个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刘永福与其领导的黑旗军表现出的英勇奋战、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鼓舞了台湾民众的抗日斗志。尤其是黑旗军与义军相互信任，协同作战，在整个抗战中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刘永福作为一名非台籍的清军将领，视台湾如家乡，一直战斗到最后，表现了一名中国军人的爱国情怀，也说明了海峡两岸同胞在民族危亡之际，忠勇报国、血浓于水的民族深情。

各地抗日游击活动

1895—1902 年的武装抗日斗争

“台湾民主国”与黑旗军先后失败了，1895 年 10 月 21 日，台南失陷，桦山资纪遂宣布“全台占领”。然而，日本侵略者虽然占领了台湾，但是台湾各族人民兴起的反抗斗争却仍然连续不断。有日本人在其著作中承认：“第一次中日战争后，日本政府在台湾面临着汉族的强力反抗。”从 1895—1902 年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台湾民众的武装抗日斗争蓬勃兴起，并迅速以燎原之势遍及全岛。

◎ 北部起义

1895 年 6 月 17 日，台湾总督府举行所谓的“始政式”。同年末，台湾北部各地抗日首领秘密商议，决定趁总督府庆祝 1896 年元旦松懈之际，以大屯山、观音山山顶的烽火为号，发动起义，夺回台北，驱逐日本殖民者。但不幸起义计划被总督府事先侦得，遂提前起义。

1895 年 12 月 31 日，起义军发起猛烈进攻，包围台北，迫使总督府停止元旦庆祝活动。参加此次起义的民众达 2 万多人，先后击毙日本军警 128 人，伤 58 人。

总督府随即进行报复性的大讨伐。日军“沿村严密搜查房屋，持枪械刀枪抵抗者固不待言，即使未持凶器而有不稳举动者，一概枪杀，凶器全部销毁，其房屋亦一齐烧毁”。据不完全统计，被杀民众达3万以上，仅宜兰一地，“至1月28日止，被诛戮者大约1500人，被焚房屋1万，宜兰平原大半化为灰烬”，状况十分悲惨。在日本殖民者的残酷镇压下，这次北部起义终归失败。

◎ “抗日三猛”

在这一阶段的武装斗争中先后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抗日志士，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林大北、陈秋菊、简大狮、柯铁、林少猫，还有结义抗日的黄国镇“十二虎”等。北起云林，南至淡水溪，抗日义军纷纷兴起，给予日本殖民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被时人称为“抗日三猛”的简大狮、柯铁、林少猫，他们的抗日事迹广泛流传。

一、简大狮

简大狮（？—1900），原名简忠浩，是著名的抗日爱国英雄，台湾抗日义民领袖。祖籍福建南靖县梅林乡，生于台湾淡水县。青年时，他回祖籍省亲，正值家乡人民酝酿开设武馆，便和故里十多个青年一起，聘请江西武术高手为师傅，以简氏宗祠为“学武堂”，习武练拳。

简大狮身材魁梧，学武仅两年，就能举起宗祠门前的石雕雄狮，环宗祠一周，人们夸奖他力大如狮，因此得名简大狮。出师后，曾在漳、厦、石码一带演武献艺。不久，他渡海返回台湾，广收学徒。他生性豪爽好客，行侠仗义，不阿权贵，甚为地方人士敬重。



▲台湾北部义军首领简大狮起义失败后潜回大陆，被清政府引渡给台湾日本当局，于1900年3月22日被日本殖民者杀害。

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出卖了台湾岛。简大狮闻讯后无比愤慨，曾打算进京刺杀负责签约的李鸿章，后被友人劝止。1895年5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台北后，要简大狮带路，被他拒绝。于是日本人就趁简大狮外出时奸杀他母亲、妻子及妹嫂，并杀尽简家子侄十余口，从此简大狮与日寇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他怀着对日寇的深仇大恨，避过日军搜捕，变卖了家产，募集义民1000多人，在台北揭竿抗日。

1895年5月21日，简大狮会集许恂考、卢爷等抗日义军260余人，进攻金包里堡和石门的日本宪兵屯所。后又攻打倒照湖，消灭日军10余人。同年11月27日，简大狮率领600多位义民首次攻打江头，切断台北电话线，转战沪尾街，与日寇赤狗技队巷战于台北天后宫。后因日寇大批援军赶到，义军退入山中。1895年12月31日，简大狮率领义军袭击台北日军，城内台民奋起响应，双方在八甲町展开激烈战斗。由于简大狮提前做了充分准备，战斗初期取得打死打伤日军300多人的战绩。后来日军进行了增援，简大狮率义军遇到很大困难，伤亡增大，而且弹药耗尽，最后被迫撤出战场，起义失败。

1896年春，简大狮命赖乾刺杀日酋佐藤尚太郎。1896年简大狮再次率领义军，由关渡直攻淡水。日军凭借武器优良，射程较远，守备山坡地带。义军则分三路攻击，巧妙绕过敌人猛烈炮火的袭击，杀入敌阵并加以痛击，日军溃败逃入淡水镇内。日军援兵想从淡水包围义军，但到达后看到的只是遍地日军的尸体，义军早已撤离。

1897年2月，简大狮再次联合罗锦春部义军在竹仔山倒镜湖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经过六昼夜的相持，罗锦春战死，简大狮率余部化整为零退入深山。闰三月中旬，简大狮又会合李豹成等义民千人，攻打沪尾及八芝兰街。另以罗锦春等2000人谋攻基隆以作呼应，因事泄未行，主力与日军战于竹仔山，旋退回大屯山。5月8日是《马关条约》规定台民选定中国国籍的最后限期。5月7日夜半，他会同詹振、陈秋菊等率领的另一支抗日义军共5000余人，曾一度攻入台北市區，并占领奎府街、大龙峒等地，与日军相持于天后宫前，连日本台湾总督也只好到处避难。日本人对这次被袭大为震惊，急调增援部

队。经过激烈交火，义军力量相差悬殊，虽然大量杀伤了敌军，简大狮还是率领义军于第二天上午8时有计划地撤出台北市，转战台北附近大屯山中进行游击战争。此战以后，简大狮一时威震台湾，成为日军的心腹大患，非欲除之而后快。为此日军展开多次围剿，但每次都只换来死伤累累的代价。连被日军称为“军神”的乃木希典都对简大狮无可奈何，公认他为令日军最苦恼头疼的人物。此后，日本人只得多方笼络，不敢与简作战。8月，日军突袭大屯山，简大狮率众抗战，右腿受伤，遂退守金包里山中。9月，他派遣曾亨部进攻金包里的阿磅庄，击毙日军少尉松本。12月17日，又会同詹番等300人，夜袭树林口日本警所，持续两天，未能攻下，遂撤出。日军实行封锁政策，简大狮部处境困难，便南下龙潭陂、咸菜瓮一带，攻北埔日本宪兵屯所。

简大狮率领的抗日军，与日军血战百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898年2月，儿玉源太郎出任第四任台湾总督，他一面采取怀柔政策，一面用封锁策略，断绝简大狮义军粮饷军械的来源，使义军难以存活，败退山区少数民族地界。简大狮只好解散部下，内渡回到漳州，避居杨老巷简氏祠堂（今漳州市芗城区新华西路220号），打算回南靖梅林积蓄力量，伺机潜回台湾，以期再战。

1899年，就在简大狮购足武器，准备回台湾继续抗日时，日寇得知简大狮潜回漳州，便要挟清政府，并派人来漳厦，收买厦门提督杨岐珍，要他逮捕简大狮。不久，简大狮在漳州被捕，随即解往厦门。在厦门厅清吏面前，他大义凛然，愤慨陈词：“我简大狮，系台湾清国之民。皇上不得已，以台地割畀日人。日人无礼，屡次至某家寻衅，且奸淫我妻女。我妻死之，我妹死之，我嫂与母死之，一家十余口，仅存子侄数人，

又被杀死。因念此仇不共戴天，曾聚众万余，以与日人为难。然仇者皆系日人，并未毒及清人，故日人虽目我为土匪，而清人则应目我为义民。况自台湾归日，大小官员内渡一空，无一人敢出首倡议，惟我一介小民，犹能聚众万余，血战百次，自谓无负于清……然今事已至此，空言无补，惟望开恩，将我杖毙。生为大清之民，死作大清之鬼，犹感大德。千万勿交日人，死亦不能瞑目。”^① 媚外卖国的厦门厅和漳州府官员，竟把简大狮交给日本侵略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日，简大狮在台湾被日本殖民者杀害。

简大狮惨死愤言，震惊海内，激起全国人民无比愤慨。当时上海《申报》特发表评论：“全台无寸土为中国所有，上天公道，列祖列宗英灵，独留一台湾义民简大狮为中国争气，为全台争气，此中国最有志气之人。”

二、柯铁与“铁国山”抗日武装斗争

1896年6月14日，柯铁自称“奉天征倭镇守台湾铁国山总统”，聚集各路抗日义军在云林的大坪山宣誓起义，号称铁国山。他们决定先将日军牵制在中部地区，然后乘虚分袭南北两路，把日本殖民者赶出台湾。义军首先包围了南投，总督府连忙从台中调来讨伐队增援，义军退守深山。残忍的日军随即在云林大肆烧杀焚掠，在6月18—22日短短的五天里，烧毁4295户房屋，杀戮无辜民众无数，制造了台湾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云林大屠杀”。

日本侵略军占领台湾后虐待降兵、滥杀无辜、强奸妇女、烧毁民居的残暴罪行，加深了台湾同胞的仇恨。各地义民为了保家卫台，奋起抗日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日军只能占领台湾

^① 王晓波主编：《乙未抗日史料汇编》，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西部各城市及若干街市，乡村大多为义民控制，台湾全岛发生了多次义民抗日事件。其中，台湾中部的抗日斗争，当首推云林铁国山的抗日武装斗争。

台湾中部云林县的东边，有一座大山叫大坪顶，是一座天然要塞。柯氏一族居住在此，垦荒为生。家长柯钱有二子，长子柯铁，次子柯合。柯铁臂力过人，善斗，人以柯铁虎称之。柯铁虎仗义好侠，喜打抱不平，远近有纠纷事，多赖以解决。日军侵台，云林县义民以简精华为首领，以大坪顶为抗日基地，此地改称铁国山，意思是坚如钢铁，无人能攻克的地方。

简精华是云林县梅仔坑人，刘永福旧属，在地方上颇有声望。当日军近卫师团南侵时，简精华曾会同西边厝的陈文晃，西螺的廖景琛，他里雾的黄丑等，各招募义民数百人，与日军激战于斗六门外，败后各自分散。简精华为继续抗日，表示愿同柯铁虎等合作。投奔柯铁虎的还有斗六人张吕赤、张大猷、黄才、赖福来等十多名，或能文，或能武，人才济济。大家共推简精华为首领，称九千岁。柯铁虎以下将领 20 多人，义民来投者千余人。

1896 年 6 月 14 日，铁国山大会群雄，丰备牲礼，祭告天地，称“天运”元年。飞檄南北各地，呼吁响应，声势大振。群雄中有原台东守将刘德杓，自台东失陷后，越过高山峻岭，来铁国山参加抗日，众人敬之为军师。

6 月 15 日，铁国山将领率 700 人围攻南投街，切断电信电话线。南投街日军选派敢死兵两人，偷越抗日军包围圈求救，在草鞋墩被当地抗日军捕杀。南投日军又派步兵、宪兵各一人，乘黑夜越山迂回，经彰化抵台中求救。台中日军防务吃紧，只能派出步兵两个小队、山炮两门，经彰化越山，于 7 月 3 日凌晨赶到南投街外，从高处轰击抗日军阵地。被围日军发

动反攻，抗日军抵挡不住山炮的威力，7月3日撤围，返回铁国山。

6月30日，抗日军正在包围南投之际，简精华自率600多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下山，猛攻云林县治。云林守军佐藤少佐仓皇失措。7月1日，进攻云林的抗日军增加到2000多人，把云林县围得水泄不通，逐渐逼近市街。佐藤见防守不住，仓促撤退到大莆林。抗日军光复云林，为台湾抗日战史上最光荣的一次战役。捷报传出，各地抗日军欢欣鼓舞，奋勇杀敌；各地义民纷纷起义，杀死宪兵、警察无数。

那时，驻鹿港日军有守备队500余人，因彰化等地警报频传，故按兵不动，不敢去救援云林。鹿港是引日军进台北城的大汉奸辜显荣的故乡。他看到各地抗日军声势浩大，就在鹿港募集壮丁近千名，编为日军别动队。7月8日，简精华部下刘狮、杨胜率抗日军300人，在雷电交加、大雨滂沱中潜入鹿港街，烧毁日军防御设施。抗日军还攻占了距彰化不远的番婆庄。辜显荣所率之壮丁，一遇抗日军，即激于民族意识，反戈攻击日军。

之后，抗日军见日军大队人马集中云林，知无力久守，于7月13日撤出云林，各路抗日军也徐徐退回铁国山。

日军于6月中旬曾派遣中村中尉，率20多人侦察铁国山地势。柯铁虎率众截击，除逃走两三人外，全部被歼。日军再遣佐藤大队围攻铁国山。铁国山抗日军坚守要塞，不出战，日军难于进攻。台中守备队益田中佐，带步兵一联队进入斗六街，在云林县各地大屠杀五天，对多个村庄遭劫，4900多户受害，被残杀的台胞近3万人。其中受害最惨重的斗六街等地，不论男女老幼，全被杀尽。日寇的滔天罪行，令人发指。

6月29日，同铁国山有密切联系的集集地区，600多位抗日

义民起义，袭击日寇宪兵屯所。宪兵屯所设在神庙内，抗日军爬上屋顶朝下射击，宪兵打开门后夺路逃命，15个宪兵除一人漏网外，全部被围庙的抗日义民歼灭。

日军鉴于6月对云林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使得人心激变，导致云林县被抗日军攻克，因而改用怀柔政策，由总督府派遣古庄内务部长到云林招抚、赈穷、调查户口，设临时保良救恤所于广福庙，并让汉奸辜显荣、陈绍年参加，协助日军招抚工作。铁国山首领简精华，在辜显荣、陈绍年二人的劝降下，10月5日，独自一人下山归顺。

简精华叛离后，刘得杓、黄才、张吕赤、赖福来等首领，共举柯铁虎为铁国山总统，称霸王。柯铁虎抗日坚决，勇敢果断，众人心悦诚服，视同生死，绝不降日。众将领分头负责备战，军饷粮食，皆取于民，几所收获，十抽其一，保护地方治安，无忧于民。10月25日，抗日军向斗六街及各地颁送抗日檄文。

铁国山有抗日军数千人，抗日首领都是英雄豪杰，智勇双全，善于作战。加上铁国山地势险峻，悬崖绝壁参差其间，羊肠小径，道路崎岖，荆棘丛生，易守难攻。如此铁国山，众志成城，威震敌胆。

桦山资纪总督见铁国山声势浩大，下令组织大规模讨伐军，命太田大队长前去征讨。太田受桦山资纪严令，下最大决心，不惜牺牲，势在必克。1896年12月12日，太田率领军、警、宪数千人，直奔铁国山。13日，抗日军在后头仔山包围日军侦察队，歼敌过半。14日在吊境庄、二坪仔庄截击日军，经过激战，终于击退来犯之敌。15日，日军在二坪仔庄南面高地架设大炮两门，掩护各路兵马进军，抗日军在途中埋伏，打死不少日军。24日，日军进攻二坪仔庄，向铁国山发动总

攻。二坪仔庄是进入铁国山必经之地，不幸被日军攻占。抗日军的头道防线及二道防线先后失守，顽强坚守在最后的顶界线，猛烈抵抗。日军援兵源源而至，集中火力炮击铁国山本垒。柯铁虎见敌来势太凶，知难以防守，为避免无谓牺牲，便化整为零，分散退入深山，待机再起。光荣的铁国山，被日军占领。

铁国山失陷了，避入深山的抗日军，并没有停止战斗。他们化装分散下山，潜入各地，召集抗日同志，时时向宪兵屯所和警察派出所游击。1897年一年中，台湾中部发生的抗日游击战，难以计数。

1897年11月间，柯铁虎又聚集抗日义民500多人，占触口山为基地。12月11日，日军集中云林、台东、嘉义各处守备队，加上大炮队，猛攻触口山。抗日军奋起应战，激战中战死12人，伤56人，被俘25人。柯铁虎负伤退入深山。日军凭借猛烈炮火，付出惨重代价，才占领了触口山。

1898年1月，柯铁、刘德杓、林发等，招集抗日军700多人据守大鞍庄。2月中旬，日军以守备步兵第四联队长为讨伐司令，派宪兵将校及以下军官74人参加，编成大中小数队。3月9日集结于林圯埔，11日，从东、西、北三面包围攻击大鞍庄。大鞍庄位于断崖绝壁之上，地势险要。抗日军充分利用地形，上下打击敌人，激战数日，毙敌几十人。但终因火力不足，再次退入深山，日军不敢追赶。柯铁虎时常率部下山，对林圯埔、南投、东势角等地日军频频展开游击战，出没无常，日军防不胜防，战战兢兢，日夜戒严。

1898年5月，儿玉源太郎任台湾总督，后藤新平就任民政长官。他们到任后，检讨过去，认为用武力对付抗日军是劳而无功，决定采用招抚政策。为达到消灭抗日军的目的，不择手

段地进行劝降、欺骗。日本人令汉奸辜显荣会同嘉义林武琛，专门探查柯铁的动静，更利用斗六街吴克明、郑芳香等人，劝诱柯铁出降，许以优厚条件。12月9日，日本人“慨然接受”柯铁虎以战胜者姿态提出的“和议条件”，以遂行其欺骗政策。“和议条件”有：“云林、斗六及其附近，另设一治民局，由台湾人主理”；“将大坪顶山还给柯铁”，准许柯铁等“调理自己兵事，保护人民”；“九一税金，仍准抽收”；“云林境内，民家准用军械，以自防夜间盗贼”；等等。举行“归顺仪式”后，日方一味监视柯铁等人的行动，毫无履行“和议”的诚意，迫害柯铁等人的阴谋也日趋明显。日军借口柯铁等有拥兵造反图谋，明里暗里集结兵力，包围柯铁等人的住处。柯铁被迫，再起反日，无奈人员分散，部署疏少，日臻险境。柯铁遂于1899年10月，离开苦苓脚庄，移居到打猫东顶堡竿蓁村岩窟中。1900年2月9日，病重不治而死。日军听说柯铁已死，喜出望外。随即派出宪兵探查队，四处探访，虽然找到了柯铁栖身的岩窟，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柯铁葬身的地方。后来，柯铁生前好友18人，聚集在其弟柯合宅前，悼念他生前的爱国侠义行为。日军闻讯赶来，众人立即迎战，柯铁之父柯钱战死，其他同志退入龙眼山。

柯铁死后，其旧部时常出没在北斗街、溪湖街附近，有隙即乘袭击宪兵屯所和警察派出所。8月，铁国山抗日旧部张大猷、张吕赤等在触口山坪顶，集聚抗日义民200多人，准备袭击斗六办公署，日军编成警宪混合队来攻，抗日军退入深山。

1901年2月，詹阿瑞、赖阿来、庄录、除阿金等率抗日义民300多人，集结在鹿肚坑、竹仔坑、猴洞坑各处，计划攻击大墩。日军沿抗日军必经之地设防，2月1日，詹阿瑞等走山

间险路，绕过敌设防点，直逼台中大墩街。晚间9点多，乘日军不备，分三路，一路攻卫戍兵院，一路攻北门炮兵队，一路攻大墩街北端。敌布防在外，街内空虚，留守警察，多被击毙，街内火起，秩序大乱。外出日军，见大墩火光冲天，知街内有变，随即撤防回救。抗日军及时转移，日军又扑空，不知抗日军退向何方。

1901年8月15日，原铁国山抗日首领张吕薊、张吕赤、张吕良三兄弟，率抗日义民百余人，袭击北斗办事处沙河仓支署。支署警察人数虽不多，但子弹充足，坚守各门户。抗日军英勇作战，一时难以攻破。彰化、台中敌守备队又来支援，抗日军终因情况不利，退入山中。

1902年，总督府见各地抗日烽火此熄彼起，终无止日，于是再施诱降诡计。儿玉和后藤用尽各种手段来摧毁抗日游击队伍，除了武力镇压外，还实施“糖饴与鞭子”政策，怀柔和诈骗并用。他们开出优厚条件，驱使御用绅士，甜言蜜语，劝诱各地抗日首领出降。待义民上当后，一举杀尽。典型的例子是1902年的大屠杀。

日本人先驱使御用绅士劝降张大猷、张吕良、刘荣、陈提、张雍、张金环、锺佑等数百名义民出降，定于5月25日，同时分别在林杞埔、斗六、崁头厝、西螺、他里雾、林头厝举行“归顺典礼”。日寇定下毒计，事先在各会场周围埋伏机关枪队。典礼开始，日本官员简略致辞后，即匆匆退场。继而由日本武装警官高声宣告：归顺者包藏祸心，私带武器入场，企图反抗政府，本人奉命格杀勿论。话音刚落，机关枪队立即逼近会场，从四周一起扫射。数百抗日义民，赤手空拳，在无法抵抗中饮恨被杀戮，无一生还。苦难的台湾同胞，永远不会忘记这血海深仇。

三、林少猫



▲ 林少猫

林少猫本籍屏东，因看不惯日军到处残杀同胞，弃商投入刘永福麾下，任中军管带。刘永福兵败后，遂投奔台南凤山地区抗日首领郑吉生。郑吉生牺牲后，林少猫重整郑吉生旧部而继续抗日，因他坚强作战，使日军一闻林少猫率队来攻，莫不心惊胆战。《台湾宪兵队史》就形容林少猫胆大无比，雄才大略。《东方兵事纪略》记载：“林少猫虽用土枪，但击无虚发，攀山越岭，聚散前后，飘忽猱腾，每绕倭兵之后，屡次重创倭兵。”1897年4月早晨，林少猫率义民400余人围攻东港日军营房，当天黄昏再率300余人攻击潮州宪兵屯所，9月率义民400余人攻阿猴城宪兵驻屯所，12月袭击内埔办务署，大量日警被击毙。林少猫在高屏一带有多处秘密基地。1898年，从

厦门获取资金和武器秘密返回台湾的林少猫，率领义军在万丹与日军展开数次激战。12月28日，林少猫集联合高屏地区抗日军3000人之众攻打屏东潮州城，围攻州办务署和宪兵队。当时客家义勇军是由林天福任总指挥，与林少猫同心协力作战，声势浩大。在战斗中，潮州办务署，署长濂户晋及巡查，被抗日军砍下头颅，肋骨也被拔去，可见人民对日军有多怨恨。此部义军又乘胜攻入恒春，联合高山族同胞700余人，攻打附近地区的敌人据点和机构。来自万丹大营的宪兵部队，在中途截杀义军。到了30日夜里，日本调动军舰与火力强大大陆战队助战，与义军激战三日。同时29日，林少猫也另率一支1000多人的抗日军攻打恒春，使日军疲于奔命，直至台南日军从车城登陆才解围，因寡不敌众，抗日军就撤退至恒春一带山区。

台湾总督府始终无法消灭林少猫率领的义军。自1898年起，在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主持下，总督府改变策略，开始了大规模的招降活动，用欺骗来对付台湾民众的抗日武装斗争，其核心即展开对台湾抗日义军实施分化瓦解的招降政策。

在总督府的欺骗下，北部的陈秋菊、卢锦春、简大狮等先后“归顺”。至1898年10月，北部地区地区几支主要武装力量相继停止战斗，“归顺”日本殖民者。在中部，1898年12月张大猷等610人归降。在嘉义，黄国镇等均告“归顺”。

1899年5月，总督儿玉源太郎以优厚条件和谈招抚林少猫，约定划地而治。林少猫所要求条件如下：割凤山近郊一地给林少猫，日本不得征税；所辖道路，日本方面不得使用；该地方如有犯罪者，由林少猫处断，林少猫等携带武器日本不得干涉；补偿被剥夺的财产；日本应支給林少猫年金二千。这些

条件皆被日本接纳。林少猫自“归顺”后，即在后壁林从事开垦并经营制糖、酿酒及渔业。他的一切活动均受到日本警察的严密监视。林少猫在当地势力强大，有些商人要把东西搬运到凤山也插上林少猫的旗帜，以便通畅无阻。日本殖民者的既定方针是将所有潜在威胁者一网打尽。在各地讨伐告终后，日军就将屠刀砍向了林少猫。暗杀林少猫的计划失败后，不出多时就违约发动突袭，1902年林少猫在后壁家中猝不及防被袭击诱杀，享年37岁。日军又以大炮猛轰该地区，网罗罪名赶尽杀绝林少猫家人、抗日志士与亲林少猫人士，共计331人，后壁村成为火海。1903年，大仑的溪埔，农民挖出当时抗日义勇军留下的大炮，扛回社中造了炮台，置放在上面供人观看，“二战”末期，大炮就被日本人送去熔解了。

这些历史都是台湾各族人民广泛联合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真实写照，它充分反映了在日本殖民者的残暴屠杀面前，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奋起抵抗的英勇精神。

1907—1920年的抗日武装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日本殖民者残酷镇压下失败了。1903—1906年，抗日斗争一直趋于低潮。随着总督府一系列改革和基础工程的展开，日本在台殖民统治在1900年中期基本确立。经济上，日本资本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台湾，并逐渐延伸到台湾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上，警察势力从城市到乡村，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个角落。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被打破，台湾人民日益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衅。殖民地人民与殖民当局及日本资本之间的矛盾加深并

扩大了，于是，反抗日本殖民主义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的斗争在台湾各地相继爆发，自1907—1915年，先后发生了大小十二次的反殖民武装暴动。

◎ 蔡清琳领导的北埔起义

蔡清琳早先曾任日资贺田组的脑丁募集人，与各隘寮隘勇经常往来，时有鼓动隘勇集体辞职及不满日本殖民者的言论，因而多次受到殖民当局的警告，对日本殖民者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与日俱增。乘隘勇对殖民当局的普遍不满状况，蔡清琳自称“联合复中兴总裁”，四处宣传中国军队不久将登陆进攻新竹，号召人们一齐起来响应，攻陷城池，继而扩及全岛，将日本殖民者赶出台湾。同时，他还与隘勇中的抗日主张者何麦荣、何麦贤等四处联络同志，并联合原住民共同举行暴动。

1907年秋，台湾总督府桃园支厅计划讨伐大嵙荛原住民，命令北埔支厅隘勇配合作战，引起隘勇们的强烈不满和抵制。在此之前，汉族隘勇就对日本殖民者利用台湾汉人与原住民自相残杀表示反对，他们或敷衍了事，或偷偷逃回平地，同时还要求与北埔支厅长谈判，不愿担任隘勇。因此，他们酝酿对这次讨伐原住民的行动进行反抗。

1907年11月14日11时许，蔡清琳领导的北埔起义军100余人 与土著族民众24人会合突袭一百端、长坪头、大窝、加礼山等日本警察所，然后进攻北埔支厅，共杀死日本官吏、警察及其家属57人。暴动队伍乘势向新竹挺进。接到报告后，台湾总督府令新竹厅增派大批日军和警察进行镇压，台湾总督亦增派一中队日军和120人的警察队驰援，起义部队溃散解

体。蔡清琳逃至大隘社原住民头目家中隐蔽，后被日军枪杀，起义群众 81 人被日军当场杀害。12 月 12 日，日本殖民者组成临时法院，何麦贤等九名义士被判死刑。他们“从容走上绞刑架”，英勇就义。

◎ 刘乾领导的林圯埔起义

林圯埔位于台中南投厅，有着丰富的竹林资源，是当地民众赖以生存的经济支柱。他们自由、无偿利用竹林，挖食竹笋，以竹子为原料造纸或编制竹手工艺品为生。

日本殖民侵占台湾之后，殖民当局先是通过林野调查将 1 万余甲竹林强制收归官有，后又设立总督府模范竹林事务所管理相关事务。1908 年 11 月 12 日，总督府又将竹林以极低廉价格售予日本大财阀，其余官有竹林则组织竹林组合管理，严禁台民采伐。这样，当地人民辈辈相传赖以生存的竹林被总督府强制收夺而成为侵略者牟利的工具，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遭到剥夺，自然引起民众的抗争。他们据理力争均被置之不理，私人采伐者更是受到竹林巡视员的无理殴打，人民的不满情绪急剧升高，与日本当局的矛盾日益激化。

这次起义的领导人是台湾南投厅新寮人刘乾。刘乾是从事扶乩行业以占卜算卦为生的相术师，常遭巡查管教和侮辱。他避居深山，结庐拜观音菩萨，广招信徒，在传道中常常宣称：“为避免日本人压迫就不能不杀尽日本人。”宣泄对日本侵略的不满。

1911 年，祖国大陆发生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大陆各省纷纷响应，台湾革命党人也领导台湾各族同胞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组织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目的的起义斗争。1912

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刘乾认为起义时机到来。他首先以庆祝中国革命成功为名，召集南投厅林圯埔一带台湾民众饮酒以示祝贺，并借机调动民众情绪，与众人秘密组织台湾革命党，并被选为领袖。随后他派出得力心腹到各地秘密筹款置械，积极准备起事。不幸起义事泄，日本殖民当局迅速派日警出动进行大搜捕。与此同时，庄民林启祯（又名林庆兴）正因被三菱社日本人所殴也集合一部分庄民密议起事。刘乾因事泄决定提前起义，并被众人推为总指挥。

1912年3月22日起义军设坛盟誓。1912年3月23日黎明，刘乾与林启祯等率百余人猛攻南投林圯埔支厅项林庄的日警派出所，击毙日本警察三名，缴获日警的全部枪械和物资。然后乘胜向林圯埔进发。得知消息后，日方派南投警察所警力野蛮镇压，刘乾等率义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由于敌众我寡，加之武器装备相差悬殊，义军被迫撤退。刘乾率领部队撤至山区，以图再起，但日军紧追不舍，数日之后，义军全被歼灭，刘乾等人被捕。

1912年4月，日本殖民当局在南投林圯埔设立临时法庭，对林圯埔起义进行审判，包括刘乾、林启祯在内的八名义士被判死刑。刘乾等均视死如归，毫无惧色，英勇就义。

◎ 黄朝等领导的土库起义

土库起义的领导者是嘉义厅打猫北堡大埤头庄的黄朝和黄老钳，他们受到祖国辛亥革命和不久前林圯埔事件的影响，共议起义，以图驱逐日本殖民者。

黄朝，台湾嘉义厅人，自幼家里十分贫困，没有上过学，但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黄朝与黄老钳年龄相差很多，但他们

志向相投，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黄朝和黄老钳利用民间宗教信仰，假称他是神道护人，刀枪不入，以祭拜玄天上帝为号召，召集信徒，建立组织。他们声称神意通天，玄天上帝神敕黄朝为“台湾国王”，并且宣传中国军队 100 万人即将登陆台湾，鼓动人民起义响应祖国军队，收复台湾。由于汉奸张龙、张谷水等人告密，事情败露。日警闻讯后立即派出巡查团进行调查，并到黄老钳家进行搜查，命令解散信徒，不许集会。1912 年 6 月 27 日，警察包围黄朝住所，黄朝等率信徒百余人在嘉义土库起义，他奋力砍伤巡查丹崎郡治后被捕。起义终因准备不足、武器落后而失败，参与的信徒及无辜平民被杀者多达 1000 余人。后经台南地方法院审理，黄老钳被处死刑（黄朝死于狱中），张南、苏淀被判无期徒刑，另有 12 人分别被判 12—19 年徒刑。

◎ 东势角抗日事件

1912 年 12 月又有赖来的东势角抗日事件。赖来为苗栗人，素不满日本占领台湾。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与友人谢石金秘密前往大陆。在大陆目睹辛亥革命带来的新气象，深受鼓舞，决心为台湾回归祖国而战。赖来与谢石金潜回台湾，在台中一带秘密进行抗日宣传，招集不满日本统治的同胞，准备起义。1913 年 12 月 1 日夜，赖来召集起义同志，歃血为盟，决心为推翻日本殖民统治而战。次日拂晓，赖来率数十人各带刀枪，潜至日警驻扎的东势角支厅。当时日警尚未起床，赖来挥舞大刀率先冲进支厅，首先杀死值班的日警，其余义众一拥而入，攻击警察的寝室，切断电话，断绝通讯。一些警察被杀，也有一部分警察乘乱携枪避于暗处。他们见义军人数

不多，就开枪射击并反击支厅内的义军。赖来等中弹身亡，余众群龙无首，见警察火力又猛，遂溃散而出。警察乘机追捕，有21人被俘。其中13人被判死刑，余均被判时间不等的徒刑。

◎ 罗福星领导的苗栗起义

罗福星（1884—1914），字东亚，号国权，祖籍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今梅州市蕉岭县）高思乡大地村，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周岁时随其父回到广东原籍。10岁时他再次随其祖父回到出生地，就读于当地的中华学校。由于其祖父曾在台湾修筑铁路，故对台湾感情颇深，并产生了在台湾购置产业的想法。1903年罗福星随其祖父来到台湾，住在新竹苗栗一堡寮庄，并就读于苗栗公学校，因为无法忍受日本人在台湾的暴政而于1905年随其祖父再回广东。他深悉台湾人民所受日本殖民压迫之苦，革命之志随之萌发。

回国途径厦门时，罗福星通过中华学校老师介绍，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到家乡后，罗福星担任小学老师，一边教书，一边宣传革命思想。后来经过友人引导，他结识了黄兴、丘逢甲等人。两年后，他受丘逢甲的委托赴南洋视察侨民教育工作，并在东南亚组织华侨革命力量。1907年春季，罗福星任新加坡中华学校校长，与跟随孙中山在新加坡进行革命活动的胡汉民、林时爽等人结识。次年，他又经引荐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罗福星向孙中山表达了他的革命决心，誓要一切听从孙中山的指挥。

1911年，南北议和成功后，罗福星接到革命党人、北伐

军联团局刘士明的书信，希望他能参与发动台湾的革命义举，罗福星接信后欣喜万分，第二天即离开故乡镇平前往福州。在离家前，罗福星对其妻嘱以后事：万一回不来，则要教育好子女，继承父志。罗福星到福建后，接受了都督孙道仁布置的任务，并带领刘志修、徐金因、吴达江等 11 人到台湾组织革命活动，不久罗福星等即带上受命“考察台湾教育”等事项的公文赴台。



▲罗福星，中国同盟会会员，
发动数次起义，1914 年 3 月
3 日惨遭绞刑，是为苗栗
事件。

1912 年 12 月，罗福星集合“十二同志”到达台湾。罗福星发现，在日本殖民当局的巧取豪夺和苛捐杂税的压榨下，台湾人民生活贫困更甚于以前。由于日警逞威贪财，为非作歹，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台湾民众更是生活在死亡线上。面对“忘我民族、夺我财产、绝我生命”的日本殖民者，亡国之痛

在心头涌动，罗福星决定将自己的命运与台湾的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刘士明的安排和帮助下，罗福星会见了台湾许多革命志士，经过与大家的多次详细讨论，罗福星作出决定：在台湾首先成立“同盟会支部”，对外则称“华氏联络会馆”，随着组织的不断扩大，又以不同的名称发展力量。他们以台北大稻埕为基地，分南北两路进行地下活动。罗福星本人经常往来于台北苗栗之间，通过华民联络会馆黄光枢及台胞谢德春、付清凤、黄员敬等人，以“华民会”“三点会”“同盟会”“革命会”等名义秘密发展组织。他们还特别约定联络暗号，如以“东王”代旅，“西王”代团，“南王”代营，“北王”代队长，“北部酒”代台北，“中部酒”代苗栗，“中中酒”代台中，“南部酒”代台南，“电话”代敢死队，“事情并商”代事破，“店员缺勤”代被捕等。

罗福星以台北的大稻埕为中心，利用会馆、茶栈等出入人多的特点进行掩护，宣传革命，秘密组织革命党，发展抗日组织。罗福星根据当时台湾民众痛恨日本占据台湾并奴役台湾同胞的心情，明确提出“驱逐日人，恢复台湾”的口号。由于罗福星早已参加同盟会并与同盟会诸多领袖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他熟悉、了解台湾的情况，再加上受大陆辛亥革命的影响，台湾同胞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因此，罗福星很快就联络一些骨干，发展组织。几个月的时间，就发展了秘密党员500余人，包括隘勇、巡查补（由台湾人担任的警察）、保长、甲长、铁路员工、邮局员工、医生、教员、公务员等等。同时联络其他各地的抗日人士，诸如台中东势角的赖来、南投的陈阿荣、新竹大湖的张火炉等。罗福星对他们高举义旗、抗日复仇的义举表示赞同，同时又代表同盟会宣示革命宗旨，并就如何组织力量

和他们交换了意见。经过努力，罗福星把这些抗日力量一并纳入其组织，从而做到统一指挥。罗福星还根据台湾日本殖民统治力量强大的特点，提出共和党应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中国革命军的到来，合力驱逐日本统治者出台湾。罗福星的这些做法和口号都是正确的。

1912年一系列的抗日事件引起了日本殖民当局的注意，日本警方对于各种活动大加提防。1913年9月25日，大湖庄黄阿统、汤阿文潜入大湖支厅窃取了一批枪支，警察对此进行了大举搜查。10月8日上午，苗栗的革命党叶水全等40多人在大湖天后宫开会，事先被警察侦知，因遭警察围捕。叶水全等八名革命党人当场被抓，其余逃脱。警察采取连坐的方式追缉革命党人。罗福星闻讯即隐藏在淡水的一农民家中，准备伺机潜渡回大陆。12月18日，罗福星的行踪为警察得知，于半夜包围了他的住处，罗福星不幸被捕。日本警察从他身上搜到革命党的名册以及日记等。当局据此开展了全岛的大检举，有900余人被捕。

1914年2月，总督府在苗栗特设法庭审判罗福星等抗日分子。28日，罗福星等20人以抗日首犯的罪名被判死刑。宣判后，狱史问罗福星，是否对自己的“罪行”有所认识？罗福星坦言道：“我不过行自由平等之权力，不论受何重刑，也不认为自己行为罪恶。”罗福星还在与友人信中说：“余弃故山妻子，驰驱东西，是忧国爱民。就死而埋尸台湾，永为台民纪念；死而纳骨家乡，则永为子孙纪念；背乡离井，倘得大事告成，是永为国家之纪念也。”3月3日，罗福星与其他抗日志士慷慨就义于台北监狱。罗福星视死如归的精神永为后人景仰。罗福星一案牵涉几百人，震动全岛。此次抗日武装起义虽然未得举事即告失败，但是它通过秘密组织、准备相机发动起

义，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武装反日斗争。台湾光复后，台胞在苗栗大湖建成一座“昭忠塔”，专门纪念罗福星烈士。

◎ 罗臭头领导的六甲起义

就在苗栗起义后不到一年，嘉义又爆发了六甲起义。六甲起义的领导者为嘉义厅店仔口支厅南势庄的罗臭头，他是出于痛恨日本殖民统治，誓将日本殖民者逐出台湾，并想为罗福星报仇而起义。1914年4月，罗臭头移居山中，以神明祭拜来招集信徒，号召“将日本人从台湾驱逐出去”。罗臭头定于1913年7月起义。但是，5月5日，罗的部下盗走前大埔派出所枪支，引起日本警察的警惕并展开了严密搜寻，起义被迫提前。5月8日，罗臭头率众袭击六甲地区大坵园、王爷宫派出所，击毙日本警察及官吏多人，沿途民众揭竿而起纷纷响应，手持刀、枪、棍棒积极加入暴动队伍。随后，台南、嘉义的日本警察前来镇压，夜半在王爷宫造林地附近与日警侦察队遭遇，双方展开枪战，起义队伍击毙日警侦察队长野田又雄。终因力量悬殊，罗臭头等人退入深山，自杀身亡，另有八名义士惨遭枪杀，其余被捕。1915年2月12日，台南地方法院判处八名义士死刑。这次起义表明，不甘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着反日的不满情绪，六甲起义给了台湾总督府很大的震动。

◎ 余清芳领导的噍吧哖起义（西来庵起义）

噍吧哖起义是由余清芳、江定、罗俊为首秘密组织的一次抗日起义，又称西来庵起义。噍吧哖是台南山间一个偏僻的地方，风景优美，民风朴实，如同世外桃源。日本侵略者侵占台

湾后，凶焰遍及全岛，噍吧哖惨遭蹂躏。日本人在噍吧哖穷凶极恶，横征暴敛，人民苦不堪言。日本人强购民田，作为官用，人民生计无着，忍无可忍，群谋反抗。

余清芳又名余清风，为台南长治二圆里后乡庄人。17岁时正值日本占据台湾，他即参加抗日义军。抗日失败后，回到家乡。23岁起担任巡查补。余清芳生性豪爽，历游台南、玉里、林庄等地，经常出入各地斋堂，结交甚广。1908年他参加与天地会有渊源的秘密结社“二十八宿会”。1909年他因有对日不满言行，被警察送往“浮浪者收容所”监禁近三年。释放后他一面工作谋生，一面经常往来于台南的西来庵，利用宗教活动结交了在反日上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经人介绍，余清芳结识了罗俊和江定。罗俊是嘉义他里雾人，以行医、教书为生。日本侵占台湾时，参加抗日。抗日失败，渡海前往大陆，在福建等地游历，后隐居于福建天柱岩寺。虽持斋礼佛，但抗日之心未泯。辛亥革命成功，他深受激励。经与人联络，于1914年返回台湾图谋抗日。此时罗俊已是年逾花甲之人，但谈及抗日，依然是志气昂扬，与余清芳一见，两人即决心携手共谋抗日大计。当时约定，罗俊以台湾中北部为中心，宣传抗日，发展组织；余清芳则继续在南部活动，待时机成熟，南北共同举事反抗日本侵略者。

江定是台南楠梓仙溪里竹头琦庄人。日本侵台之后，曾任区长，两年后因得罪日本人，被迫逃亡崛仔山中。江定在山中险峻之处结庐耕殖，并结交周围不满日人的隘勇等数十人，十余年间，一直谋求举事反日。余清芳经人介绍，进入山中访问江定。两人倾吐抗日心声，商定反日起义时，余清芳为统帅，江定为副。余清芳先下山筹集经费、发展组织，寻找时机，江定则继续在山中发展组织、招募志士，一旦余清芳选定时机，

江定即率部队下山协助杀敌。



▲被余清芳起义军夷为平地的南庄派出所

余清芳与罗、江结识后，即积极准备抗日行动。他以台南的西来庵为活动中心，一方面借修筑庵堂的名义广募捐款，一方面向信徒宣传日本侵略者的暴政，声称他受神示，要建立“大明慈悲国”，届时中国要派军队渡海，台湾人只要里应外合即可驱逐日本侵略者。他分发神符、咒文，称信徒如持之，可以刀枪不入。一时间，从之者渐多。而罗俊、江定招募的抗日志士也日渐增多。余清芳见时机已渐成熟，即以“大明慈悲国大元帅”的名义发表谕告，号召台湾民众参加抗日共建台湾国。然而，起义还在酝酿中，总督府对此已经有所觉察，加紧了对台南、台中等地的侦察和警戒，将可疑人物列出名单，由各地警察加以严密监视。1915年5月23日，由基隆驶往厦门的船上，警察发觉被监视的台南人苏东海及其同伴形迹可疑，就将他们扣留。苏东海在拘禁所给员林的同伴写了一封秘信，信中告之形势危险，如果被捕，询问应如何问答，以免矛盾，

等等。但苏东海竟将此信交同监的一个日本妓女带出，结果信落入警察手中。警察根据信中的线索，在台南等地进行了秘密搜查、跟踪和逮捕。

余清芳得知事情泄露，迅速离开西来庵，到山中与江定会合，并通知各地同志紧急备战。罗俊在嘉义与同伴数人突破日人的搜索，进入嘉义山中。日本当局几经调查，渐渐查明余清芳、罗俊、江定是抗日活动的组织者，图画三人头像，分发各地加紧搜捕。6月下旬，日本人得报，有似罗俊的与两人同行，日本当局即出动大批警察在嘉义附近搜查。29日，警察在嘉义竹头传庄附近的山林里发现罗俊及同伴。警察发动袭击，罗俊拼死抵抗，以牙齿咬断一警察的手指，但终于力屈被擒。罗俊被捕后，日本当局更大肆出动警察在各地搜捕抗日志士。余清芳、江定得知警察出动搜查，驻地空虚，自7月上旬起，连续袭击甲仙埔、大丘园、蚊仔脚等派出所，共杀死日本警察34人。8月2日深夜，余清芳、江定再率300余人，袭击噍吧哖支厅，火焚官厅并杀尽日本警察及家眷20余人。



▲台湾爱国者进行武装起义的根据地西来庵

总督安东贞美接报，认为事态严重，下令出动正规军陆军一联队、炮队一小队配合警察部队围攻噍吧哖。抗日义军只有两门小炮，枪械、弹药均严重缺乏，无力阻挡日军的猛烈火力，只好退入山中。日军进入噍吧哖，滥杀无辜百姓作为报复。日军先诱使附近村庄百姓男女老幼集中起来，然后命令他们掘壕。待壕沟掘成，日军即四面包围开枪扫射，致使 3200 余位百姓遭集体屠杀。日军警并大力进行搜山。余清芳、江定见无法聚众坚守，决定暂时分散以避风险。于是二人各奔东西。8 月 21 日，余清芳在台南的山谷间被捕。由于江定率众进入深山，日军屡屡搜山均无所获。于是当局就采取欺骗诱降方式。日本当局派人向江定表示，只要他出降，决不追究。1916 年 4 月，江定听信了日本当局的保证，率 270 余人出山自首。日本当局在受降完毕，突然于深夜出动大批警察将江定等人全部逮捕。当局宣布江定等 43 人要送法庭审判，余下 220 余人不予起诉。然而这 220 余人从未见他们回到家中，据说是遭到警察的秘密处决。日本当局利用此案在全台大肆进行检举，受牵连而逮捕的有近 2000 人。总督府还依据血腥的《匪徒刑罚令》命令在台南设特别法庭进行审判，结果余清芳、罗俊、江定以下 903 人被判死刑，余下被判处不等的徒刑。据统计，整个噍吧哖起义中牺牲死难的台湾民众约达 3 万人之多。噍吧哖起义是台湾民众一系列抗日武装斗争中牺牲最惨烈的一幕。

为了镇压这次起义，日本当局动员了大批的军力、警力，使用了欺骗、集体屠杀、秘密处决，甚至将近千人判处死刑等极为狡诈、残暴的手段，说明了日本统治者对于台湾人民反抗斗争的恐惧，也说明了日本当局在台湾实行的是最为野蛮和黑暗的殖民统治。

◎ 日据时期台湾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广大少数民族同胞世代居住的山区，蕴藏着煤、金等矿产资源，还有丰富的樟脑、森林等资源，均成为日本殖民者的掠夺对象。除了经济掠夺以外，日本殖民者还对少数民族进行了残酷的政治压迫，以高压、武力逼迫，企图征服少数民族归顺。随着日军逐渐占领整个台湾及其殖民统治秩序的确立，台湾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日益严峻，因之，其抗日斗争也日趋激烈。



▲当时武装抗日的台湾少数民族同胞

一、大嵙崁泰雅族抗日起义

大嵙崁位于台湾西北部（今桃园县大溪镇），泰雅族世代居住在此。大嵙崁是台湾最内陆的河港，也是日本殖民者最早

侵入的地区之一。大嵙崁有丰富的樟脑等资源，熬制樟脑等是大嵙崁泰雅族的主要经济来源。台湾总督府为了掠夺樟脑资源，将樟脑熬制和交易交由警察管辖，严重威胁着泰雅族同胞的生存。因此，泰雅族同胞被迫拿起武器，掀起了武装抗日斗争。

1900年6月，大嵙崁泰雅族同胞发动起义，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日本殖民者。台湾总督府随后命令日本军警5000多人，分三路围攻大嵙崁。在历时五个月的围剿当中，日军使尽各种手段，仍无法使泰雅族同胞屈服。总督府又增遣驻守新竹的日本军警2000多人进犯，在泰雅族同胞的坚决打击下，日军死亡100多人。总督府只得下令大量架设铁刺电网，构建围堵防御工事，封锁大嵙崁泰雅族同胞的活动，企图以长期围困来逼迫泰雅族同胞屈服。

1907年3月，泰雅族同胞又一次奋起反抗，形成北部深坑、桃园、新竹各厅泰雅族联合起来抗日的高潮。10—11月期间，又发生汉族与少数民族联合作战的“大嵙崁抗日起义”和“北埔抗日起义”。他们树起“安民”旗帜，与赛夏族大隘社、十八儿社联合，共100多人，袭击北埔支厅，歼灭日本军警57名，狠狠打击了日本殖民者的嚣张气焰。1908年埔里支厅泰雅族二十六社毅然起义，抗击日本殖民者的入侵。1910年1月29日，在桃园等地发生泰雅族三番抗日起义。1912年8月，大嵙崁泰雅族同胞对日军发动突袭，经过五十多天的鏖战，最终以泰雅族同胞歼敌500多人而告结束。

二、北势泰雅族抗日起义

北势泰雅族居住在台湾雪山大安溪上游流域。为防止少数民族的武装抗日，台湾总督府拟采取强行收缴泰雅族同胞赖以

生存的猎枪及弹药的强制措施，遭到泰雅族同胞的坚决抵抗。1911年3月12日，泰雅族同胞突袭大湖厅松永警察所。随后，总督府调集日本军警1300多人，于同年4月4日发起进攻，并配以大炮轰击，使泰雅族抗日义军大量死亡。1912年1月，总督府再次增调日本军警4000余人进行围攻。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泰雅族同胞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1920年1月，爆发石加禄社的抗日起义，北势泰雅族同胞立即响应，南势泰雅族部落也加入其中，他们与石加禄社起义军共同袭击日本军警。总督府从台北、台中、高雄等地调集大量兵力予以镇压，但起义民众据险抗敌，总督府只能通过设立路障、高压铁网来围困泰雅族同胞。

三、花莲太鲁阁族抗日起义

太鲁阁族人分布在台湾花莲秀林乡太鲁阁峡谷立雾溪流域，其祖先最早居住在南投仁爱乡合欢山南面的深山之中，大约在17世纪他们才翻越中央山脉，迁居到了花莲境内，并演化为独立的族群。太鲁阁族同胞是台湾中东部最为重要的抗日群体之一。

日本占领台湾之初，重心放在台湾西部，东部仅有少量驻军。1896年，派驻花莲新城的日军士兵侮辱强奸太鲁阁族妇女，愤怒的太鲁阁族人对驻守的日本官兵发动了攻击，一战就歼灭了日军13人，是为“新城事件”。“新城事件”揭开了台湾少数民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大幕。事发后，台湾总督府虽增派了“葛城号”驱逐舰用重炮火力支援陆军对太鲁阁族人的讨伐，终因太鲁阁族人藏匿在山区难以寻觅，日军内部又突然暴发传染病死伤惨重而放弃。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统治骇人听闻。图为1914年，日军火烧太鲁阁起义部落的村庄。

同年11月，太鲁阁族同胞再次袭击当地日军，并予以全部歼灭。台湾总督府大为震惊，随即于次年1月派遣驻花莲港的日军前往镇压，但太鲁阁族同胞充分依靠险峻的地理形势与其对峙，并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总督府随后又从吉隆和台北增调兵力，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围剿，但结果是被太鲁阁族同胞所击退。

为了打击日本人的统治，花莲太鲁阁族人于1906年袭击了日商“贺田组”在威里社（今秀林乡佳民村）制造樟脑的作坊“脑寮”，制造了“威里事件”，于1907年发动“威里社之役”。

经过日本殖民者多年征讨之后，台湾北部少数民族中坚持抗日斗争的只剩下太鲁阁族人。据日军情报部门统计，1914年太鲁阁族大小部落共有58个，壮年男子约有2500人。太鲁

阁族人恪守祖先的嘱咐，悉心守护着自己的家园，顽强地抵御外来侵略者。

为了彻底消灭太鲁阁族人，台湾总督佐久间佐马太于1914年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太鲁阁蕃膺惩之役”。他率领两万讨伐大军，从中央山脉的毕禄、合欢、奇莱诸峰，以及花莲秀林乡东海岸山脚，兵分五路围剿太鲁阁人。战斗历时五十多天，日军死122人，伤254人，佐久间也在此战役中负伤并在半年后死亡，他是日本侵华史上阵亡的最高军阶者。太鲁阁族人最终因弹尽粮绝被迫缴械投降。此次战役又被称为“太鲁阁战争”。

四、花莲大分山布依族抗日起义

布依族是台湾原住民中最后投降日本政府的一族。在布依族抗日的行动中，虽不如雾社事件那般轰轰烈烈，但却是令日本当局最头痛的一族，也是抗日时间最长的一族。布依族的抗日事件，源起于日警对山地部落的加强控制。从1901年起，台湾总督府佐久间佐马太开始推行所谓的“五年理番事业”，首先就是没收原住民的枪支与弹药。这个举动立刻遭受原住民的全面反抗。原来以布依族的传统，枪支是祖先留下来的遗物，绝对不容外人取走。另一方面，枪支是狩猎的利器，没收枪支使生活立刻陷入困难，因此誓死抵抗。此后，日警最大的任务就是诱骗或逼缴枪支，而布依族的抗日行动，也多着眼于夺取、夺回枪支。拉库拉库流域的布依族抗日行动，在1914年12月已零星展开，但规模都很小。直到1915年5月，喀西帕南驻在所第二次逼缴辖区内枪支时才全面扩大，当时驻在所十名日警悉数被杀。五天后，大分部落也对日警展开突袭，一举杀死12名日警。此为大分起义。这两件大事震动了花莲港厅，立即向台北、台中求援，于是展开了布依族长达18年的抗日活动。其间，为加强镇压山地部落，并围剿抗日分子，日

警于1919年，开辟了八通关越横断道路，并在华巴诺设置炮台。此后，又开辟关山越横断道路，以期南北包夹死守玉穗（塔马荷）的最后一支抗日力量。大分抗日事件，也许不如泰雅族雾社事件那样惊天动地，但持续了18年，汇聚300人，不时地给予日警以痛击，成为日人心目中的“本岛最后未归顺蕃”，这样的决心和毅力，当可与雾社事件同垂不朽。

五、新竹塞夏族抗日起义

新竹厅苗栗南庄社是台湾岛内樟脑树木最多的林区，也是塞夏族的聚居地，他们是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少的一支。总督府在这里设立樟脑专营机构，以巧取豪夺方式掠夺并垄断樟脑产业，严重影响了塞夏族人民的正常生活。1902年7月6日，为争取生存权利，拥有清朝六品军功和监生荣衔的塞夏族首领日阿拐联络东河社、大隘社、鹿扬社泰雅族，以及客家汉族同胞联合发动起义，袭击南庄支厅的日本警察。但由于计划泄密，总督府得以提前调集千余名日本军警镇压，此次起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在坚持了三个月顽强抗争之后，最终以日阿拐的病亡、起义被镇压而告结束。

六、台湾少数民族抗日的高潮——雾社赛德克族起义

警察对台湾民众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有干预的权力。在平地的警察，尽管凶恶，但多少还要受到殖民当局标榜“文明统治”的法律限制。

雾社位于台湾岛中部，属于台中州的能高郡（今南投县），它东有海拔3300多米的能高山，西南离风景秀丽的日月潭仅几十公里，是个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形势险要的地方。

雾社一带世代居住着高山族中泰雅族谢塔喀的分支，共有马赫坡、勃阿伦、荷戈、罗得夫、太罗万、束库等十二社500多户，2000多人口。社是高山族的基层组织，相当于部落。



▲1930年10月27日，饱受凌辱的雾社泰雅族同胞1236人，在莫那鲁道的领导下愤然起义。图为雾社起义爆发地——台湾南投县雾社。

这一带原住民彪悍善战，1910年日本当局为征服这一地区，曾出动1000多警察并动用大炮才达到目的。

雾社高山族人民具有光荣的抗日斗争传统，早在日本殖民统治建立之初，他们就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协助过徐骧、刘永福领导的抗日义军。抗日义军失败后，他们又帮助过柯铁领导的铁国山抗日军。

雾社森林资源十分丰富。为掠夺这里的资源，殖民当局修建了轻便铁路和公路，逐渐使这一带得到开发。1930年前后，雾社已经成为山地的一个小镇。这里是日本殖民当局对高山族聚居区进行统治的中心之一，设有能高郡警察课分室（相当于分局），下设18个警察驻在所（相当于派出所），还设有邮电局、制脑公司、物产交易所和蕃童公学（招收高山族学生的小

学)等,还有日本人开的医疗所、旅馆、杂货店等,住有日本人36户,157人。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建立起来的完全是警察政治。在山地的警察不必接受什么训练,更没有什么限制,完全是无法无天的警察世界。警察对于原住民可以任意进行搜查、辱骂甚至毒打。一些好色的警察,更是随意欺侮、奸淫原住民妇女。有的警察娶原住民妇女为妻,一旦调任,即将其妻抛弃。这些警察被称为“草地皇帝”,原住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他们将原住民统称为“蕃人”。

为了同化“蕃人”,日本人将当地的原住民儿童送入“蕃童教育所”,使他们接受奴化教育,并将其中优秀者送入平地的中等学校,招收这些青年当教师和“巡查”,还送青年人和部落头目到日本参观,接受“文明洗礼”。正因为如此,当局将雾社视为“模范蕃地”,时常有官府要人来此视察。但即使是所谓“教化”,也同样是通过高压手段来实现的,所以正是这“模范蕃地”,爆发了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原住民最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雾社起义领导者——莫那鲁道(中)

1930年高山族雾社起义的领导者莫那鲁道是一位抗日的老英雄。莫那鲁道的儿子达拉奥自幼接受父亲的教育，对日本人有很深的仇恨，特别是他年轻时自己亲眼看到过抗日义军英勇奋战慷慨牺牲的悲壮场面，内心深处很早就萌发了复仇的思想。长大以后，他曾一度离开台湾，出国参观，增长了不少见识。回到台湾后，受台湾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的影响，思想更逐渐成熟。他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时机，准备发动新的抗日武装起义。

雾社暴动的起因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在雾社大兴土木，强迫高山族人民进入马赫坡社附近的森林砍伐巨木，兴修他们的神社。雾社高山族人民主要靠狩猎与农耕为生，视森林为圣地，视巨木为守护神，砍伐巨树使马赫坡等社的民众感到惊恐万分，恐由此遭到神的惩罚，自然不肯乖乖地服从日本人的命令。何况山高路险，警察为使树木完好，不允许将树木拖地而走，竟迫使当地民众肩扛手抬，沉重的劳役更使他们无法忍受。当日本警察用枪口和鞭子逼着他们上山的时候，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恨达到了极点，起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因此当有人提出不如趁此举行起义的时候，一贯对日本人欺压忍气吞声的头目莫那鲁道也下定决心要与日本人拼个死活。

1930年10月7日上午，莫那鲁道的儿子达拉奥结婚，居民正在聚集喝酒庆祝，恰逢日警吉村途径这里。达拉奥友好地斟满一碗酒请吉村喝，这本是当地尊敬客人的一种礼节。没想到，骄横的吉村竟用手杖将达拉奥手中的碗打掉，还挥舞手杖打人。达拉奥受此侮辱，怒不可遏，他和弟弟巴沙奥一齐冲上去，把吉村掀翻在地，狠狠地打了一顿。

莫那鲁道曾去过日本“观光”，他在日本见到的警察并不像在台湾的日本警察那样凶恶，由此对日本警察的压迫更为不

满。此时他见吉村如此，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和家人一起动手将吉村痛打了一顿。

第二天，日本警察以“侮辱官宪”的罪名将达拉奥拘押拷打。莫那鲁道恐日警乘此制造事端，牵连其他人，就携带礼品亲自向吉村赔礼道歉。但吉村不依不饶，口口声声要严办他们。日本警察平时对原住民经常无故拷打拘押，吉村的一番话更使莫那鲁道一家感到走投无路，大祸即将临头。

莫那鲁道知道这一下事情闹大了，日本人决不肯善罢甘休，于是就决定领导群众发动武装起义。经过紧张的准备，他们选定在10月27日正式发动。

莫那鲁道在周围各社颇有威望。在下决心起义之后，就秘密进行联络，勃阿伦、荷戈、罗得夫、太罗万、束库等社头目都表示全力支持莫那鲁道的起义决定。起义还得到花冈一郎、花冈二郎的积极策应。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都是受过日本人精心培养的原住民青年，花冈一郎还曾进入台中师范学校学习，因成绩优秀，他们分别被录用为“蕃童教师”和乙种巡查。他们本非兄弟，由于日本人夸耀所谓“同化”蕃人的成绩，被改了名字。尽管他们比起一般原住民所处的地位要高，但是他们在接受了近代教育后，更加感到日本殖民统治对于台湾民众的压迫和歧视。所以，当周围诸社决定起义时，他们毫不犹豫地与自己同胞站在一起。他们熟悉雾社警察分布的情况，对于起义迅速取得战绩起了重要的作用。

起义时间就定在10月27日。这一天是日本在占据台湾过程中北白川宫能久亲王遭受义军重创死亡的日子，台湾殖民当局定这一天为“台湾神社祭”日。雾社的小学每年这一天都要举行运动会，周围的日本人都要来参观和集会，正可利用日本人不备进行突袭。莫那鲁道等人商定起义行动分为两步：先

袭击雾社周围的警察驻地，再聚集到雾社，攻击小学运动会会场。凌晨3时开始，起义民众分数路开始袭击马赫坡、勃阿伦、荷戈等处的警察驻在所，杀死平时作威作福的警察，切断电话线，破坏桥梁，一切都进行的非常顺利。

在27日上午8时之前，300多位起义民众已经分为两路，一路由莫那鲁道率领，突袭雾社的派出所、制脑公司、日本人宿舍和邮局等；一路由花冈一郎率领，进击雾社小学操场。雾社的日本人一点也不知晓大难即将临头。8时，小学的运动准会开始。全体人员正肃立举行升旗仪式，突然一个原住民青年提刀闯入会场，只见他冲进“来宾席”，手起刀落，就将台中州理蕃顾问管野政卫的头砍下。在场的日本人都惊呆了，尚未明白是怎么回事，花冈一郎已经率队冲入操场，只见刀光闪过，日本人纷纷倒下。操场上当时还有100多位汉族人。起义民众只杀日本式装束的人，对于汉族人，只要求他们尽快离开。不到一个小时，小学里的日本人都被杀光，其中还有两个汉族人因穿和服而被误杀。莫那鲁道率领另一支人马杀进雾社的派出所、邮局等处，很快解决了战斗。这场战斗共计杀死134名日本人，伤18人，缴获130余支步枪，2万多发子弹和一挺机关枪。莫那鲁道又派人破坏雾社附近的铁路，并在进入雾社的必经之地眉溪设置工事，以阻遏日军。

直到将近中午，小学校的一名侥幸躲过起义民众的督学逃奔下山，雾社发生起义才为当局所知。此事立到震动了总督府。第二天，台湾的报纸大肆对所谓“凶蕃”进行渲染和声讨。总督府立即组织1100多位警察、800多位陆军士兵以及1300多位军夫的讨伐部队紧急集结，开赴雾社。31日双方展开激战。

日本殖民统治当局还用加急电报报告日本政府，请求火速

派兵增援。日本政府接到报告后，从本土派出多艘军舰和十几架飞机运兵到台湾，会同日本驻台的海陆空军和警察一起围攻雾社。日军在大炮和飞机的支持下进攻马赫坡等社。他们先用山炮猛轰，把马赫坡、罗得夫、荷戈、束库各社的房屋炸成一片废墟，然后调步兵发起冲锋。起义群众依靠断墙残壁的掩护，在枪林弹雨中跟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激战到11月3日，各社相继沦陷，起义群众撤退到山地继续坚持战斗。

起义军中有不少百发百中的猎手，退到山地以后，他们在丛林中居高临下，向爬上山来的日军射击，一枪打死一个，使得日军裹足不前。日军用山炮对着山头乱轰，飞机也漫无目的地狂轰滥炸，森林燃起了熊熊烈火，迫使起义军向更深的山区撤退。日军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起义军施放了糜烂性毒气，使得起义军遭到重大伤亡。

虽然莫那鲁道指挥起义民众进行了拼死抵抗，然而由于兵力火力对比悬殊大，只好决定率青壮年退守山林，并命各社老弱进入密林避难。一些老弱和妇女为坚定亲人奋战到底的决心，依据本族风俗，纷纷在密林中自缢。

莫那鲁道率众退入山中的岩窟中进行坚守，这个岩窟凭借天险易守难攻，洞中有水且存有粮食。日军的大炮等重武器在山中无法施展，莫那鲁道还不断率勇士出击，袭击不熟悉地形的小股日军。日军一时无法取得进展，先派人前去招降，为莫那鲁道所拒绝；继之又挑动与马赫坡等社结有宿怨的万大、陶珠亚等原住民部落进攻，也未能奏效。起义民众在洞中坚持了一个月，存储用光。日军见屡攻不下，于是决定采取最野蛮的手段，利用飞机先后投了800多枚毒气弹，致使起义民众死亡

惨重。12月1日，莫那鲁道认为最后时刻已经到来，走入最隐蔽的密林之中自杀。尸体几年后才被发现。花冈一郎先杀死妻子，然后剖腹自杀。花冈二郎令其妻子逃往娘家，和其族中勇士也自杀而死。雾社起义至此失败。



▲日本当局违背国际公约，对雾社起义者使用毒气弹。图为日军军医解剖遭毒气攻击致死的起义者，研究毒气的杀人“效能”。

雾社起义使日本统治者大为震惊。为了杀一儆百，日本殖民者使用了最残忍的手段进行报复，不但将参加起义的诸社村落夷为平地，还对许多无辜的民众进行屠杀，并将人头砍下，以展示他们讨伐“凶蕃”的“赫赫战功”。马赫坡等参加起义

的六个社原有 1400 多人口，经过日军的屠杀，仅剩下 500 余人。尽管如此，日本当局还要对他们斩尽杀绝。日本当局先将六个社的头目十余人以主谋的罪名加以拘押，然后秘密地全部处决。六个社余下的人口，当局将他们集中迁往雾社的罗得夫、西巴岛西社严密看管，并暗中唆使陶珠亚部落进行报复。

1931 年 4 月 25 日深夜，陶珠亚部落携带日本当局借给的枪械，冲进这六社残余部众的栖息地。六社余众手无寸铁，面临突袭，只有束手待毙。结果又有 250 余人被杀。经此屠杀后，六社仅剩 298 人。这被称为“第二次雾社事件”。

日本当局对于他们还不放心，又强迫他们迁离雾社到埔里北面的川中岛，继续进行持续的压迫。1937 年这六社残众只剩下 230 人。

雾社起义是反抗日本殖民当局残酷统治和压榨政策的一次大爆发。雾社参加起义的诸部落只有千余人，却敢于起来反抗殖民当局。面对凶恶的殖民者，宁可战死也不投降。这充分说明了包括原住民在内的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不屈不挠精神。日本当局为了尽快地镇压起义，不惜动用包括毒气弹在内的武器对付只有非常简陋武器的起义民众，更加显示出日本在台湾统治的残暴。雾社起义对殖民当局的打击也是很大的。当局使用毒气的行径，遭到岛内岛外的同声谴责。台湾农民组合、民众党都发表声明、传单谴责使用毒气是非人道的行为；上海反帝大同盟发表宣言支持雾社人民的起义。当时的总督石冢英藏和台中州知事因此事引咎辞职。

雾社起义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台湾人民抗日史上光辉的一页！

1931—1937 年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七七抗战，这七年间，是日本军国主义狂热侵华时期，台湾抗日运动的环境是非常艰苦的。其一，日本军部法西斯派抬头，发动所谓“新体制”运动，进行战争冒险。在这种形势下，台湾被称为“日本帝国的国防第一线”。日本要充分利用台湾的物力和人力，就要彻底消灭台湾的抗日运动。其二，中国全国抗日情绪沸腾，但国民党政府并无抗战之意，国民党的反共内战尚未停止，因此，国内对台湾的民族运动仍无直接援助。其三，欧洲对于法西斯侵略者尚在实施妥协退让的所谓“绥靖政策”，形势动荡，因此，台湾的民族运动在国际上也缺乏良好的条件。由于这些原因，台湾的民族运动，表面上仍然是自治运动。但是，在这段时期内，仍然发生了一些台湾人民武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事件。

◎ 基隆港炸弹案

日本在准备战争期间，一面以所谓“自治改革案”敷衍台湾的上层分子，一面在各州设立所谓“国防议会”，迷惑台湾人民。当时的日本海军元帅、军令部长伏见宫亲王，在海军大演习的时候，与海军元帅梨本宫亲王先后到达台湾，鼓励所谓“国防第一线运动”，视察自治运动，并为台湾国防议会联合会总部举行成立典礼。这个典礼预定在1934年10月1日举行，但在9月29日上午11时，在基隆就发生了炸弹案，警察署一部分建筑物被毁，引起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恐慌。日督府一

面封锁新闻，一面大肆搜索，结果侦悉投弹人是一个 21 岁的爱国青年郑清水。日本人四处搜捕，郑都机智地脱逃。在出事一个月以后，郑清水因为生活困难，向当地保正廖某商借旅费，却被廖某出卖，招来军警围捕。郑清水见势不妙，在杀伤日警以后，用刀剖腹自杀，但仍盘坐田畔，四围日本军警起初不敢走近，后见久无动作，才知郑清水已死。台湾人民誓死抗日，如此壮烈，叫日寇胆寒。

◎ “众友会” 起义

与基隆炸弹案同时，又发生了大规模的抗日革命事件——“众友会”起义。台湾青年曾宗，素怀抗日复国的志愿，平日积极结识各方同志，并着手在台中、清水、鹿寮、竹林等地组织“众友会”，计划起义。之后，曾宗少年时代的挚友蔡淑悔从国内来台，加入了“众友会”，并被推为领袖。蔡淑悔入会后，积极推进组织，置办武器，并定于 1935—1936 年，即日本所谓“非常时期”起义。但由于情势日紧，“众友会”的活动逐渐被日本人注意，起义乃不得不提前发动。在 1934 年 4 月初，“众友会”以袭击台中州西屯、南屯两派出所为目标，由清水出动，到沙鹿的竹林附近，但行动被日方察觉，日方立即在台中、台南、高雄各州展开大搜捕行动，先后被捕了 425 人，内有“众友会”领导骨干 25 人。“众友会”起义以失败而告终，曾宗受尽了酷刑，死在狱中。

◎ 埔里社事件

1936 年 3 月 1 日，有高山族同胞 20 余人，突袭距离埔里

社十余里的日本军事据点，杀日警两名，然后退入阿里山。临行时，散发传单，指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压迫台湾人民的种种罪恶，号召台湾人民一致团结抗日。日本人因此又大举搜捕，许多人被拘被杀。

◎ 武装抗日运动的成就与教训

一、抗日暴动的成就：

1. 抗日暴动用鲜血淋漓的事实，来反证日寇殖民政策和“怀柔政策”的欺骗性，提高了台湾人民抗日的民族自觉性。

2. 爱国的起义领导者们开始由少数人的抗日暴动，进而展开深入群众的民族革命宣传与组织，其中尤其是苗栗事件及西来庵事件，在联系群众这一点上，对于以后台湾民族革命运动，有了极大的影响作用。

3. 台湾人民革命运动，从此以后开始与祖国的革命运动紧密联系起来。

台湾人民的武装抗日运动，至西来庵事件而告结束，每一次暴动都在日寇大规模流血恐怖的镇压下，完全失败了。

二、抗日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1. 缺乏健全的中央领导者，缺乏一个革命党。

2. 起义暴动者未受过充分的战术训练，无游击战组织能力。

3. 各起义者虽前仆后继，但彼此缺乏联系。

4. 没有抗日民族革命政治纲领，多以复仇意识动员群众，故团结不能坚固。

5. 与祖国没有密切联系，而祖国各革命团体对台湾人的抗日运动，也缺乏指导与援助。

20 世纪 20—30 年代中期的 非武装政治抗争

伴随日本在台湾统治的加强，台湾同胞斗争的方式也逐渐从武装反抗转向和平运动。因为早在 1907 年梁启超就曾对林献堂说过：“祖国在今后 30 年内，绝对没有能力帮助台湾同胞争取自由，所以请你劝告台胞，千万不可轻举妄动，而遭受无谓的牺牲。你们最好仿效爱尔兰人对付英国的方法，好叫日本人不敢过分压迫台胞。”1911 年梁启超亲临台湾，再告台湾学术界：“政治是一门大学问，要多读读世界思想名著。”岛内的爱国知识分子连横、林献堂等人也认识到在当时通过政治斗争对付日本人的压迫、奴役、同化的重要性，开始探索民主斗争的道路。

20 世纪 20—30 年代中期，随着武装抗日斗争趋于低潮，台湾社会出现了一股民族运动的洪流，猛烈地冲击着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这一运动以台湾民众争取基本政治权利为核心内容，以建立有殖民地地方特别立法权和预算权的台湾地方议会及谋求台湾地方自治为主要政治诉求，属于非武装政治抗争。

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民

族自决”，主张民主主义的思想一时风行日本。日本一方面由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同胞不断斗争，台湾局势动荡，于 1921 年撤销压迫台湾人民的“六三法”，公布实行“法三号”。此法令使台湾人同日本人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其目的就是想笼络台湾人民。这样，台湾当局也不得不给予台湾人民有限度的自由权利。台湾的有识之士，特别是海外留学生，受民主思想影响，利用当时日本的政策进行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台湾开明士绅林献堂成为非武装政治抗争的领袖人物之一。

林献堂（1881—1956），出身于台中雾峰林家，雾峰林家是台湾知名的望族，几代人为祖国的统一富强，荡尽家产，流尽鲜血。林献堂一生倡导台湾民族运动，从事对于日本大和民族的抗争，一生不说日语、不穿木屐，坚持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是位有道德勇气与使命感的民族运动先驱。

林献堂从小受过较好的教育，有深厚的国学造诣。14 岁那年发生的马关割台事件，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此后日本殖民当局的暴政，在他年轻的心头烙下了难以泯灭的伤痛，而台湾民众不甘臣服、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使他在耳濡目染中，蓄下抗日大志，促使他长期投身于台湾民族运动。

1907 年，26 岁的林献堂在日本奈良结识因戊戌政变而亡命日本的梁启超。两人一见如故，促膝长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启超说：“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台湾的进步青年和来自祖国大陆的优秀知识分子抒发了共同的情感与感慨，他们的谈话表达了割台后两岸同胞情感的痛苦和挣扎。1911 年 2 月，梁启超应邀访台，他浓烈的爱国情怀，深深感动着林献堂、连横等爱国绅士。林献

堂等人得到梁的教诲：台湾人应效仿爱尔兰人的做法，以非暴力的方式在日本统治中争得权力。苦于日本奴役却无法挣脱的林献堂等人不禁有豁然开朗之感。在送别时，林献堂说：“任公（梁启超号），请放心去吧，这黑暗的年代，我们决不会迷惘，决不放弃斗争。待台湾光复那天，再请任公来相会！”梁启超庄重地点了点头，道：“‘子规夜半犹泣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只要我们抱定决心不变，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梁启超走后，深受其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林献堂，开始苦苦寻求台湾的出路。

1913年，林献堂请堂兄林纪堂、林列堂赞助，发起成立了新民会，联合台湾北、中部士绅向总督府请愿，表达台湾人出钱成立台中中学的意愿。请愿运动以公开的方式第一次在台湾岛内发起了以台湾民众为主体的针对总督府专制统治的斗争，唤起了台湾民众与日本殖民者抗争的勇气。两年后，台中中学正式开校，台中中学是台人自办的第一所中学，专门招收台民子弟入学，目的在于反抗日本殖民者对台湾青少年的奴化教育，带有民族运动色彩，是为民族运动第一声。

他先后大力推动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共进行了十五次，前后历时14年之久，有12818人在请愿书上签字。直至1934年，每次请愿都被日本政府蛮横拒绝。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体制猖獗，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被迫停止。

林献堂、蒋渭水等人于1921年10月17日成立“台湾文化协会”，参加者多是当时的知名人士，共1000多人，林献堂是协会总理，蒋渭水是常务理事。

蒋渭水（1891—1931），本是医生，一生秉持不妥协的民族精神，为台湾同胞争取自由，与日本占领政府当局持续抗

争，生平受日警检束拘留十余次。



▲1921 年的林献堂

“台湾文化协会”得到林献堂的大力支持，由林献堂任总理，林幼春任协理，蒋渭水、蔡培火任常务理事，其宗旨是“主张台湾文化之发展”，提出了“反对民族差别”“反对奴化教育”“获得参政权”等口号，这是台湾本土的第一个政治团体。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后，他们在台湾各地进行讲演、开办文化讲座等活动，宣传爱国主义理念，对台湾民众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文化协会专门聘请教师，举办《台湾通史》《中国古代文明史》《什么是政治》《中国文学》等内容的讲座。著名史学家连横就曾担任《台湾通史》的主讲人。这些知识是控制严格的台湾学校和其他场合难以听到和见到的，受

到了台湾民众的广泛欢迎。有一次林献堂在演讲时，会场只能容纳300多人，但场外人数却有十倍之多。文化协会的演讲团所到之处，当地民众均鸣炮欢迎，偏远山区甚至抬轿迎送。文化协会因为揭露日本殖民统治和台湾政治、经济、教育的不平等事实，因而常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干涉和破坏。

文化协会的宗旨是：“欲启发我岛的文化，振起我同胞的元气，以谋台湾人的幸福。”文化协会的中心任务是启发民智，宣扬民族文化，促进台湾人民民族意识觉醒，这就需要动员广大民众积极参与。为达成这一目标，文化协会开展了一系列的启蒙宣传活动：

一、举办各类文化讲习会。台湾通史讲习会，由连横主讲，听众每天多达300余人。此外，还有通俗卫生讲座、通俗学术讲座、西洋历史及经济学讲座、汉文讲座等，因主讲者多借讲座抨击日本殖民统治，故常有警察临场监视。这些讲习会的目的在于普及新文化知识并激发台湾民众的民族反抗意识。

二、创办报社，发挥舆论的广泛宣传作用。文化协会创建伊始，就筹划出版《文化协会会报》，但因其中包含许多民族意识强烈的内容而遭禁止。《台湾民报》成为文化协会的事实上的机关报，后改为《台湾新民报》，由周刊改为日刊，报纸利用汉文记事，积极为台湾人民的利益呼吁呐喊，揭露总督府的专制统治，宣扬中华文化和大陆的情况。尤其是对祖国的介绍和大陆作家作品的转载，为殖民地新闻封锁下的台湾民众和祖国人民间系起了一条情感和文化联系的纽带。

三、改良、普及文化艺术活动，寓教于娱乐之中。在厦门通俗教育社的影响下，陈嵌、周天启等组织成立彰化新剧社，开创台湾新剧运动。台北陈凸也成立星光演剧研究会，研讨“五四”以来的新剧并将其移植到台湾。此外还有新竹新光剧

团、基隆民运新剧团等，他们演出的剧目多以宣传民族意识、讥讽总督政治为中心内容，世人称之为“文化剧”。另外，在 1925 年又成立了美台团电影放映队，在放映的同时以台语配音，言语中不时讽喻政治，当临场警察出来干预，台下民众便发出一片抗议声。

四、举办文化讲演会。文化协会最主要也是最有效的宣传动员手段即是遍及全岛各地的文化讲演会。

文化协会主张复兴台湾地区的中华文化。针对日本殖民者企图移植日本文化并消弭中华文化的民族同化政策，文化协会开展了一场振兴台湾地区中华的浪潮，他们宣传台湾与大陆同根同祖的历史渊源关系，引进大陆的报纸、杂志和书籍，介绍五四运动以来祖国的新文化、新气象，强烈抗议殖民当局压制汉文的政策，要求恢复汉文在学校教育中的应有地位，同时编撰教科书、在社会上开办各类汉语学习班，这些举措得到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

文化协会发展的转折点出自内部的分裂。20 世纪 20 年代，在大陆的台籍学生纷纷建立和平社、台湾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左倾色彩十分浓厚。在岛内，有连温卿等人组织的社会问题研究会，翁泽生、王万得等人组织的台北青年会，蔡孝乾等人组织的彰化无产青年派，等等，一大批青年的思想急剧“左”倾。这样在文化协会内部形成了连温卿等的无产阶级派、蒋渭水所率领的受中国革命影响较多的一势力及林献堂、蔡培火所代表的合法稳健派，三者之间的对立逐渐明显起来。对立的根本即在于民族运动发展方针路线上的原则分歧。首先，文化协会从创办伊始，其政治上的最高诉求是设置有权处理台湾地方事务的台湾议会，实现台湾自治的目标，行为方式是温和的、非暴力的，主要手段是启发民智和请愿斗争，在体现坚韧毅力

的同时又显现出隐忍等待的心态。其次，文化协会是个由不同阶级、不同思想信仰的人们所组成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本身即存在着不同思想路线的斗争，蔡培火将文化运动局限于文化的范畴，蒋渭水谋求的是以农工为基础的全民运动的路线，连温卿则主张无产青年应占民族运动的主导地位。1927年1月3日的文化协会临时总会上，以连温卿为代表的“左”倾激进派掌握了领导权，这就直接否定了林献堂等稳健派以设置台湾议会来达到台湾自治的斗争方略，二者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林献堂等宣布退出，文化协会正式分裂。分裂后的新文化协会由于采用了激进的斗争方式加上殖民当局的全力取缔，在新竹讲演会事件和台南墓地事件的打击后，新文协渐渐覆没。

1927年6月，参照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成立台湾民众党。1930年8月，林献堂等又组建台湾地方自治联盟。他们以文化工作来致力于民族运动和思想革命，对台湾同胞抗日斗争影响深远。民族主义为其基本精神，经济社会制度为其关心重点，对日本总督府的措施常作反抗运动，也一再受到日本的迫害。文化运动轰动了台湾，使台胞吸收了新文化、新思想，加强了台胞的民族意识。

台湾民众党的建立

文化协会内部分裂，蒋渭水即仿效日本政党组织办法，起草纲领文件，以谢春木的名义申请创立了台湾民众党，得到了日本当局的批准。1927年7月10日台湾民众党正式成立为政党，参加党员皆系文协会干部及旧会员等800多人，聘请林献堂为顾问，主要领导有蒋渭水、陈其昌、许明、廖进平、谢春

木。在蒋渭水的主导下，台湾民众党初期的运动路线是调和民族运动与阶级运动。党的指导原则是：（一）确立民主政治。主张台湾人应有自治参政权。（二）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主张提高农工阶级的生活，使贫富权利趋于平等。（三）革除社会制度之缺陷。主张改革社会陋习，实行男女平等。确立自由的社会制度。民众党的斗争目标，在不时揭发总督府当局的暴政，使台胞明了当前政治，促其自觉，并藉以揭发总督府日常的阴谋，使之不致虐民以逞，知所自制。民众党成立半年后，在全岛已有 15 个支部。翌年又组织了台湾工友总联盟，负责人为李友三，各地更成立了 48 个工友会，14000 余会员。此外还有兰阳农民协会，台北劳动青年会等外围组织，党员遍布全岛。党的政策分政治、经济、社会共 71 项。

直到 1931 年被解散为止，台湾民众党的活动较重要的有：反对放领官有地租之台湾拓殖会社；反对鸦片吸食政策；反对田中内阁侵华政策；反对日人官更加薪俸制度；对雾社事件的强烈声明。特别是有关鸦片政策及雾社事件的问题，民众党还通电国际联盟，引起国际注意。国际联盟为了鸦片政策特地派员到台湾调查，使日本当局相当难堪。现将其中一件最激烈的斗争——反对总督府实行新的鸦片特许政策略述如下：

日本占领台湾时，对鸦片采取渐禁论，实行鸦片专卖，统筹配销，发给吸食者特许牌照，在户口簿上注明“阿”（日本人当时称鸦片为阿片）字，可以向指定商店购买。1900 年调查有鸦片瘾者近 70 万人，约占当时人口的六分之一，鸦片专卖的收入曾占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推行鸦片专卖的后藤新平，就因为对台湾财政的贡献获得了勋章。



▲1927年，林献堂、蔡培火、蒋渭水组建台湾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政党——台湾民众党。图为蒋渭水与太太陈精文女士。

鸦片专卖销售收入统计表 单位：万元

年度	1897年	1902年	1906年	1913年	1918年	1919年	1924年
金额	153.98	300.84	439.55	528.95	665.08	694.73	463.40

当时的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认识到鸦片的危害，日内瓦“万

国鸦片协定”于 1929 年 1 月 9 日生效，严禁吸食鸦片，日本也是当时的签约国。台湾总督府也装模作样地颁布了《台湾鸦片令施行细则》，不准吸食鸦片。但因为鸦片专卖的可观收入，细则下附有一个“但书”，称“本令实行前之鸦片瘾者，由总督特许吸食，而吸食政府发售之鸦片膏者，不在此限”。显然禁食鸦片有名无实。蒋渭水是个医生，他深知鸦片的毒害，指出总督府的特许方针是“和在澳领澳门征税而准许赌博之榨取政策同出一辙。均将留污名与罪恶于人类历史上者”。刚刚成立的台湾民众党就投入了反对鸦片特许的斗争。他们除了举行全岛打倒鸦片演讲会，也向东京的日本政府抗议，要求全面禁止鸦片吸食。但日本当局对此采取高压政策。民众党决定诉诸国际联盟获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但日本对电信的控制比较严格，要发出这样一封电报是不容易的。

经过精心策划，1930 年 1 月 2 日晚上 7 时，一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拿着一份电文走入台北电报局，发出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就是以“代表四百万台湾人的台湾民众党”的名义，向国联控诉日本在台湾实行鸦片特许制度的。这个青年是蒋渭水的儿子蒋松辉，他们故意选在电报局高级职员下班之后发报，留下的低级职员一般不太懂英文，这些职员糊糊涂涂就帮他们用英文向国联发了电报。这封电报第二天刊登在各地报纸上，日本政府大为震怒。1930 年 3 月 1 日国联派员来台调查，日本政府虽百般阻挠，蒋渭水、林献堂等人仍义无反顾地向调查团委员陈述真相，使日本政府丢尽了脸面。台湾总督府迫于舆论压力，终于公布新的鸦片令，编定预算，各地设立更生院，做戒毒中心，认真推行矫正治疗。但总督府却因此怀恨在心，把台湾民众党视为眼中钉。

1933 年 2 月民众党在本部召开第四次党员大会，通过新纲

领。警务局长却突临会场，向主干陈其昌交付“政治结社禁止命令”，理由之一就是反对鸦片新特许制度，谗诬日本政府，并声明：“总督府绝对不准许民族自决。”这样，日据时代台湾人唯一的政党，仅存在三年又七个月，就被解散封杀了。但民众党抵制日本的同化压迫政策，在台湾人民心中却播下了民族的种子。

青年学生的抗日斗争

在殖民地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中，青年学生往往成为反抗殖民压迫斗争的先锋队。台湾在日据之前，没有新式的学校。日本在占据台湾之后，逐渐在岛内设立小学程度的公学校供台湾儿童就读。以后岛内读书的学生逐渐增多，又出现了一些中学和中等程度的专业学校。近代教育本来就是社会平等的产物，但是日本将台湾作为任由他榨取的殖民地，当然不可能在台湾实施平等的教育制度。在台的日本人以征服者自居，处处对台湾民众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即使在学校中也是处处存在对台籍学生的歧视。当日本人与台湾人出现争执时，当局往往袒护日本人。甚至为了压制台籍学生，竟使用警察等高压手段对学生进行恫吓。日本当局在学校中歧视台湾人的种种做法，使不满殖民当局歧视的情绪，在学校逐渐增长。一些台湾籍在海外及大陆留学的学生也将新的思想带进岛内，特别是台湾民众中一直存在的不满日本殖民统治的情绪以及20世纪20年代岛上兴起的非暴力的抗争运动，不但吸引了众多学生参加，而且给予了学生反抗运动以重要影响。台籍学生对学校内存在的歧视越来越感到不满，并逐渐认识到这是日本殖民统治造成的，从而在学校中逐渐产生了反抗的情绪。从20世纪20

年代初起，一向风平浪静的教育界，爆发了一系列的学生风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1920 年 2 月，台中商业学校学生罢课。

1922 年 2 月，台北师范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几十名学生被拘捕，学生罢课抗议。

1924 年 11 月，台北师范再次发生学生与校方抗争。

1925 年 4 月，台南师范学生罢课。

1926 年 10 月，台北商工学校的学生在公共浴池受到一日本人的无理辱骂，致使双方打架。结果台籍学生竟遭到拘捕，学生罢课 10 天以示抗议。

1927 年 5 月，台中一中的学生与日本厨师发生纠纷，校方袒护厨师，引起学生退宿、罢课。

1928 年 3 月，台南第二高级女中的毕业典礼上，台籍毕业生在所谓“感恩”发言中，对校方对于台籍学生的歧视进行痛斥，学校竟以取消毕业证进行威胁，造成学生和家长的强烈不满。

1928 年 4 月，台南二中的日籍学生无故殴打台籍学生，引起学生抗议。

其中以 1922 年台北师范学校、1927 年的台中一中的学潮影响最大。

1922 年 2 月，台北师范学校的数十学生在街上购物，被日本交通警察指责违反不许左侧行走的命令。学生不服，遂引起争执。警察认为学生不服管教，当晚就找到学校的舍监要求对不服管教的学生进行处理。学生发现这名警察来到学校后，情绪更加不满，乃群集舍监办公室外齐声指责警察和舍监，甚至丢石头。这名警察见势头不好，就跑出求援。警察署闻讯立即派两名警察前来驱散学生。这些警察平时都作威作福惯了，以

为只要他们一出现，学生立刻就会散去。没想到这一下触发了学生平时的不满情绪，600多名学生群集校园内，将警察阻挡在校门外。警察署长才知此事不妙，立即率一批警察持枪械赶赴学校。在与学生相持中，警察署长竟拔出指挥刀威吓学生，学生这才逐渐散去。这就是所谓的“拔刀事件”。

此事由于发生在台北，对当局震动很大。当局将其中45名学生拘捕、审讯。当时文化协会吸引了不少学生参加。其中尤以台北师范的学生入会最为积极。被拘捕的学生中多与文协有密切关系。后来殖民当局为了怀柔学生及社会各方的不满情绪，特别力图利用这次事件打击文化协会，命令将被捕的学生予以释放。许多学生也在压力下被迫退出文协。但是校方最终还是将这些学生大部分除名。被开除的学生最终都进入东京继续求学，并在东京组织“文运革新会”。“文运革新会”在反对日本殖民当局的态度上比其他留学生组织都更为激烈。

1927年台中一中罢课是因一中日籍厨师中村的妻子在学生宿舍吵闹而起。中村的妻子因与学生发生纠纷到学生宿舍大吵大闹，引起学生的不满。学生要求舍监进行处理，舍监置之不理。五年级学生要求辞去舍监职务进行抗议。校长反而借机进行干预，要求停止校方早就不满的学生宿舍自治、禁止学生的发言权，要求学生无条件地服从舍监。而后校方又以学生在宿舍燃放爆竹，强制要求五年级学生全部退出宿舍。学生当然不服，学校竟于5月11日夜间接来警察、宪兵包围学生宿舍，强迫学生搬出，并声称，凡有不搬出宿舍的，学校即以除名。结果五年级及其他年级的170余名学生愤然退出。随后二年级学生以罢住进行声援。校学生会要求校方无条件允许退出宿舍的学生返回，但为校方所拒绝。学生会即决定从本月16日开始罢课。

校方开始以为用压制的手段即可将学生制服，所以并不理会学生的要求。没想到事情会越闹越大，这使校方十分难堪。校方在行政当局的支持下，开始动用警察使用各种手段对罢课学生的家长进行胁迫，但毫无效果。州厅行政当局为了瓦解学生的抗议活动，宣布将为首的 10 名学生除名，同时表示，其他参加罢课的学生只要悔过，学校即不予追究，并加紧了对罢课学生家长的压力。不少学生在家长的压力下不得不在悔过后继续上学，但一部分学生仍坚决反对复课。从 6 月开始，校方先后将 60 余名学生开除。但是，被开除的学生全都转往大陆和日本继续求学，继续参加各种形式的反日活动。

当时青年学生的反抗活动一方面在学校内的不断风潮中反映出来，另一方面则是许多学生在社会上参加诸如文协、台北青年会之类的组织，并成为这些组织中的最有生气的一部分。

由于当时的学生反抗风潮往往只是发生在一个学校内，没有得到其他学校学生的支持，更没有得到当时工农等社会大众的支持和声援，所以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最终为殖民当局所平息。但是当时的学生反抗风潮毕竟使众多的青年学生在思想上产生了只有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人民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强烈意识。这种强烈意识自然而然地促使在当时众多的日据时期出生，并被强迫接受日本式教育的台湾年轻一代产生对祖国的向往和回归祖国的愿望。在日本占据台湾几十年之后，代际交替并没有造成普遍存在于台湾社会中一定要回归祖国的信念中断，而是随着这批年轻学生的成长步入社会，这一信念薪火相传，并未有所减弱。从这一点来说，日本在台湾通过推行殖民教育来同化台湾年轻一代的企图彻底失败。

台湾农工运动

◎ 农民运动

台湾农民运动也是日据时期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重要部分。台湾农民运动主要是围绕着反抗日本殖民者的土地收夺和经济剥削而展开，由此赋予这一运动鲜明的民族斗争色彩。1923年后，台湾农民运动蓬勃发展。1926年6月，台湾农民组合正式成立，简吉任中央委员长。至1928年底，组合已拥有18个支部，1500余名成员。台湾农民组合纲领提出：提高农民知识水平，发扬互助友爱精神，以合法手段达到目标；体现出以稳健、合法方式谋求农民利益的指导思想。

台湾农民的抗日斗争由于当时受到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影响，所以主要表现在成立各式组织，争取权益的抗争。

台湾一直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日本占据台湾之后，也致力将台湾变成一个日本农副产品的供应基地，农民始终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由于台湾的自然资源丰富，日本资本大举进入台湾建立各种新式制糖会社。在总督府的庇护下，糖厂依靠“原料采集区制度”迫使蔗农要与会社签订原料供应合同甘受会社的剥削。总督府通过各种方式掠夺了大量的土地。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制糖会社和大地主手里，他们的资本竟占有台湾土地总数的13.29%。会社还采取许多手段对蔗农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蔗农一年到头劳作，却还要欠下会社的大笔债务。蔗农对于会社的压榨早已是不堪忍受了。

1921 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后，经常在各地举行演讲、讲座、读报等活动，宣传民主自由、民族自觉自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引起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共鸣，也使一部分农民受到触动。农民运动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兴起。

1924 年 4 月，设在新竹北斗的林本源制糖会社的糖厂故意压低原料收购价格，而会社又抬高贷放肥料时的价格，引起大城、沙山、二林、竹糖等四庄蔗农的强烈不满。四庄蔗农 2000 余人公推二林庄长林炉、医师许学为代表向会社交涉。林本源制糖会社为林本源家出资，但实际上是由台湾银行控制，重要职务全由日本人担任。蔗农的请愿被会社总经理吉田蛮横拒绝。后来在北斗郡郡长的调停下，会社才答应对蔗农每甲蔗田补偿 5 元。此事数目虽小，但却是蔗农通过集体请愿第一次得到会社的让步。农民受到初步成功的鼓舞，就邀请文协的理事李应章主持开设农村问题讲座，蔗农感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更多地争取自己的利益。1925 年 6 月 28 日，二林蔗农举行大会，宣布成立“二林农民组合”。当时参加组合的有 400 多人，并选举李应章等为理事。组合的成立主要是团结蔗农向制糖会社争取权益。当年，员林的蔗农为抗议当局对芭蕉出口的垄断，成立“贩卖组合”，不顾当局的威胁，自行出口芭蕉。

1925 年 9 月，二林农组召开农民大会，议定再次向会社争取提高糖的收购价格。农组代表和林本源向制糖会社的总经理吉田两次交涉，都遭到拒绝，吉田还当众侮辱农组代表。随后，农组成员在会社未公布收购价格之前拒绝会社采收甘蔗。10 月下旬，会社组织人力收割甘蔗，但遭到蔗农的阻止，收割未成。10 月 22 日，会社招来数名警察并有数十会社职员等欲收割甘蔗。蔗农闻讯围聚上来，要求他们停止收割。但是会社原料部主任矢岛军治指挥人强行收割，警察则环绕收割人周

围进行保护，蔗农见此非常愤怒，即用土块、割断的甘蔗抛向会社职员及警察等人。警察见状便拔刀相对，这更引起蔗农的愤怒，双方扭打起来。混乱中，会社职员和警察受了轻伤。北斗郡接到报警立刻派出大批警察前去镇压，但蔗农早已散去。



▲台湾文化协会有理事李应章（李伟光）在彰化县组建“二林蔗农组合”。图为“二林事件”时李应章（右）与战友的合影。

次日，北斗郡出动数百警察前去报复，四处搜捕蔗农，连当时不在场的李应章也被抓走。随后警察肆意闯进民宅，编造罪名，滥捕农民。一些毫不知情的，但平时对会社或警察发表过不满言论的人也无辜被捕，惨遭酷刑。

“二林事件”发生后，林本源制糖会社由许丙出面乘机宣传参与反抗的蔗农是暴徒，要求当局严惩；总督府的御用报纸甚至向当局建议用《匪徒刑罚令》制裁反抗者。一时间风声鹤唳，给当地的农民带来极大的恐惧。“二林事件”被关押的蔗农一直到第二年的 4 月才开庭审判。李应章等 25 人分别被判处一年至多年不等的徒刑。“二林事件”本来是制糖会社盘剥蔗农而引起的纠纷，但殖民当局之所以要大肆进行镇压，主要是出于保护日本殖民者的经济利益，但更重要的是当局对农民通过农民组合而进行有组织抗争的一种恐惧。当局严治此案，是要以此威吓民众。但是台湾民众并没有为此所吓倒，农民的抗争也由此进入一个新时期。

“竹林事件”就是由此引发的新的抗争。1908 年台湾总督府为吸引三菱财阀在台湾建立造纸厂，竟将嘉义、云林一带农民世代耕种以为生计的竹林以极低的价格让与三菱开发。这种掠夺农民生计而使日本财阀从中牟利的做法，激起当地农民极大愤慨。1913 年的林汜埔事件就是由此引发。此后当地农民为了收回竹林所有权，曾几次向官府请愿，但都被当局镇压。此后，二林和凤山等地都成立了农组，农组代表鼓励竹农组织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其中，竹崎农组在其他农组的配合下，不断发动竹农进行抗争，终于在 1929 年迫使三菱将 2700 余甲竹林地让与竹农。但仍有许多竹农未能得到竹林地，在农组的率领下继续进行抗争。但由于当局的强力镇压，竹农的抗争终被平息。

从 1920 年之后，台湾农民有组织的抗争运动主要是由于

日本制糖资本家、为当局支持的台籍大地主的残酷剥削以及官僚对于农民土地的掠夺而引起的。这些经济上的合理要求，却遭到殖民当局的武力镇压。尽管农民的合理要求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农民组织也在高压取缔下解散瓦解，但它唤醒了广大农民清醒地认识到不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就永远要遭受残酷剥削，这种反抗精神是日本殖民者永远无法征服的。

◎ 工人运动

日本占据台湾之后一直将台湾视为日本的农业基地，工业发展是相当缓慢的。1920年以后，台湾较大的工矿业和运输业中的工人只有20万人左右，大量的旧式的手工业工人和季节工。工人和其他劳动阶层一样，受到日本统治者的压迫和歧视，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压榨。即使干同种工作，台湾籍的工人只有日籍工人的一半。当时台湾工业不发达，工人人数又少，工厂规模也较小，所以工运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受到文协和台湾民众党的指导才逐渐起步。

从1921年台湾印刷工人成立第一个工会之后，各地工人也相继组织起来，如台北机器工会、基隆机器工会、高雄机器工友会、台湾船炭工会等。但这些工会都处在分散的状态。1927年1月，文协改组后，新文协决定走联络农组、组织工会的路线。退出文协的蒋渭水等人于7月组建了台湾民众党。民众党将支持农工运动作为其宗旨之一。在蒋渭水的推动下，民众党在全岛内进行演讲、座谈、参与解决劳资纠纷，并动员各业工人、店员组织工会，也争取一些中小企业雇主加入工会。民众党鉴于当时小工会团体林立，深感有必要将各小团体联合起来，以争取工人的利益。

1928 年 2 月 19 日，在蒋渭水等人的努力下，各地工会团体聚集于台北大稻埕宣布成立“台湾工友总联盟”。兰阳总工会、基隆船炭工友会、基隆店员会、基隆洋服工友会、台北土工友会、新竹木工工友会、台南店员工会、高雄机械工友会等 29 个工会（后发展到 40 余个）派出 130 余名代表，代表 6300 多名工会会员参加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工友总联盟的纲领，提出谋求工人、店员生活的改善，促进工人团体的发展，统一岛内的劳工运动等宗旨。在大会进行中，还组织代表分乘 50 多辆汽车上街游行，在当时很是轰动。由于文协也在组织工会进行联合，所以一些工会不肯加入工友总联盟，这也使总联盟的力量非常有限。



▲1928 年 2 月 19 日，“台湾工友总联盟”召开成立大会。

工友总联盟在成立后，即开始发动、指导下属工会开展工运。仅在成立后的一年多的时间，就进行了大小不等的罢工十九次。这些罢工的目标主要是要求增加工资，有半数的罢工达到了工人要求。这些罢工短的只有三五天，长的则持续五十天。人数最多、影响较大的当属在高雄的浅野水泥会社的罢工。

1927年底，位于高雄的浅野水泥会社借经济不景气解雇大批工人，却不给遣散费，这使工人十分愤慨。1928年3月，一位工人因被警察抓走而被工厂解雇，释放后他要求复职，为厂方所拒绝。当时该水泥厂的工人多加入高雄机械工友会，工会负责人黄赐发动工人支持他，而厂方借此开除41名工人。于是黄赐发动700多位工人在4月13日进行罢工。民众党蒋渭水等到高雄进行声援，并举行演讲，呼吁各界进行支持。会社反而变本加厉，又将178名工人开除。蒋渭水决定在工友总联盟设立专门机构，协助浅野的工人进行长期罢工。但是在5月13日，黄赐等30余名组织罢工的骨干被警察逮捕，工人群龙无首，罢工即告失败。

工友总联盟分别在1929年2月、1930年2月召开了第二、第三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中提出“谋求无产阶级”的解放，要求男女同工同酬，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必然为日本殖民当局所警觉。当局采取了打击支持工运的台共和台湾民众党的策略。1931年2月台湾民众党被解散。8月5日蒋渭水去世，台湾工友总联盟也就随之没落。

在民众党组织工友总联盟之际，文协在连温卿的领导下，也积极从事工会的组织，并在1927年3月，成立台北机械工友会。文协还积极支持和指导当时工人的罢工斗争，如1927年4月日华纺织台北办事处的罢工。其中以高雄铁工所的罢工

影响最大。

1928 年 4 月 3 日，高雄台湾铁工所的工人王风在文协的帮助下，组织成立了台南机械工友会。王风第二天就被厂方解雇。4 月 7 日，工友会组织铁工所的工人进行罢工。文协的连温卿等赶到台南进行帮助。4 月 17 日，厂方又将 121 名工人开除。文协即发动全岛的同情罢工以及其他声援活动，当时有 20 多个团体予以相应。罢工不但使铁工所也使其他工厂的资本家意识到工人团结的力量。一些台南机械工友会会员所属工厂的资本家，开始对支持铁工所罢工的工人施加压力；当局更于 4 月 22 日出动警察将在台南机械工友会馆集会声援铁工所罢工的工人逮捕拘留，并查封了会馆。王风由于受到警察的不断迫害，被迫流亡到大陆。在这种情况下，罢工最终失败。

由于民众党和文协之间的分歧，双方都各自指导和组织一批工会。民众党组织在台湾工友总联盟时，文协支持的工会却不予参加。1928 年 6 月，连文卿召集 25 个工会代表准备成立“台湾总工会”。但是在会上有人提出，既然已有工友总联盟，就不必再搞一个工会组织，免得分散力量。而文协内部这时又出现分歧，一部分人主张成立“台湾劳动运动统一联盟”。最后虽然成立“台湾劳动运动统一联盟”的提议获得通过，但是由于文协的内部不统一，最终没有能形成正式的组织。

比起农民运动来，台湾的工人运动显得在规模、声势、持续的时间方面都要逊色。这不仅是由于当时台湾工人人数少，分布分散等原因，而且由于文协的分裂，“工运”从一开始就成为不能很好地配合、相互支持的两个部分。这就使本来力量就小的“工运”一开始就和力量强大的资本家和殖民当局无法对抗。台共因组织过早地被破坏，对于“工运”也无法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在当时台湾各个阶层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

争中，台湾“工运”的抗争，可以说是岛内新兴起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社会力量。

台湾共产党的组建及开展抗日斗争

在日本统治者压迫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台湾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盘剥和压榨。台湾产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工农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代表其利益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同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洗礼和岛内外社会主义思潮的激励下，思想觉悟有所提高。伴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共产国际对殖民地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建立，给予重视与支持。共产主义理想在日本及中国的台湾学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些人倾向共产主义，有的人甚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翁泽生从厦门到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杨贵、苏新等人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部”，受日本共产党外围“东大新人会”指导。在这种背景下，由日共和共产国际筹划，在中国共产党直接指导下，台湾共产党成立了。

◎ 台湾共产党的筹建

1927年底，台籍青年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台湾青年“读书会”，开始进行台湾共产党的建党活动，这可以说是台湾共产党的前身。

1917年，谢雪红跟随丈夫到日本神户谋生，在那里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潮和进步人士，随之投身政治活动。1920年她返回台湾从事地下斗争。回台后不久，她加入台湾文化协会，

开展抗日活动。1925 年以后，她先后赴上海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苏期间，日本共产党领袖德田球一、渡边政之辅等刚好也寓居莫斯科，谢雪红和林木顺常去拜访、求教。1927 年 11 月，谢雪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参加台湾共产党建党的筹备工作，首先促成了上海台湾青年“读书会”组织的出现，以作为掩护。



▲台共重要领导人之一——谢雪红

与此同时，日本共产党总书记渡边政之辅，也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拟在台湾建立共产党支部。他们组织留日的台籍青年学生在东京草拟了台湾共产党的基本纲领，与谢雪红、林木

顺等人进一步磋商。由于当时的日本共产党忙于对付即将来临的日本国内大选，未能花更多的时间顾及台湾共产党的筹建工作，而台共的建党工作又不能拖延，必须迅速进行，于是共产国际指示：台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共产国际支部——日本共产党的民族支部，尽快建党，台共建党一事，应接受中共的援助和指导。据此，中共派出代表彭荣与朝鲜共产党代表吕运亨一起，协助台共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

◎ 台湾共产党的建立及活动

台湾共产党于1928年4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个神父照相馆里正式成立，并召开台湾共产党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包括林木顺、谢雪红、翁泽生、林日高、潘钦信、陈来旺、张茂良。林木顺首先致辞，中国共产党代表彭荣报告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和策略。林木顺报告了筹备大会的经过。大会推举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蔡孝乾、洪朝宗等五人为台共中央委员，谢雪红、翁泽生等为台共中央候补委员。大会通过了台共的基本纲领：（一）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台湾自治；（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一切财富——土地、企业、铁路、矿山和银行；（三）实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四）建立台湾地方的民主政府。大会还提出了农、工、青、妇、赤色救护会和国际问题等六方面具体纲领，提出了台共在台湾进行斗争的政治口号，如：反对日本在台湾的总督独裁统治，撤废“六三法”；反对欺骗的民意机关——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及州、市、街、庄协评会；撤废保甲制度及压迫人民的一切恶法；立即介入中国内政；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等等。后来台共基本上按大会

提出的纲领、口号开展斗争，因此被称为“真正代表劳工阶级的利益”。

4 月 18 日，当选的台共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了具体分工：推选林木顺为中央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来旺为东京特别支部负责人，谢雪红为日共联络员，翁泽生为中共联络员（驻上海），其他委员也都担任一定职务，当时台共只有 18 名党员。会后，有人返台，有人赴日，分别开展自己的工作。

日本当局获悉台共成立并派人赴日活动后，立即布置日本警察抓捕台共党员。赴日活动的台共成员得知险情后，即转上海等待时机，而尚未离沪的谢雪红等，因参加朝鲜“三一暴动”庆祝大会而被捕。这件事，历史上称台籍青年“读书会事件”。这是台共成立后经历的首次考验。共九位党员被捕，陈美玉在上海被释放，谢雪红、黄和气被捕后送回台湾审批，因证据不足，1928 年 6 月 2 日释放。其他六位党员被判刑两年。

获释后的谢雪红为了在台湾开展斗争，到台北与杨克煌等人以办国际书店为掩护，从事联络并发展台共组织。她与在台湾岛内的林日高取得联系，提出台共活动的具体方案；与台湾文协、工会组织、农民组合等取得联系，派出台共党员到上述组织中开展活动；派出代表到东京请示日共领导，取得他们的支持等。

台共组织者之一的林木顺，于 1928 年 8 月秘密自上海赴东京，与日共中央取得联系，9 月底在东京建立了台共东京特别支部。

1928 年 11 月间，根据日共的指示，台共组织进行了一次调整，蔡孝乾、洪朝宗、谢玉叶等人以“机会主义者”之名被开除。谢雪红转为台共中央委员，林日高为台共中央书记兼

组织部长，以此加强台共领导的力量。这事被称为台共“更生运动”，谢雪红等人被称为“更生派”。

“更生运动”后不久，在日本东京的台共党员也多返回台湾，在台共领导下开展抗日斗争。这前后，中国共产党则指示在台湾的中共党员，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台湾支部，目的在于进行抗日斗争，帮助台湾共产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

1929年以后，在更生派的努力下，台共组织发展很快，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由于一些台共党员表现激进，带有“左”的冒险倾向，很快引起日本在台统治者的注意。为了消灭台湾共产党和抗日力量，日本殖民当局早在1929年2月12日，出动大批警察、特务，进行全岛性的大检举。台湾各地文协、工会、农民协会及反日团体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各界反日爱国进步人士1000多人遭到搜查和逮捕。这就是台湾史上的“二一二事件”。敌人想把台共一网打尽，结果未达目的，一些台共党员继续采用激进做法。在这年的6月17日，日本台湾总督府举行占领台湾“始政”34周年庆祝会，曾为邮电工人的王万德写文章、印传单反对日本占领者，并介绍台共的方针政策，引起日本统治者注意。日本警察很快速捕了王万德，并准备进一步向台共开刀。

在这一重大打击下，一些台共党员产生了动摇。因台共遭到全面破坏，林日高、庄春火等人到上海与共产国际东方局联系，又没有得到及时指示，台共的工作遂由谢雪红全面负责。

1929年下半年以后，一些比较激进的台共党员，要求开展激烈的斗争，他们对持稳重态度的谢雪红表示不满，并由此发展成部分人对台共中央的不信任。为改变这种局面，谢雪红于1930年10月27日，在台北松山召开台共中央委员会扩大

会议，讨论台共在劳工团体中的活动问题，谢雪红坚持采取稳重态度。为此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反对，党内又开展了激烈的斗争。

王万德、潘钦信、苏新等人另组党内“改革同盟”，谢雪红基本没有了发言权。此后台共由“关门主义”转向“开门激进主义”。

◎ 台湾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

台湾共产党 1928 年《上海纲领》中指出：“党派往劳动运动前线去的党员要克服左派工会的谬误，暴露右派工会的欺瞒；使工会‘左’倾化，促进左、右两派共同战线的台湾总工会，再组织各种产业及地方性的细胞，通过日常斗争而吸取工人中的优秀分子成为党员，并使所有斗争转向由无产阶级领导方向，加入国际无产阶级工会，完成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台共开展了一系列工人运动。

一、矿工工会组织运动

台共党员萧来福潜入基隆的猴洞第三坑当矿工。7 月 16 日后苏新与庄春火也来会合。此后，萧来福在猴洞、苏新在石底工作，庄春火当联络员，开始行动。8 月，他们接到中央指令，成立“台湾矿山工会组织会议”，组织各矿坑的矿工，起草《矿山工会会则行动纲领》。1930 年 5 月，根据中央指令，成立“矿山工会准备会”。1930 年 7 月，石底第三坑的承包商潘宏水积欠矿工工资，矿工普遍不满。苏新动员矿工召开大会，要求发薪，并制定斗争方针。然而，无产阶级不是转业归农，就是屈服，第三坑的工人运动没有如愿搞起来。苏新一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他随后改变策略，介入矿工的具体斗争，

获得石底第一坑 40 多名矿工的支持，组成支部。1930 年 10 月，台共松山会议后，决定发行《矿山工人》机关报；11 月，苏新组织五堵林溪圳的共和炭坑支部，猴洞方面的萧来福也吸引百余名矿工成立支部。

二、高雄州的交通运输工会组织运动

1930 年 3 月，台共南区负责人刘守鸿，与农民组合的颜石吉、陈结等台共党员召开高雄地区会议，吸收孙古平等激进青年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并派遣这些青年渗透到工场、农村，奠定红色工会的基础。台共“党南区”在 1930 年 6 月改称“高雄支部”，9 月在松山会议奉命改为“高雄区”，并由庄守、颜石吉、赵港、刘守鸿、陈结等为高雄区委员，配合农民组合的运动，展开劳工运动。1930 年底，孙古平等已经组成“铁路工会高雄会议”，吸收叶天护、宫本新太郎等人参加。1931 年 1 月，随着台共“改革同盟”的成立，这个组织也改称“台湾交通运输工会高雄大会”，发行工场新闻。同年 3 月，利用两名工人被铁路局高雄场开除的机会，台共号召罢工。直到 7 月随着庄守等人被捕，这个运动随之结束。

三、高雄市苓雅寮草袋工场争议

这个地区有六家台湾人经营的工场，共有 207 名女工。其成品都由台湾肥料、衫源制肥等会社承购。1930 年末工场不景气，女工的工资被克扣，台共南区党员简娥、孙玉兰在 12 月期间，先后发动各场罢工。同月底，女工们又争取在厂内设置厕所，改善卫生条件，夏季供应茶水等事罢工。1931 年 1 月，李明德等人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市民支持。历经一个多月，女工们渐渐屈服，罢工以失败告终。

四、台湾印刷公司争议

1931 年 2 月，台北市的台湾印刷公司为降低不景气压力，

宣布每个月只工作二十二天。这时，王万得正筹组“台湾出版工会”，他们发动了 49 名员工罢工。公司宣布临时停工，以裁减掉“不良分子”。台共召开职工大会，向公司提《要求书》，并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持久战对策，派萧来福指挥罢工。公司完全拒绝工会的要求，并开除 5 人。2 月 9 日，48 名工人占据工场，第二天被警察包围，带走 39 人。11 日，王万德、杨克培、谢祈年等人召集工会代表 16 人开会，15 日起，他们散发《争议日报》《印刷工》《斗争》《红旗》等刊物，号召各行业的工人、市民支持。公司要求工人在 2 月 24 日以前复工，否则开除。陈树根等 18 人动摇，公司答应让八位拘留者复职，这次罢工失败。台共 3 月 9 日再号召罢工，公司则以开除所有职工相威胁，要求重新工作者答应新条件。3 月 18 日，共有 25 人复工，罢工结束。

五、石底矿坑罢工

1931 年 3 月，石底矿坑谣传要减少工资，苏新回台北与陈德兴商议，派谢祈年到现场支持。4 月 1 日，谢进入第一坑号召矿工罢工，第二、第三坑也支持，但业主却另雇新人入坑。双方僵持到 4 月 5 日，罢工失败。

◎ 台湾共产党后期的活动

表面看来，台湾抗日斗争形势一派大好，但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由“改革派”发起的这场内部斗争，使台共暴露了内部矛盾，既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也更引起日本统治者的注意。日本警察掌握了台共的内部情况和行动规律，看准时机向他们开刀。日本人在 1930 年就注意到台共的地下活动，1930 年底陈德兴由上海回台，1931 年初王梦森也潜回台湾，日本

殖民当局查知这是和翁泽生有关的行动，便暗中监视。1931年3月陆军节举行防空演习，在台北有人散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传单。事后警方搜查自首者王日荣的家，逮捕了作为共谋的林式镕，结果在林式镕家里搜到《致台湾共产主义者书》等证据，当局进一步了解了台共新中央的活动情况。1931年3月至6月，日本殖民者抓住线索，对台共进行“瓜蔓式”的大检举，许多台共成员和被怀疑为与台共有关的人员都被捕。谢雪红、杨克培、王万德、翁泽生等陆续被捕；到9月止一共逮捕160人，47人被判刑。

尽管台共组织因遭受当局迫害而瓦解，但一部分人仍坚持斗争。刘赞周在8月回到台湾时，谢雪红已经被捕，他联络张烂梅，并吸收林梁材等人散发传单，继续打起“台湾共产党”的旗帜。直到11月被捕。

隐蔽在宜兰的苏新，于1931年8月向东部地区负责人卢新发提示：（一）激发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吸收新血液，使党获得新生。（二）不论党中央的决议如何，开始解散文化协会各支部，并在此过程中扩大党的势力。

台湾共产党被检举后，其外围团体的文化协会、农民组合也被波及，无法继续正常活动。1931年8月，简吉、陈昆仑及文化协会的王敏川等人秘密开会，决定暗中联络没被捕的同志，并派人到大陆接触中共中央及东方局，请求支持。同时解散已经成为阻碍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协会，并停止农民组合的活动，将二者合并为“台湾赤色救援会”，透过救援会的活动来吸收和训练无产阶级大众。在1931年10月，台湾赤色救援会筹备组发出“救援文献”，号召勇敢的工人、农民、学生组织红十字军，救援白色恐怖下被逮捕者及其家属，并救援所有阶级里的被牺牲者。农民组合也秘密发出《青年部的任务及组

织》。从 11 月起，日警方不断展开搜捕行动，救援会的领导人纷纷被捕。到 1932 年 2 月，农组大湖支部刘双鼎等 92 人被捕后，台湾共产党的组织基本被破坏而陷于瘫痪。

台湾共产党虽然仅存在三年多的时间，但在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共产党员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为争取民族解放、反抗殖民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台湾共产党以反帝、反封建为纲领，并把民族解放运动和阶级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作为奋斗目标，是当时岛内最彻底、最坚强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

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

专制独裁的总督体制的建立

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半个世纪，是台湾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日本的野心和欲望及政策手段的狠毒，都远过于昔日的荷兰殖民者。尽管它的统治手法时有不同，或武力镇压，或政治防范，或经济剥削，或文化愚弄，其目的都是为了把台湾变成贯彻其殖民政策的基地。日本人在台湾的近代化建设方面虽有所建树，但却不是为了台湾人民，而是以日本的利害为中心。日本搞的是殖民地的近代化，是为了更有效地掠夺台湾；吸吮台湾的精血以滋养日本本土，榨取台湾的人力、物力，役使台湾，使台湾更好地为日本效劳；利用台湾的有利位置，作为南侵的基地。

日本的陆海军将领们认为，台湾是他们的战利品，应该成为保持军事利益的禁区，成为今后进行军事扩张的前哨基地。在军方首脑的心目中，台湾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占有首要地位，只有军事统治，才能确保台湾安全；只有军事统治，日本民间的工商业农林矿业的利益，在整个军事体系中才能得到发展；而台湾本地人的利益必须加以控制，以符合日本的军事利益。

日本统治台湾的机构是总督府。总督是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军事和行政首脑，是台湾的独裁王。总督的权限很大，可以公布命令以代替法律，有权颁布总督府令，有权指导军政及

军事行动，有权处理关税、铁路、通信、专卖、监狱及国家财政等特殊行政事务。

日本占领台湾 50 年，派出十九任总督。在 1895 年 6 月至 1919 年 10 月间，日寇为建立“殖民地体制”，用武力镇压和控制台湾人民的反抗，实行军人专政，派出的军人总督有桦山资纪至明石元二郎等七任军人总督；1919 年 10 月至 1936 年 9 月，日本殖民当局以为殖民统治已经稳定，为把台湾建成“理想的殖民地”，军人体制改为军政分立制，派出了田健治郎至中川健藏等九任文职总督；1936 年以后，为配合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又恢复为军人专政，派出小林跻造、长谷川清、安藤利吉等三任军人总督。不论文官武将，十九任总督集立法、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个个都是杀人魔王，手上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日据时期台湾历任总督一览表

任别	姓名	在任时间
1	桦山资纪	1895. 5. 10—1896. 6. 2
2	桂太郎	1896. 6. 2—1896. 10. 14
3	乃木希典	1896. 10. 14—1898. 2. 26
4	儿玉源太郎	1898. 2. 26—1906. 4. 11
5	佐久间左马太	1906. 4. 11—1915. 5. 1
6	安东真美	1915. 5. 1—1918. 6. 6
7	明石元二郎	1918. 6. 6—1919. 10. 26
8	田健治郎	1919. 10. 29—1923. 9. 2
9	内田嘉吉	1923. 9. 6—1924. 9. 1
10	伊泽多喜南	1924. 9. 1—1926. 7. 16
11	上山满之进	1926. 7. 16—1928. 6.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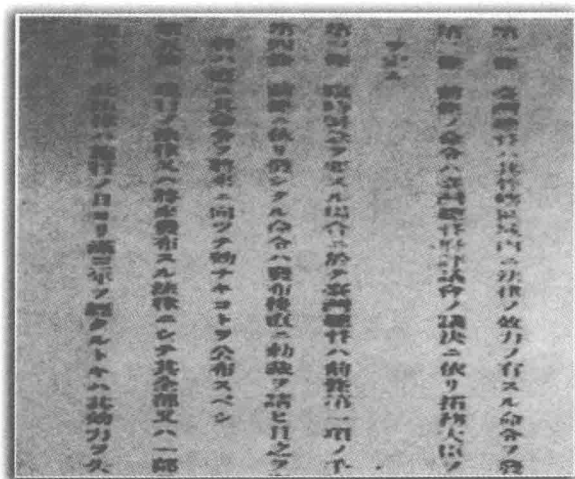
续表

任别	姓名	在任时间
12	川村竹治	1928. 6. 16—1929. 7. 30
13	石冢英藏	1929. 7. 30—1931. 1. 16
14	太田政弘	1931. 1. 16—1932. 3. 2
15	南弘	1932. 3. 2—1932. 5. 27
16	中川健藏	1932. 5. 27—1936. 9. 2
17	小林跻造	1936. 9. 2—1940. 11. 27
18	长谷川清	1940. 11. 27—1944. 12. 30
19	安藤利吉	1944. 12. 30—1945. 10. 25

日本在台湾实施残酷的殖民统治。总督府于 1896 年发布了《关于应在台湾施行的法令之法律》，这一文件编号为第六十三号法律，所以称为“六三法”。“六三法”总共六条，它成为日本统治台湾的基本法。此法确定台湾特殊化，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总督的独裁权力；主要内容是镇压抗日义军和剥夺台湾人民的基本权利。1906 年，颁布实质相同的“三一法”取而代之，两法没有根本区别，中国人遭受的苦难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沉重。

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主要靠军队、宪兵、警察维持，更多的是靠权大无边的警察管制社会和民众。1897 年，日本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制订了“三段警备法”。规定山泽地带的治安由军队及宪兵负责；村落的治安，由警察担当；山泽和村落之间，则由宪兵和警察共同戒备。这是一部由军队、宪兵、警察三者协力镇压统治台湾人民的殖民法。在日据时期，台湾民间吓唬小孩儿有一句惯语：“大人来啦！”所谓“大人”就是指当时的日本警察。1896 年，第一批日本警察到台。自此以后，以日本警察为主体的警察，成为伸入当地人日常生活的鬼

魔，是直接屠杀中国台湾人的刽子手。日本警察遍及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台湾成为名副其实的警察社会。以1902年为例，全台设有10个厅警察课、97个支厅、992个派出所，以后最多时各类警察机构达到1500余处，警察18000余人。在台湾的经济发达地区，每隔两三公里就有一个警察机构；每300人就配有一名警察。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可以说是日本警察的世界，在警察法西斯式的管制下，中国台湾人的基本权利都被剥夺。



▲图为“六三法”的有关条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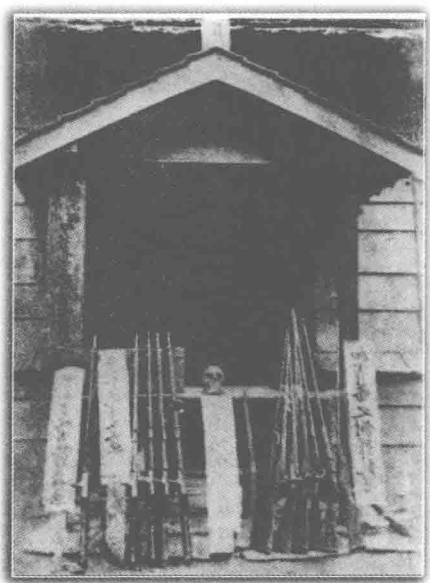
▲遍布台湾社会各个角落的日本警察网络

为维持殖民统治，对中国人的任何反抗和不满行为，日本殖民者一律予以残酷镇压。1898年，日本殖民当局颁发“匪徒刑罚令”，全文八条，该“令”专门镇压台湾同胞的反抗，日寇殖民者根据此令残杀了无数台湾同胞。在颁发“匪徒刑罚令”的同时，又实施“保甲条例”，规定保甲作为警察军事统治的辅助组织。条例全文七条，规定十户一甲，十甲一保，全保全甲内部连坐，保甲另外组织壮丁团，接受警察当局指挥、监督。到1943年，全台共设保6074个，设甲58378个，控制户数达50余万户；壮丁团团丁最高时达到134613人。保甲制度作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用“以台制台”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当地中国人，保甲制度成为法西斯统治的基础。

日本殖民者十分害怕中国人的反抗。在日本人秋泽鸟川写的《台湾匪志》一书中，把一切对日寇不满、反对日寇的人士和言行，都归入“匪”类，主张进行残酷镇压。在日本殖民当局的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随时都有可能被扣上“匪”的罪名受到迫害。

日本占领台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人民都没有停止反抗。对待台湾人民的反抗，日寇当局在运用“利诱招抚”“挑拨分化”策略的同时，也采取了残酷的屠杀镇压政策。在1896年“大平顶事件”中，屠杀3万人；在1901年“后壁林惨案”中，屠杀3473人；在1902年“噍吧哖事件”中，屠杀3万余人；在1913年12月间的“苗栗事件”中，屠杀1200余人；在1915年西来庵起义中，屠杀中国人数万人。据有的学者统计，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期间，被日寇残杀的台湾人达60万人。这对当时最多只有500余万人的台湾来说，可以说是空

前绝后的大灾难，日本军国主义欠下了中国人民无数永远也无法偿还的血债。



▲残忍的日本警察，在驻地门口展示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的兵械和被杀同胞的头骨。

除了残酷镇压之外，在日寇法西斯统治下，中国人毫无政治地位。以公务员为例，根据 1944 年的统计，台湾公务员总共 84559 人，其中中国人 46955 人。表面上看似乎中国人占 55%，事实上差别很大。任敕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简任官）的只有杜聪明一个，而且他只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并非行政官员；任奏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的荐任官）的只有 27 人，其中担任行政职务的只有 15 人；任判任官（相当于南京政府委任官）只有 368 人。除此以外，其余都是雇佣人员。在警察中，中国人只有六分之一，且警级没有超过“巡官”

的。因此，中国人只是担任低级职位和雇佣人员，供日本人驱使而已，成为日本殖民当局“以台制台、以台治台”的工具。

对台湾经济的疯狂掠夺

日本占领台湾后，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主导下，把它作为剥削和掠夺的对象。作为日本殖民当局法西斯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对台湾人民进行了敲骨吸髓的经济掠夺，增强日本的经济实力，为其侵略扩张作准备。

日本殖民者刚刚确立在台湾的统治之时，就立即下令展开森林、土地的调查工作，实行所谓“丈地归官”及“土地所有权申报”。凡是无主土地及手续证明不完备的全部收归官有，并对私人土地课以重税。这样一来，收成不好的土地则入不敷出，所有者也就不敢申请所有权。1895 年通过实施《官有林野取缔规则》，强占全台 94.15% 的山林原野。三年后，时任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设置“临时土地调查局”，颁布《台湾地籍令》《土地调查规划》，1901 年实施《土地征收规则》，1905 年实施《土地登记规则》，根据这些法令，日本总督府强占民田 2700 万亩，日本财团强占 200 多万亩，也就是说台湾土地的四分之三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占土地总面积的 68.5%。台湾的林地向来缺乏明确的主人，日本殖民者便无耻地宣布收归官有，这样，97% 的林地就变成了日本殖民者的私有财产。土地和林地向日本殖民者手中高度集中，殖民当局强占了绝大部分土地和山林后，对广大农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就土地税一项，1905 年收取地税 300 万元，1933 年高达 570 余万元。就粮食来说，1900 年稻米年输往日本 1400 吨，占当年台湾米生产总量的 0.46%；到 1934 年，年输入日本 51.5 万吨，占当年

生产总量的40%以上。大米主要输往日本，造成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因而有“饥饿输出”之称，致使许多的台湾农民破产、逃亡，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此外，台湾丰富的物产也成为日本掠夺的目标。以制糖业为例，殖民当局规定，蔗农生产的甘蔗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台湾蔗农由此成为了日本糖业资本家的奴隶，每斤糖的价格从1921年的11.6钱，下降到1937年3.2钱；每年90%以上的台湾糖输入日本。因此人们说：“一部台湾糖业史，就是一部日本殖民史。”而台湾糖业的命运也正是日本殖民掠夺下台湾农业、工业、加工业的缩影。在日本殖民者的眼里，台湾的即是日本的，必须无偿提供。

为垄断高额的商业利润，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行专卖制度，不仅食盐、烟、酒、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而且还把在日本国内禁止吸食的鸦片在台湾实行专卖，毒害台湾人民。当时，台湾的樟脑产量占世界产量的70%，日本殖民者也实行专卖。仅仅依靠对鸦片和樟脑的专卖，他们就攫取了高额利润。而因专卖增加的负担则分摊到台湾人民的身上。

为了搜刮台湾人民，台湾总督府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向台湾人民征收80种以上的苛捐杂税。1935—194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捐税收入占总督府收入的一半以上。1937年官方估计全台国民生产总值为8.9亿元，而同年仅总督府的收入，就高达2.03亿元。照此算来，国民生产总值每四元中，就有将近一元为殖民政府所攫取，其剥削程度之高为世界殖民史上罕见。

为了吸引和培植日本的垄断资本到台湾投资设厂，日本殖民者为他们制定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同时，加紧了对台湾民间资本的压制，使它们无法与日本资本竞争。比如，日本殖民者于1899年成立的台湾银行，借其发行纸币的特权和代理

“国库”的有利地位，控制了全岛的金融，吸收了大量的存款和游资，以低息贷给日本的财阀，而台湾的民间资本想获得贷款比登天还难。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台湾的民间资本，台湾总督府有时还用行政的手段进行干预。

台湾作为农业基地，每年都要向日本出口大量的农产品，而从日本进口的东西却很少，这样就形成了巨额的名义出超。据统计，1935年台湾对日出超9600万元，1939年则一跃上升为1.84亿元，几乎是1935年的两倍。而这些出超的余额，全部作为一种无偿贡赋留在了日本国内，这些都是台湾人民血汗的积累。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日本完全是为了在台湾建立殖民地经济。台湾只是日本淘汰设备、技术的集结地，台湾的大工业都为日本资本家独占，台湾工业是替日本工业制造初级产品和半成品，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日本在台湾的经济管理部门成为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魔鬼。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侵占台湾的50年，正是日本疯狂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时期，因此当时的台湾实际上是直接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原料、加工基地。

殖民同化 文化侵略

日本占领台湾，除搜刮和掠夺之外，就是图谋永久统治台湾，就是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从侵占台湾的第一天起，日本殖民当局就开始做起永久霸占台湾的美梦，大力推行殖民强制同化政策。

殖民同化政策之一是推行奴化教育。一是推行差别教育和普及日语。在初级教育阶段，重视日本籍学童，轻视中国儿

童，日本籍儿童就读的是“小学校”，中国儿童就读的则是“公学校”和“国（日）语传习所”及“教育所”（高山地区的原住民儿童就读），无论在什么学校，都把日语当作基本语言。二是防止中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从中等教育开始，限制中国学生所学专业；高等教育更是明显，日本学生占了绝对优势。日本人内心深处，并不希望台湾人接受高等教育，因为从荷兰、印度的例子中已经反映出被统治者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提高后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共学制实施前，在大专学校，当局只许台湾青年学医、学工，不准报考涉及意识形态的政经法文各学科。但有不少医生从治病转为“医治”社会，成为优秀的政治家。而且除了医学专门学校及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其他一切高等学校都在日本国内举行考试。共学制实施后，表面上台湾人与日本人有同等的权利，事实上却造成高等教育由日本人独占的有利条件。

中等教育入学比例台湾人已处劣势，程度又较低，升学考试相当不利，除医学专门学校和台南高等商业学校外，我们看到了台湾高等教育的畸形构成，以下仅举数例：1928年，台北经济专门学校有日生338人，台生70人；台中农林学校日生94人，台生5人；台北帝国大学日生49人，台生6人；1937年，台南工业专门学校日生178人，台生29人；台北经济专门学校日生229人，台生23人；台北帝国大学日生128人，台生59人；1941年，台中农林专门学校甚至出现日生160人，而台生仅1人的情形。《台湾民报》就此尖锐抨击道：“将台湾人所负担的租税，建设维持学校，然而受教育的恩惠的学生，不但是以收容在台的日本学生为主，甚至每年由日本内地大批移入学生。如此使台湾人负担经费，而教育由内地移入的学生，此岂非明了的教育的榨取。”

在1928年成立的帝国大学（台湾大学）内，20世纪40年代日籍学生占81.8%，中国学生只占18.9%。教学内容更是以传播殖民主义文化为主，有关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均在排挤之列，以从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殖民同化政策之二是推行“皇民化”。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压制台湾民众的爱国热潮，“培养忠良帝国臣民的素质”，把台湾建成进攻华东、华南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第17任总督小林跻造到任不久，即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1937年9月30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北市公会堂召开“（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讲演会”，臭名昭著的“皇民化运动”就此开始。主要内容是：进行亲日思想宣传和精神动员，极力消除台湾民众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思想。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皇民化运动”开始进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1941年4月9日，殖民当局成立了“皇民奉公会”。奉公会由时任总督的长谷川清兼任总裁，自总督府到街庄都设有分会，并且均由当地的行政长官负责。此外，还成立了奉公团、青年学生报国会、青年奉公会、女青年奉公会、产业奉公会、核心俱乐部、模国挺身队等名目繁多的外围组织，作为推行“皇民化”的社会基础和基本力量。

要想禁止一种文化，首先必须禁止相应的语言、文字。禁止汉语，强制推行日语是“皇民化”的主要内容。就在七七抗战前后，日本总督府下达了撤销全台学校汉文科、废止各种报刊中文版的命令，同时颁布相应的惩罚措施，强迫台湾民众学习、使用日语。台湾花莲厅还发布训令，规定公务场合如果不用日语者立即解职。在台湾许多地区，规定不学日语者征收过怠金。各种苛刻的惩罚禁令数不胜数，甚至如果买车票时听不懂日语，得到的回答是：“你不是皇民，买票要到后边去。”

在学校说一句汉语罚款一钱。日本殖民当局公开叫嚣：“绝对禁止使用台湾语和汉文，不满者滚回支那去。”禁止汉文汉字，是日本文化侵略中最毒辣的一招。

日本殖民当局在禁止汉语汉文的同时，也强行推行日语。1936年全台强制设有日语讲习所3832处，被迫参加的学生为205214人。1940年增加到15833处，学生763263人。到日本投降前夕，各地奉公班均开设夜间学习日语所，各类学生超过100万人，这表明在当时五名台湾民众中就有一名在学习日语。对居住在山区的原住民，日寇也不放过，强行推行日语，仅1939年间就设立日语讲习所265处，设立日语普及会11处。据有关资料显示，台湾的日语普及程度有所提高，1936年为32.9%，1940年达为51%，1944年则为71%。这是日本总督府的统计，虚假的成分很高。



▲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少数民族儿童强迫实行同化教育

“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

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以清除流行于中国人民中间的宗教活动。

宗教是日本殖民者促进皇民化的重要内容，为使台湾民众生活日本化，日本殖民者严禁信仰民间的各种传统宗教、神灵，烧毁台湾民间的诸家神灵，老百姓在家要奉祀伊势神宫大麻。每逢10月27日，在台湾各地就能看到这种情况，在日本警察、官员的监督下，台湾民众来到设在各地的神社参拜；1941年统计表明台湾奉祀神宫大麻739378尊，占到台湾总户数的70%。他们推行神社崇拜，专设日本的天照大神，在各地修建神社。日据时期台湾共有神社68个，其中38个就是在皇民化运动期间建的。中、小学则规定每月1日、8日、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男女老少均须敬神如仪。对于台湾固有的民间信仰，则采取寺庙整理、撤废等措施，只允许保留少量庙宇，其余的神像集中焚毁，美其名曰“诸神升天”。虽在长谷川清总督时期对此项政策略有放松，但经过了这次所谓整理，台湾的寺庙斋堂数目减少了约三分之一。祖先崇拜蕴藏着台湾人民对祖先神灵的敬畏和对祖国故地的怀念之情，日本人也曾将其作为善良风俗予以褒扬，但在皇民化运动中，却斥之为不利于以“天皇为中心之大家”的迷信活动，“妨碍了皇民炼成”而遭取缔。

在社会习俗方面，日本殖民当局下令撤销汉民族风俗，如传统节日的春节、中元节，及婚冠丧祭习俗，斥之为“弊风”，要予“打破”。家庭中则要使用日本式的风吕（澡盆）、便所、榻榻米，妇女必须穿日本和服；吃饭要吃日本料理；行礼要行日本90度的弯腰礼；结婚要在日本花嫁神前结婚；葬礼要采用大和安葬式。



▲殖民者在台湾建立的日本神社



▲被迫改穿和服的台湾妇女

为减少中华民族的色彩，日寇当局下令禁演传统的布袋戏、歌仔戏、歌谣，禁止汉文文学作品，组织演唱戏剧、青年剧、日本军歌等，“灌注大和魂”，宣扬日本精神、日本军威、国体明证、大义名分等。

日本种种统治口号的改变，目的都是为了加紧在台湾的掠夺。推行“皇民化”也是如此，日本借机加紧对台湾人民的欺骗和搜刮，宣扬“臣道实践”和“奉仕”，提出“全岛无一人不为圣战而劳动”，在产业领域组织起形形色色的“挺身队”“奉公队”，榨取工人、农民的劳动成果；强迫开展“金报国运动”，发行“奉公债券”“报国债券”，挨家挨户搜刮民间藏金。仅1944年，台湾负担的日本军费高达1.5亿元，这全是靠明征暗夺而来，成为日本维持全面战争的重要补充。

为彻底让台湾人民忘记自己的中国根，日本殖民者还在台湾实施改姓名运动。早在七七抗战爆发后不久，台湾总督府就曾策划允许部分台湾人改换日本式姓名，条件是该人家须为国语常用家庭，且在思想、宗教和习惯上都内地化（即日本化）了的。从20世纪40年代初期起，日本殖民当局又开始禁止中国人使用中国名字。1940年2月，日本殖民当局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表示本人提出申请，只要经过知事厅长许可，即可以改变自己的姓名。事实上，改用日式姓名运动，是靠政治高压强迫推行的。殖民当局设立“更改姓名推进会”，由警察胁迫改名，有一些汉奸当然求之不得，也有一些供职于殖民机构和日本人公司的人，因为生存的需要也跟着改名。在殖民者的淫威下，1941年间改名的有71875人，第二年年有约10万人。

日本殖民当局为加速推行“皇民化运动”，对于全天候使用日语和日本化生活方式的家庭，则奖赏其为“国语（日语）

家庭”，在当时紧张的物资供应下，享受比一般人更多的食物供给等优惠待遇，以从物质上进行诱拉。但是这个企图没有得逞。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是代表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台湾人民照旧在家庭、在社会讲自己的闽南话、客家话或高山族语言，使用本来的姓名，按本民族本地方的风俗习惯生活，抵制奴化政策，保卫中华文明，响应者寥寥无几。

在“皇民化运动”后期，配合日军的侵略战争，日本殖民当局还把征集当地青年参加侵略战争当作一项主要任务。1943年实施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1945年实施征兵制，由日本侵略者强征入伍、为日本卖命而战死的中国人达3万余人。至于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强征入伍的更是多达207183人，这还是根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实际上肯定超过此数。

台湾人民在大陆的抗日活动

台湾义勇队

台湾人民在大陆的抗日活动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复杂的时空环境，而呈现出与岛内不同的若干特点。其中，李友邦率领的台湾义勇队是最具代表性的台胞抗日团体。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1906年4月10日在台湾省台北县芦洲乡出生，祖籍福建同安。李家可谓满门忠烈，他的两个弟弟均因从事抗日活动而牺牲，妻子严秀峰也同他一起为台湾早日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奋斗。李友邦自幼具有强烈的爱国民族意识，他曾参加“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1924年他因和同学攻击台北新起町派出所被学校开除，逃离台湾返回祖国大陆，同年进入黄埔军校，并参加台湾革命青年团。

金华是浙赣铁路的重要枢纽。上海、杭州沦陷后，许多爱国人士汇集在此，当地也随之涌现出许多抗日救亡的团体，李友邦为主席的台湾独立革命党的总部就设在这里。1938年11月起，李友邦多次往返于台胞集中地浙闽两省，组织台胞并训练他们参加抗日工作。李友邦把集中在闽北崇安县的台胞分批带到金华，组建义勇队，广大台胞踊跃报名参加。

1939年1月20日，台湾义勇队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同年2月，在浙江抗日进步人士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抗日爱国

的台湾义勇队正式成立。义勇队的宗旨是：参加祖国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以求中华民族之自由解放；发展台湾革命运动，争取台湾之独立与自由。台湾抗日义勇队是台湾同胞唯一成建制的在大陆参加抗战的队伍，声势浩大的台湾义勇队是祖国抗战力量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从1939年2月成立，一直战斗到1945年中国抗战彻底胜利、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在李友邦的领导下，它坚持抗战多年，并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抗日活动，谱写了台胞抗日斗争极为光辉的篇章。

1939年2月至1942年夏，为台湾义勇队驻金华时期。这一时期，台湾义勇队主要是进行组织建设。1939年3月，组建起台湾义勇队第三支队，共约60人。经扩编，至1940年8月第三区队（支队改名）成立时有三个支队，九个分队，共有队员约200人。台湾义勇队队部设有总务组、指导训练组和宣传组，此外还有驻闽办事处和驻渝通讯处。义勇队下属的每一区队均负有特殊任务，如与国民党第十军前线部队并肩作战、组织医疗救护队、训练军事单位的台胞和士兵等。1940年6月，台湾义勇队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正式批准，李友邦被委任为少将队长。台湾义勇队以直属支队的名义隶属军委会政治部，在金华地区则归第三战区政治部（设在江西上饶）领导。

李友邦对义勇队治军严格，训练有素。每个区队的成立，都必须进行约两个月的集训。训练内容有基本理论的学习，包括三民主义、台湾革命史与台湾的革命现状、中日简史、世界历史、军事学科以及对敌工作研究、时事报告等内容；还有组织纪律、写作、对敌宣传的学习；以及各种军事训练，如情报、爆破、交通、电信、电报技术的学习；等等。义勇队负责

人李友邦等人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训练，队员们“才能有深刻的言论，机警统一行动和纯洁纪律的生活，这样才能完成时代给予我们的任务”。在台湾义勇队严格的军事训练下，台胞中涌现出许多人才。



▲义勇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李友邦将军

1942年至1945年底，是台湾义勇队驻龙岩时期。台湾义勇队此时在东南各省广泛地开展各种抗日活动，并经常来往于大后方重庆等地进行抗日联络。1942年，日军沿浙赣线进犯，

4月底攻陷金华。台湾义勇队坚持到最后时刻才奉命撤离金华。经四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0月中旬转移到目的地龙岩。龙岩位于福建西南方，四面环山，并且有重兵驻防，因此这里隐蔽和防守的条件较好。

在这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宣布废止一切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声明要收复台湾。根据这种局势的重大变化，台湾义勇队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训练对台湾工作的干部上。1942年11月1日，义勇队开始举办干部训练班。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受训的队员编组被派往闽南各地从事抗日工作。训练班到1944年共举办三期，参训总人数为60人。1943年1月，台湾义勇队又奉国民党的指令，在龙岩正式成立了“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义勇队分团”，李友邦任主任干事。

台湾义勇队在驻龙岩时期，队员又有大量的增加。1943年有301人；1945年达到381人，扩编为四个区队。台湾义勇队则改称“台湾义勇总队”。台湾义勇总队的抗日活动，“遍及前线、后方、敌后及沦陷区等四个地区”^①。

台湾义勇队主要在四个方面进行抗日斗争：

（一）抗日宣传工作。利用纪念会、报告会、出版书刊，以及通过无线电广播等一切机会和场合向大陆同胞宣传台湾的历史及收复台湾的必要性；号召台胞积极参加祖国抗战，推翻台湾的日本殖民统治。1943年春夏间，先后两次赴闽南沿海各地进行宣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们定期出版的《台湾青年》，激发革命情绪，揭发敌伪内幕，报道同盟国战况，影响颇大。同时还出版有《新少年报》《台湾壁报》《台青壁报》

^① 严秀峰：《台湾义勇队与抗战》，载《台湾史研究会会讯》1987年第2期。

《联合壁报》等刊物。

（二）对敌反战策反工作。由于义勇队队员在语言方面的优势，许多队员掌握日语、台语（闽南话），并对日军士兵包括在日军的台籍士兵的实际状况以及心理特点比较了解，因此，义勇队员常两三人为一组被派往前线的抗日部队、战地工作团，对敌进行政治瓦解工作。他们在前线教官兵用日语喊话和用日语唱反战歌曲，向官兵介绍台湾问题及在日本统治下台湾人民的生活状况。他们还在阵地直接用日语、台语向敌军喊话，与日方俘虏交流思想，教育感化他们；利用前线的无线电台向台湾进行广播；同时收听台湾、日本的电台搜集敌伪情报。他们还协助在敌伪军政机构中建立情报网，搜集各种情报。据统计，仅从1943年至1944年一年多的时间，台湾义勇队共为抗日部队提供有关敌伪的情报178件。^①他们还潜入敌占领区，散发反战传单、张贴标语……这些对敌工作，对影响敌军的作战情绪和瓦解敌人的战斗力起了很大的作用。

台湾义勇队还对厦门敌军发动了三次武装突袭。其中在1943年6月17日晚上，义勇队突然对日海军司令部发动进攻，投掷了数十枚炸弹，致使日军损失惨重。义勇队同时在厦门市内四处散发反战传单，造成敌方极大的恐慌。日军紧急封锁海岸，实行戒严，并出动全部敌伪军警进行搜查，使临近海岸线完全停航，交通陷于停顿。^②

（三）战地医疗服务工作。由于日本殖民当局的歧视政

① 林真：《台湾义勇队的筹组及在福建的活动》，载《台湾研究集刊》1991年第4期。

② 《台湾革命同盟会行动队在厦袭击敌伪消息》，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台籍志士在祖国的复台努力》，近代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

策，台湾青年学医者众多。他们利用自己的专长，为抗战服务。在台湾义勇队中，专门由20多位医生组成的第二区队致力于医疗方面的工作。而当时义勇队驻地的医疗机构极为缺乏，所以，义勇队一直将医疗作为主要工作之一。义勇队的医生赴各地作战部队及野战医院进行协助战地医疗，下乡作巡回医疗服务等。由于抗日军民大量需要医疗服务，义勇队在1940年7月在金华医疗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台湾医院”。台湾医院对当地军民提供了大量医疗服务。仅1940年的7月、9月、11月三个月期间，平均每月诊治患者达3000人次。他们还对抗日军属和贫民提供免费治疗，并为广大群众开展医疗保健服务，为1000多位当地民众注射霍乱疫苗，给小学教师开设暑期课程，讲授小学生的保健。

为了解决药品短缺的问题，他们还在金华建起药品制造厂，生产疟疾丸、痒疮敷药、皮肤膏、胃散等急需药品。生产的这些药品，一方面满足前线官兵的需要，另一方面还通过出售药品解决了全队的财政经费。1940年12月15日，台湾义勇队在金华以西的衢州开设了“台湾义勇队附设第三医院”。1942年秋，台湾义勇队转移至福建，在建阳又设立了第四台湾医院。义勇队的医生们利用看病之际还广泛地进行抗日宣传。他们精湛的医术和热心服务的精神，得到抗日军民的普遍赞誉。

（四）组建台湾少年团，培养后备力量。1939年2月，在台湾义勇队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少年抗日组织——台湾少年团。少年团在组织上隶属于义勇队，团长由李友邦兼任。起初台湾少年团只有六名少年儿童，都是随李友邦从福建崇安来到浙江金华的。至1943年，少年团已经发展为117人，团员大部分是台湾义勇队队员的子女，他们中年纪大的为16岁，最

小的只有8岁。组建台湾少年团主要是为训练台湾儿童，使他们成为台湾革命的继承者和新台湾的建设者。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少年团的团员一面继续学习文化、技艺，同时少年团还参加了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动。

少年团进行的抗日活动，主要是在前线刺探军情、传递消息，以及排练一些抗日节目进行抗战宣传，慰问抗日军民等。少年团活跃在浙东前线及闽、赣地区，他们在当地进行演出及抗日宣传，备受各界的欢迎。一次在崇安演出，竟聚集了1000多人观看。他们还到前线进行劳军演出，“把台湾人参加祖国抗战的意义，以及后方的工作，向将士们报告，再唱几首歌，给将士们一种精神上的安慰”。这些演出及抗日宣传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斗志，给抗日军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9年2月，台湾人李友邦在浙江金华组织成立台湾少年团，在浙闽一带参加抗日斗争。图为1939年台湾少年团合影。

除以上所述外，台湾义勇队在协助地方政府恢复和发展国

防生产方面，在加强与日本、朝鲜等反法西斯力量的团结合作方面，在促成大陆台胞抗日力量的统一方面都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台湾义勇队的队歌唱到“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逐出祖国，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当时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为这首队歌谱了曲。义勇队高唱着这支歌转战在各个战场，发挥着台胞在抗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东区服务队

在祖国大陆的广东东部地区还活跃着一支抗日力量，这就是由时任第十二集团军少将参谋的丘念台组织领导的东区服务队。

丘念台是台湾著名爱国人士丘逢甲的长子，在东区服务队的抗日活动中，丘念台起了巨大的作用。他1894年生于台湾县柏庄，适逢台湾因《马关条约》被割让给日本。其父丘逢甲率义军抗击日寇，失败后携全家回到祖国大陆，居广东蕉岭，当时丘念台两岁，名琮。丘逢甲为勉励儿子念念不忘台湾，立志从日寇手中收复国土，遂给儿子取名念台。他中学毕业后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丘念台在日本读书时，心系祖国命运，曾组织台籍学生的“东宁学会”，培养台籍学生爱国、抗日、自强、复台的民族意识。他还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在反对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和段祺瑞与日本人签订军事密约的学生运动中，两次罢课回国。



▲1938年，台湾著名爱国人士丘逢甲之子
丘念台在广东领导青年组建东区服务队。
图为丘念台（左一）与家人的合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丘念台放弃采矿工作，加入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多次到前线慰问将士。在天津曾与朱庆澜等策划并参加刺杀日军首脑土肥原贤二的行动，被熊希龄誉为“南方青年的健者”。此后，他在广州协同警察局多次侦破日寇准备侵略华南的汉奸网，取得了广东汉奸的全部名单。他还利用自己是台胞在相貌、语言上的特点，在日方谍报人员

中采取反间手段，获得了许多情报。1937 年曾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演讲，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的接见。此后便组织东区服务队进行抗日活动。

东区服务队成立于沦陷前的广州，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毕业的粤、闽籍学生为主要力量，后又吸纳了一些台籍青年，人数有三四十人。因为国民党认为服务队有亲共产党的倾向，所以很少给予经费上的支持。

东区服务队的主要任务是在惠、潮、梅所属的 25 个县中，宣传抗日、发展组织、训练民众。



▲东区服务队成员合影。他们在惠州、潮州、梅县一带进行前线民众动员及政治宣传工作。

1938 年秋广州沦陷前，东区服务队从广州撤出，队长率十余队员步行绕道西江、北江转向东江、韩江而到梅县，后在蕉岭县文福乡举办青年训练班，招收当地青年百余人，培养抗日骨干，意图将丘念台幼年生长之地作为群众运动的示范区。

青训班毕业生在全区办了许多夜校、武术馆、青抗会等群众组织，进行抗日宣传。

东区服务队于1939年6月到潮汕前线，当时该队属第四战区张发奎部下，因而协助当时在前线的华振中任旅长的独九旅训练由潮汕随部队撤出的青年学生200余人，并做部队政治工作和当地民众工作。

1940年春，东区服务队转移到惠阳，协助游击指挥所训练游击基干训练班的干部，并从事抗战宣传、群众组织、军队政工等工作，后驻博罗福田乡荔枝墩一带开展群众工作。终因经费无着，东区服务队队员乃分散在附近办学。1942年冬办成罗浮中学，并办有小学约数十所。

1943年秋，日军派一台湾高雄青年陈国章，由广州进入当时军事前线指挥地的惠州。当地我方情报人员注意到这个有嫌疑的外来者，并查得他是台湾人，并没有逮捕他，而将此事告知当时在惠州的丘念台，并要求协助调查。丘念台派了钟浩东等三名台湾青年和陈结识，后来探悉陈来惠州是奉日军派遣调查香港沦陷时撤退到惠州的英军服务团的情况的。丘念台遂约见了陈国章，向他说明抗日战争的形势、台湾的前途、台湾人应站的立场等等，最终使陈表示愿意为祖国效力。于是由丘念台提供一部分有关英军服务团情况的资料，以应付日军，陈则提供日军在广州的有关资料，并应允掩护东区服务队的人进入广州，策动在广州的台湾人举行抗日起义。陈回广州后，东区服务队曾两次派人潜入广州。第一次派钟浩东、李南峰、徐森元、邓慧等化装进入广州。当时在广州的台胞约两万人，而在日军中台籍军人也有2000人左右。他们在广州逗留六天，由邓慧作为丘念台的秘书，代表丘和在广州的34位台胞进行联系。他们曾在广州太平南一间日本人开的咖啡厅

里开会，讨论秘密发展组织及策动日军中台籍军人，拟进行起义。

由于他们的行动被日军察觉，因而台胞的行动受到更加严格的控制。此后，丘念台第二次派人进入广州与台胞联系时，大部分台胞却不敢接待了。因此这次不周密的起义密谋遂告夭折。陈国章后来被调到香港工作，仍与国内有联系，担任台湾省党部香港工作站的主持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陈的活动被日军发觉，人遭杀害。

国民党政府一直把东区服务队视为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不予支持，遂于1943年解散了该队，至此这支抗日队伍停止了活动。但由于丘念台被任命为国民党台湾党部委员和粤东工作团的团长，因此东区服务团的基本成员都转入粤东工作团继续参加抗日活动。

台湾革命同盟会

1940年3月，在各地抗日的台湾志士聚集重庆，酝酿成立了“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1941年2月10日，由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台湾青年革命党和台湾革命党五个团体联合，成立“统一台湾革命战线，增强抗敌力量”的政治联盟——台湾革命同盟会，全大陆台湾人抗日力量实现了真正的大联合。

台湾革命同盟会的宗旨非常明确：一是投身抗战；二是收复台湾。台盟会会章明确记载：“本会以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力量，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与祖国协力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为宗旨。”

台湾人民在大陆坚持抗日复台斗争的意义

自1895年《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为始，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辛亥革命之后，台湾人民在岛内的反抗斗争以不同形式进行。其中一些台胞辗转来到大陆，并在大陆坚持进行抗日活动，使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在祖国大陆开辟了新的战场，扩大了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影响力。但是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无论是岛内还是岛外，都没有被中央政府和大陆人民了解和实际支持，台湾岛内和祖国大陆处于半隔绝状态。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日本殖民当局大大加强了对台湾的高压统治，岛内进行有组织有规模的武装反抗，已经十分困难。但台湾人民推翻日本殖民统治、谋求台湾解放的信念并没有因此有所减弱。大批台胞历尽艰辛辗转来到大陆，加入在大陆成立的各种抗日组织，继续抗日复台斗争。这标志着台湾人民的抗日活动的主战场已经由岛内转移到大陆。

七七抗战后，日本全面进攻中国，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急。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已经成为大陆人民和台胞的共同目标。台胞的抗日斗争，自然也就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一部分。台胞的抗日斗争也就得到大陆人民的支持；大陆进行的抗日斗争，也同样得到台胞的全力支持。

限于当时的条件，大陆人民还无法对岛上台胞抗日斗争进行实际、直接的支持。但是，自抗战之后，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全国各界民众都对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给予了关注和声援。台湾人民获得解放，依赖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大陆人民的抗战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的主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对台胞抗日斗争的最有力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在大陆的台胞也全力投入抗战的各条战线，与大陆人民的抗战融为一体。但是在抗战之初，台胞参加抗日还是存在着不小的障碍。

在抗战之前，大陆的许多民众包括国民党的官员，对于台湾的情况知之甚少，对于台湾民众的了解也极为肤浅。1925年有两个不愿意接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台湾青年，历经千辛万苦才来到上海求学。他们在进入一所学校后，竟在校内引起轰动。学生们对于“台湾人”的见解莫衷一是。有的说“台湾人”是原始土人，有的说是半开化的野蛮人。在两个台湾青年搬入宿舍那天，学生们为好奇心驱使，将他们住的房间挤得水泄不通。宿舍管理人员的再三劝解也没有用，只好让学生们排队进入“参观”，才知道“台湾人”与大陆人是同文同种。上海当时是大都市，上海人都如此，其他地方的民众对于台湾的了解恐怕就更少了。

日本人为了离间台胞与大陆同胞关系，将一些卖身投靠、丧失民族气节的台湾人派往大陆，有的充当间谍，刺探情报；有的在大陆沦陷区日本扶持的伪政权中，充当要职，如伪满洲国的外交大臣谢介石、南京汪伪政府治安司令黄南鹏、厦门市秘书长张冠长、天津警务局秘书长张银乐等；抗战爆发以后大量的台湾青年又被征召入伍，派往大陆作战。一些台湾浪人以“日本人”的身份在大陆一些地区为非作歹。日本当局在宣传上还将台湾人称为“汉族出身之日本帝国臣民”。由于日本当局的险恶用心以及对广大台胞的不了解，国民党官员中不少人对台胞存有偏见，有的竟将他们视为奸细、汉奸，不问青红皂白就将他们监禁。如1938年3月，国民党福建当局突然决定“凡是台湾人，不分良莠，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抓走集中到福

建崇安县，从事拓荒开垦的劳役苦工。除供给简陋的食住外，凡生产所得，全部归属福建省政府所有……”除少数浪人外，大多数的台胞，都具有正当职业，如医生、药剂师、记者、老师以及工商贸易等。所以许多台胞为免遭无辜，就不得不改名换姓，冒充福建人或广东人。像在国民党中担任高级军职的黄国书、苏绍文、王民宁等，都是在日本投降后才敢承认自己是台湾人。这种偏见和隔阂的存在，对于发动广大台胞在大陆投身抗日，对于大陆人民支持台胞的抗日都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

中国共产党对消除这一障碍首先提出了正确的主张并做了积极的努力。中共认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要包括日本、朝鲜也一定要包括台湾人民。既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台湾人民在内，对台胞的一切歧视和偏见就应该消除。中共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对于台胞的抗日斗争多方给予报道，这对于大陆民众了解台胞起了重要作用。为了消除一些国民党官员对台胞的偏见，周恩来还具体指导李友邦在建立台湾义勇队的过程中，主动取得国民党官员了解和支持。在台湾义勇队得到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批准后，对台胞的抗日活动来说，可以减少许多麻烦，对一些持有偏见的国民党官员来说，也在对台胞的态度上有所转变。

台胞在抗日斗争中的英勇表现，也使更多的大陆民众对台胞的爱国精神有了深入的了解。台胞在配合军事进攻，瓦解敌军而进行阵地喊话，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义勇队突袭日军；台湾少年小小年纪，却积极从事各种抗战活动的精神；等等，都使人极为感动。一些国民党要员和各界知名人士如孙科、陈诚、陈立夫、冯玉祥、吴铁城、潘公展等都在公开场合对台胞英勇的抗日行动表示了钦佩和敬意。

各个台胞抗日组织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对于大陆各界了解台湾、了解台胞为抗日而进行的英勇奋斗，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演讲和出版刊物是台胞进行宣传的主要方式。仅在1939年的一年里，台湾义勇队的李友邦、张一之就在金华和桂林进行了十多场关于介绍台湾情况、台胞的抗日等内容的演讲。其中，李友邦在桂林新闻记者交谊会的演讲，在重庆国际广播电台的演讲，促使新闻界更加重视对台湾问题、对台胞抗日的宣传。台湾革命同盟会成立以后，这种宣传活动更加有声势。不但出版各种刊物、定期在电台广播，还举办有关台湾问题的集会。1942年4月5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举行的“台湾日”大会，各界名流、国民党的要员纷纷出席。与1927年国民党在清党时广东革命青年团等台胞抗日组织竟遭解散相比，此时的台胞及台胞的抗日活动的重要性在全国各界人民包括国民党要员心目中的地位已经有天壤之别。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台胞关于纠正大陆一些报刊误将台胞视为“异民族”、台胞对祖国抗日和台湾解放的目标是完全一致观念的解说，对于消除社会上特别是国民党一些人对台胞的偏见有重要的作用。由于大陆与台湾的长期阻隔等原因，抗战以后，“时常发现国内书刊将‘台湾人’当作另一民族（如称为‘弱小民族’便是其中一例）的言论”。在这种“异族”观念下，对台胞、台胞的抗日也就无法正确地对待和理解。针对这种错误的观念，台胞在演讲、发表的文章以及广播中，甚至以现身说法等方式，一再从台湾的历史、几十年来台胞英勇的抗日斗争、台胞对于回归祖国的信念告诉那些有偏见的官员以及广大民众，绝大多数台湾人是闽粤人的后裔，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日本统治下，台湾人民并没有屈服，抵抗斗争，前仆后继；在抗战期间，台胞更是积极参加抗战，希望祖国早日

复兴，帮助他们摆脱殖民统治、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台胞的这些宣传努力收到明显的效果，一些报刊对将台湾人视为“异族”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还有的报纸针对仍有台胞受到歧视的现象，建议“政府应通令全国，对来归台胞一律保护”等措施，“以温台胞归国之心，并鼓其抗日之志”。自抗战以来，一些台胞抗日组织及负责人，不断强调台湾的解放与祖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如台湾革命同盟会在成立宣言中宣称：“祖国与台湾在抗战建国上有不可分离之密切关系，祖国抗日胜利，故为台湾民众解放之唯一要素，台湾革命运动，对祖国抗战亦不能谓无裨益。”宣言号召台胞在祖国的旗帜下，“万众一心，戮力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以争取台湾民众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这种认识可以使广大台胞更加自觉地参加祖国的抗战，因为这是为他们自己的解放而战，也使大陆民众更清楚地认识到台胞参加抗日战争，不但是为台湾获得解放而战，更是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而战。台胞的这种认识当时广泛为大陆各界所接受，这对于纠正对台胞及台胞抗日的偏见，有重要的作用。

所以，正是在抗战中不断消除了对台胞的偏见和隔阂，祖国人民才能全力对台胞的抗日战争给予支持和声援，台胞才能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祖国的抗战洪流中去。当时在抗战的各个战线，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还是宣传、情报，无论是国民党中还是共产党中都有台胞在奋战。台胞与祖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融为一体。

台湾回归祖国的历程

《开罗宣言》和中国对台湾的接收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与日本投降

1943年，太平洋战争出现了转折。为了更好地打击日本，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邀请蒋介石到开罗就盟国间更好地合作以及如何处置日本进行协商。蒋介石率一代表团于11月21日抵达开罗。会场设在开罗西南15公里尼罗河西岸的米纳（Mena）饭店。当时参加会议的除了三国首脑，还有英美军的高级将领，如英军的蒙哥马利、美军的史迪威等。三方军事人员在如何对日进行军事打击上的配合等进行了多次商谈，并在经济、外交等方面也进行了协商。蒋介石也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进行会谈，最后对日本问题达成一致的决议。11月27日三国首脑正式签署《开罗宣言》。宣言明确声明：“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斗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中国的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自中国提出要收复台湾后，这是国际上第一次承认中国的要求，台湾的归属问题也就由此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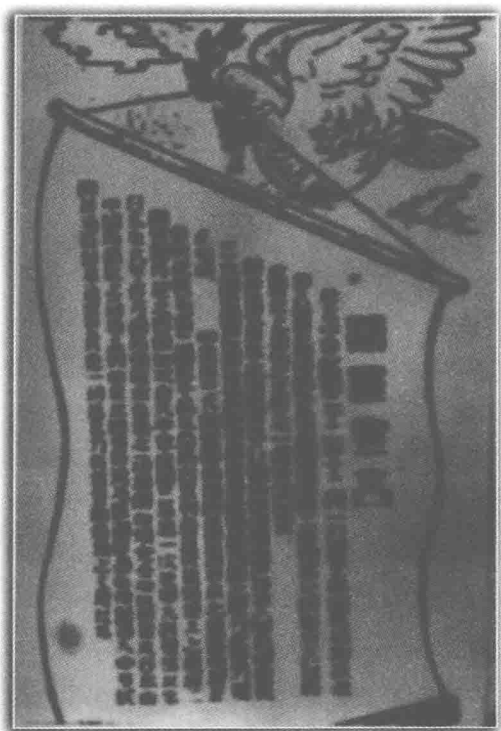
▲1943年11月27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正式签署《开罗宣言》明确声明：将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日本法西斯的失败，从它发动侵略战争的那一天就开始了。中国人民的持久战牵制和消耗着日本陆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太平洋战争的推进更是让日军丧失了太平洋上的空中优势。四面楚歌的日本法西斯挣扎着走进1945年。

1945年初的中国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和国民党指挥下的正面战场对日军展开了局部反攻，其势锐不可当；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为打通和保住在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在中国战场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由于大量兵力被拖在中国战场，日本无法将更多的军队派往南太平洋作战，其在战争中的劣势已经不可避免。日本为了摆脱在中国战场的困境，企图通过汪伪政权与重庆的国民政府媾和，结果失败。1945年6月

22日，美军攻下冲绳，将冲绳的日本11万守军全部消灭。冲绳的夺取，使美军已经打开了通往日本的门户。在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反攻作战取得胜利，一洗两年前兵败野人山的遗恨；而在日本本土，东京等城市在美军B-29轰炸机的“软化轰炸”下疲惫不堪。日本国内紧张万分。于是日本天皇派使者前往苏联进行斡旋，表示如能在避免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日本愿意进行和谈。日本和苏联在1941年签订过《苏日中立条约》，规定苏联在日美之间、日本在苏德之间保持中立。由于这个条约，苏联和日本还维持一定的关系。但是苏联对此反应十分冷淡，日本的希望又落空了。《波茨坦公告》的发表，使日本希望有条件与谈化为泡影。

1945年5月，希特勒德国被击溃之后，最后打败日本的问题提上议程。7月17日，美、英、苏、中等大国首脑再次聚会于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会上，根据对日战争的需要，美、英、中三国同意对日本发表公告，敦促日本尽快无条件投降。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宣布：美英中三国已调动强大的军队，“即将予日本最后之打击”，“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日本应以德国的失败为教训，应迅速抉择“是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之境，抑或走向理智之路”，迅速投降；在以下条件下，盟国同意给日本一次机会以结束战争：“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战犯“将处以法律之裁判”；等等。公告最后警告说：“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完全毁灭。”



▲盟军制作的空投传单，向日本占领区宣示《开罗宣言》的重要内容。

《波茨坦公告》是同盟国要彻底打败发动战争的日本，并对其发动战争的罪责进行追究和审判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下，不但中、美、英三国要给予日本进一步打击，苏联也于8月8日参加签署《波茨坦公告》，并决定对日本进行军事行动。

在《波茨坦公告》公布后，日本政府仍然表示要战斗到底。7月28日，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发誓军方要在本土进行“陆上特攻作战”，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从电台获知了这一消息。日本政府的态度使美国政府决定使用刚刚研制出来的原子弹对付日本。8月6日美国在

广岛、8月9日在长崎投下杀伤力极大的原子弹，造成了20多万人的伤亡。8月9日，刚从欧洲战场归来的百万苏联红军征尘未洗，长驱数万公里，突然出现在伪满洲国的地平线上，在中苏边界4000公里长的战线上对日本关东军发动进攻。日本遭到重大的打击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日本不能不对局势作出重新考虑。还是这一天，在延安枣园的窑洞里，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万里敌后战场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向日寇展开了最后一战。这无疑是日本法西斯深感漫长的一天。原子弹的震慑、苏联红军的重击、中国战场上的全面反攻，在准备举国“玉碎”的日本头上浇了一盆冰水。日本皇宫的防空洞内，御前会议从9日夜里开到10日凌晨。44岁的裕仁天皇最终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0日6时，日本政府分别电请瑞典、瑞士将投降之意转达中、美、英、苏四国，向同盟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提出的条件，并提出保留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权利的要求。“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8月12日中、苏、美、英四国对日本给予了回答，要求日本政府命令军队立即停火，派出代表与盟国签订投降书。8月15日中午，日本裕仁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向日本全国播出“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视距，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报”，宣布日本放下武器，向同盟国投降。

9月2日，日本向全体同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战列舰上举行。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及各同盟国的代表齐聚在一起。上午9时整，签字仪式正式

开始，麦克阿瑟发表接受日本投降的声明。9时4分，日本政府派被朝鲜抗日志士炸伤致残的外相重光葵、曾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的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9时8分，麦克阿瑟及包括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在内的各盟国代表在投降书上依次签字，日本投降生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标志着中国这一东方主战场历时14年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结束，标志着中华民族近百年来抗击外强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被日本侵占50年的台湾也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

《开罗会议》之后，台湾的归属问题实际已经明确，对台湾的接收工作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44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负责委员会的工作。调查委员会从事网罗人才和资料搜集，并对台湾实际情况的调查分析，还起草了《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这个纲要对如何接收台湾作了比较细致的规划。为了接收台湾，国民政府还举办了一些训练班，培训各类人员。在大陆的台胞有的也接受训练，准备在接收时派往台湾。

1945年8月29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行政长官。8月30日则公布了长官公署其他各部门的主管。9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9月20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取代了原先的组织大纲。条例规定，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接收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负责。9月7日，陈仪又被任命为台湾警备总司令，台湾行政长官拥有军政大权，这样做据说是因为台湾的情况较为特殊。自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在

大陆的台胞无不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大陆的台胞各组织也积极地配合接收。9月3日，李友邦派台湾义勇总队副队长张士德，随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尧乘飞机赴台，张士德在台北的宾馆升起第一面中国国旗。台胞也开始返回家乡。但是很多台胞返回故乡后发现家庭、亲人都遭到很大的变故。像李友邦的两个弟弟都已被日本人在狱中酷刑折磨至死。

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隆重举行。会场设在南京中央军校礼堂，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受降，日方投降代表为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日军各驻华部队的代表，包括日本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等七人。冈村宁次等在降书签字并接受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命令要求在华日军必须遵守的各项要求，其中包括台湾日军司令部必须将日军在台的数量、装备、工事以及其他方面的情况详细报告中国方面。

离散50年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不禁让人悲喜交加。国民政府接收人员尚未去台，台湾民众即自动争挂国旗，争学国语，自觉维持社会秩序，以实际行动响应接收。国民政府官员和军队赴台，均受到台胞欢迎。

10月25日，晨曦初露时，8点55分，乐队高奏胜利进行曲，身穿崭新陆军上将服的陈仪缓步走入大厅，他的身后紧跟着台湾警备副总司令陈孔达、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第七十军军长陈颐鼎、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日方投降代表安藤利吉等五人，则早已奉命到达，等候另室，听从传唤。大钟敲了九下，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葛敬恩宣布：“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开始。”安藤利吉为首的日本投降代表，在中方人员指引下，低着头鱼贯而入，至受降席前站成一排，向陈

仪行礼。陈仪命令他们在投降席坐下。中华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向日本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下达第一号手令：本官奉令“接受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之投降，并接收台湾、澎湖列岛之领土、人民、治权、军政设施及资产”。安藤利吉在签具的受领证中表示：对于本命令及以后之一切命令、规定或指示，本官及所属与所代表之各机关部队之全体官兵，均负有完全执行之责任。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举行。
图为受降仪式的会场。

至此，日本将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窃据的台湾、澎湖列岛交还中国的一切法律手续均告完成。陈仪随即声明：“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台湾终于回归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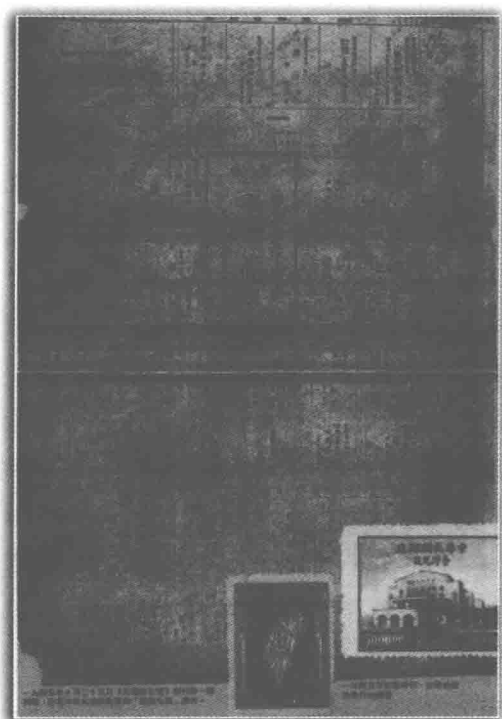
国，洗却了中华民族在甲午战争所遭受的奇耻大辱，是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大收获之一。受降典礼结束后，“台北40余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家家户户，欢欣无比，家家户户，祭祖谢神，向先民冥中告知台湾已归回祖国。”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立吉在投降书上签字

在日本殖民统治的50年间，台湾同胞誓不从倭，奋起反抗，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台湾同胞的抗日战争是悲壮的一部分。从1895年台湾被割让至1945年台湾光复，台湾同胞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斗争从未间断过，先后有数十万台湾同胞捐躯殉国。他们的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台湾民众五十年的抗日战争史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华民族不可侮！台湾抗日军民用自己的鲜血，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史谱写了悲壮而又光辉灿烂的篇章，充分体现了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10月25日，台北各大商号集资在《台湾新生报》创刊号头版登载的“庆祝台湾光复”广告。

台湾民众抗日大事记

1387 年（明洪武二十年）

在倭寇的袭扰下，明政府撤销台湾行政和防务的巡检司，移台湾岛上居民于漳、泉二州，实行海禁。

1563 年（明嘉靖四十二年）

明政府恢复澎湖巡检司，派兵驻守澎湖列岛，再次有力地抗击了日本的侵略。

1593 年（明万历二十一年）

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在侵朝过程中，派商人原田孙七郎修书致台湾居民，称台湾为“高山国”，令当地居民向日本纳贡，遭台湾人民冷遇。此后便有一些日本野心家和追逐利益的商人往台湾活动。

1603 年（明万历三十年）

日本侵扰台湾，明政府派沈有荣、陈第率军往剿，高山族首领大弥勒等到军前拜谒。

1608 年（明万历三十六年）

日本商人以来日本观光为名，带台湾的阿美族人到日本拜见摄政德川家康，了解台湾情况。

1609 年（明万历三十七年）

德川家康派有马晴信侵台，因遭到台湾民众的抵抗而失败。此后对高山族人的“招降”，也遭到拒绝。德川幕府时

期，曾派兵舰 13 只，侵扰台湾，一度侵入竹塹港（即新竹），因后援不济而失败。

1617 年（明万历四十五年）

日本侵略者入侵台湾龙门港。

1621 年（明天启元年）

日本侵略者踞台湾，“逐琉球人而放之”。

1628 年（明崇祯元年）

日本人滨田弥兵卫借口贸易，停泊台湾，阴谋占据，因与荷兰占领者发生冲突而返回。

1871 年（清同治十年）

12 月 发生“牡丹社事件”，台湾高山族居民误杀上岛避风的琉球国民，日本以琉球宗主国自居，乘机侵略台湾。

1873 年（清同治十二年）

3 月 四名日本人遭风暴漂流到台湾，获救后被送回日本，日本政府不但不感谢中国，反称这四人遭劫，为侵台制造舆论。

1874 年（清同治十三年）

2 月 日本政府通过《台湾蕃地处分要略》，成为日本侵台的纲领性文件。

5 月 7 日 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派遣侵略军 3000 余人在台湾社寮港登陆，进攻高山族村庄，遭到当地居民的坚决阻击。

8 月 31 日 清政府赔偿军费 50 万两白银，以求“牡丹社事件”的解决。

1875 年（清光绪元年）

日本迫使琉球王国与中国断绝关系，继而武力吞并，改为日本的冲绳县。

1886 年（清光绪十一年）

清政府设台湾省，刘铭传任巡抚。刘上任后殖产兴业，修筑铁路，设电报局、邮政局，对台湾发展贡献很大。

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

8 月 1 日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台湾戒严。台湾省会移至台北。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率军抵台，守卫台南。布政使唐景崧任台湾巡抚。

1895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3 月 26 日 日军侵占澎湖。

4 月 17 日 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割台凶耗传至台湾，全省悲愤，怒斥国贼，誓死守台。

5 月 10 日 桦山资纪被任命为首任台湾总督。

5 月 20 日 清政府勒令台湾巡抚及大小官员内渡大陆，决意放弃台湾。

5 月 25 日 地方绅民丘逢甲等创议成立“台湾民主国”，抗击日寇侵占台湾。唐景崧为“总统”，刘永福为“大将军”，丘逢甲为“义勇统领”，立年号“永清”。唐景崧电奏清政府：“今之自主，为拒倭计，免其向中国饶舌；如有转机，自仍归中国。”

5 月 29 日 日军在基隆之东的沃底登陆。

6 月 3 日 基隆失守。

6 月 6 日 唐景崧乘船逃回厦门。

6 月 8 日 汉奸李春生、辜显荣等迎日军进台北城。各地义军并起，刘永福发布抗日告示，全岛人民展开了英勇的武装反割台斗争。

6 月 17 日 桦山资纪在台北举行始政仪式，宣告日本在台

殖民统治的正式开始。

6月下旬 宜兰、新竹相继失陷。

7月下旬 丘逢甲内渡大陆。

8月 爱国官兵和义军保卫彰化，重创敌寇。南侵日寇一度被遏。

10月 受挫日军经补充修养分陆海三路大举南犯。清政府下令严禁资台。军民浴血奋战，3000多位壮士为国捐躯。

10月20日 刘永福退返厦门。打狗（今高雄）、凤山、台南相继失陷。

11月 日本宣布台湾“全岛平定”，发布台湾住民刑罚令、台湾住民治罪令和台湾监狱令，筹建台北监狱。

12月30日 陈秋菊、林李成、林大北、胡嘉猷等举行台北大起义，开展反抗日本侵据台湾的武装游击斗争。

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1月 抗日武装民众攻进台北，与敌激烈巷战。台北至淡水一线被民众收复，切断了南北交通电讯。日军对北部地区进行报复性“大扫荡”。

3月30日 日本政府颁布“六十三号法”，赋予台湾总督军事、行政及立法三权，在台湾实施总督独裁统治。

4月 抗日武装打击入侵台东卑南地区日寇。

6月 日陆军中将桂太郎任总督。

6—7月 柯铁、陈发等领导的抗日武装袭击各地日军守备队，全歼云林守备队，收复林圯埔、集集街、斗南街、荖桐、南投、北斗街、斗六和他里雾等地。柯铁在云林大坪顶地区建立抗日武装活动中心，大坪顶被称为“铁国山”。

8月 日总督府颁布台湾居民户口调查规则，以管制各地居民。

10月 乃木希典接任总督。日总督府颁布《犯罪即决条例》，镇压抗日民众。

12月 大坪顶抗日武装重创日军一个团的“扫荡”，半月后转移。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1月 抗日勇士率领太鲁阁高山族同胞起事抗日，日军两个营被伏歼。凤山抗日武装痛击日军守备队。

4月 抗日武装袭击东港及潮州。

5月8日 《马关条约》规定台湾同胞选定中国国籍最后期限。同日，台湾同胞渡海回祖国大陆的有7000多人。当日，简大狮、陈秋菊、詹振等率领抗日武装6000余人袭击台北，冲进市区，一度占领奎府街、大龙峒等地，表现出誓不作亡国奴的决心。

5月27日 台湾设台北、新竹、台中、嘉义、台南、凤山六县，宜兰、台东、澎湖三厅，于必要处设办务署。陈少白受孙中山之命入台建兴中会台湾分会。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2月 日陆军中将儿玉源太郎为第四任台湾总督。

3月2日 后藤新平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

6月20日 台湾设台北、台中、台南三县，宜兰、台东、澎湖三厅。

7月3日 制定台湾地籍规则、台湾土地调查规则，全面展开全岛土地调查事业。

7月 抗日武装围攻嘉义，收复周围49个村庄。

8月31日 日总督府公布实施保甲条例。

11月15日 日总督府制订《匪徒刑罚令》，对抗日者一律处以极刑，残酷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

12月 林少猫率领抗日武装3000余人袭击潮州、恒春。柯铁等抗日武装占据大坪顶。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1月 番仔山抗日武装英勇抗击日军围剿，苦战四昼夜后，转移到深山。

2月9日 中部起义领导者柯铁病死。

3月11日 北部起义领导者简大狮在福建漳州被清政府抓获，解交驻台湾的日寇，受尽酷刑后不久被处死刑。

9月 孙中山为筹备“惠州起义”，在台逗留40多天。

12月10日 台湾制糖株式会社成立，为台湾近代化新式制糖企业之始。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

2月 詹阿瑞率抗日武装攻入台中城内，散发抗日告示，号召人民“雪恨复清”。

11月9日 改革台湾地方官制，撤销三县及各办务署，全台设24厅。同月，抗日武装攻打嘉义朴仔脚，全歼驻地日寇官吏。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5月 日寇阴谋制订残杀抗日武装的“大扫除”计划。抗日武装领袖阮振、林少猫等被日寇诱捕杀害。台湾同胞抗日武装斗争转入低潮。同年，据日方统计，自1898年至本年林少猫牺牲为止，四年间，日寇杀害我抗日民众共11950人。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3月2日 颁布大租权调查委员会规程，逐渐取消大租权，确立小租户的单一土地所有权，以便厘清土地产权关系。

3月11日 公布台湾公学校规则。

5月 日总督府颁布《枪炮火药取缔规划》。

5月29日 设立临时台湾户口调查部。

6月8日 颁布临时户口调查规则。

12月 高山族同胞袭击苗栗洗水坑日警。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3月4日 栎社成立。同月日总督府颁布“三一法”，制订《浮浪取缔规则》。

4月11日 佐久间左马太任台湾总督。

8月 太鲁阁和大豹社高山族同胞抗击日警镇压，激战近一个月，毙伤敌人80多人。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5月 台北枕头山高山族同胞抗击日警镇压，激战三个月，毙伤敌人200余人。

7月 日军警疯狂镇压太鲁阁高山族同胞，将二社六部落全部焚毁。

11月 蔡清琳率众举行北埔起义，他们联合高山族同胞，袭击日警察支厅和多处分所，惩处了作恶多端的日本人。后蔡清琳等九人被日寇杀害。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6月 1500余名日警察镇压宜兰南澳高山族同胞。

1909年（清宣统元年）

自上年12月至本年4月，雾社等高山族同胞，猛烈反击日大批警察的镇压。

11月30日 总督府宣布在台废除中国传统阴历。

1910年（清宣统二年）

日本总督府制订五年讨“番”计划，颁布《番务监视规程》。高山族同胞奋起反抗。

10月3日 日本总督府制订《官有林野取缔规则》。

1911 年（清宣统三年）

2 月 11 日 台湾人组织的断发会在台北大稻埕开剪辫子。

3 月 28 日 梁启超抵台访问，在岛内知识界产生很大影响。

辛亥革命胜利，给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以巨大的鼓舞和影响。大安溪高山族各部落联合抗击日军警的围剿，斗争坚持一年，毙伤日军警数百人。

1912 年（民国元年）

2 月 25 日 台湾总督府禁止台湾本岛人及中国人单独组织株式会社。

3 月 爆发“林圯埔事件”。刘乾、林启祯响应辛亥革命，建立秘密组织，袭击林圯埔警察支厅，激战七天。

6 月 嘉义农民黄朝、黄老钳举行土库起义，号召乡民驱逐日寇，因泄密被杀害。

12 月 孙中山派同盟会会员罗福星等同志秘密到台湾，宣传抗日复台，回归祖国。罗福星组织陈阿荣等在南投聚集数百人建立抗日组织，事败被捕入狱，此事称为“南投事件”。

1913 年（民国二年）

1 月 20 日 总督府宣布今后在政府的命令、告示等文件后将不再附中文译文。

3 月 罗福星等发表《大革命宣言书》。

4 月 在罗福星鼓动下，张火炉等人以铁砧山、罩兰为据点，组织武装力量，不幸事败，张等 50 余位革命志士壮烈牺牲。此事被称为“新竹事件”。

6 月 大嵙崁溪上游高山族同胞拒交枪械，日总督亲率日军一团和炮兵队，及台北、桃园、新竹三处警察进行围剿。各社高山族齐起抗敌，战斗中日军伤亡惨重。

7 月 罗福星策动台南人李阿齐（又名阿良），到大目降

高山族同胞住区，宣传抗日，准备起义，因泄密而失败，被称为“关帝庙事件”。

8月 孙中山、胡汉民东渡日本经台湾，在台北下榻。

12月 罗福星发动“东势角事件”。赖来组织80多人起义，赖来在战斗中阵亡。同月，日警在全台大搜捕，罗福星等921名革命志士被捕，其中罗等200余人被杀害。此事与南投事件、新竹事件、东势角事件、台南关帝庙事件等并称为“苗栗起义”。

1914年（国民三年）

6月 罗阿头、罗狮、罗陈集合数百人起义。同月，日总督佐久间亲自指挥万余军警进攻太鲁阁，高山族同胞奋勇迎敌，苦战90天，毙伤日军300余人，佐久间坠崖身亡。

12月20日 日本明治维新元勋板垣退助与台湾士绅林献堂等共组台湾同化会，部分进步台人试图借同化会之名谋求平等及参政权，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民族运动于兹发端。

1915年（民国四年）

3月 台北新庄人杨临等70余人密谋起义，事败，杨等被日寇杀害。

5月1日 安东贞美任台湾总督。

5月 西来庵事件（又称噍吧哖起义）。余清芳、江定、罗俊三人为首领，率领数千民众起义。

7月，起义军队进攻噍吧哖（今台南玉井乡），全歼甲仙埔、大邱园、小张犁、阿里兰等地日警。起义被日军镇压下去，1000多人被日寇判为死刑，这在世界审判史上是罕见的。

1918年（民国七年）

6月6日 明石元二郎任台湾总督。公布临时国势调查部

规则，开展国势调查。同月，孙中山东渡日本，途经台北，逗留一夜。

7月 蔡惠如、林呈禄、彭华英等联络在东京的中国学生马伯援等成立声应会。

1919年（民国八年）

1月14日 台湾教育令颁布。

8月19日 修改总督府官制，将原“总督为亲任，以陆海军大将或中将充任之”改为“总督为亲任”，为以后武官总督向文官总督转变铺垫。

10月29日 首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上任。

12月15日 桃园大圳举行开工典礼。

1920年（民国九年）

1月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留日台籍学生在东京成立“新民会”，并创刊《台湾青年》杂志。林献堂、蔡惠如任正副会长，会员百余人。同年参加“新民会”的台湾学生在东京成立“台湾青年会”。

4月10日 改革文官制度，废止佩剑。

7月27日 实施地方制度改革，设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五州，台东、花莲二厅，台北、台中、台南三市，及四十七郡，155个街庄。

11月5日 连横著《台湾通史》上册发行。

12月16日 台湾“国势”调查之结果，全台总人口为3654398人。

1921年（民国十年）

1月26日 严格限制两岸人员往来的《清国人台湾上陆条例》直至已是民国十年的这一天，才告取消。日本殖民者控制两岸交往之严历于此可见一斑。

1月30日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向日本国会提出，林献堂等173人签署，要求设置由台湾人组成的台湾议会，有权决定台湾地方事务。

10月 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成立。这是民族主义重要启蒙文化团体，主要成员有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洪元煌、林幼春等人。在该协会影响下，台湾各地青年相继组织各种文化团体。文化协会宗旨标榜为“助长台湾文化之发达”，实为台湾社会各阶级与阶层的联合反日统一战线组织。

1922年（民国十一年）

1月 旅居北京的台湾学生成立“北京台湾青年会”，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为名誉会员。大陆各地的台籍学生也纷纷成立学生组织，广泛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2月6日 公布台湾教育令，中等教育以上学校日台人教育体系双轨制基本取消。

4月10日 《台湾青年》杂志改名为《台湾》。

1923年（民国十二年）

1月8日 日本台湾总督府宣布实施《治安警察法》，镇压台湾同胞的政治活动。

4月6日 内田嘉吉任台湾总督。

4月15日 《台湾民报》在日本东京发行，为旬刊。

4月16日 日本皇太子裕仁访台，并给御用汉奸辜显荣等授勋。

7月15日 东京台湾青年会文化讲演团成立，同月23日在彰化开讲。

8月 台北青年会成立即被查禁。

11月8日 汉奸辜显荣受日总督之命，拼凑“台湾公益会”，以对抗“台湾文化协会”。

12月16日 日本殖民者以违反《治安警察法》为由，进行全岛大检举，逮捕台湾议会同盟成员，蒋渭水等被捕入狱，此即震惊一时的治警事件。

1924年（民国十三年）

6月 上海台湾青年会组织集会，散发“勿忘此耻”传单。

7月 台湾文化协会在台中召开群众大会，揭露台湾公益会充当日寇汉奸的丑恶行径。

9月1日 伊泽多喜男任台湾总督。

11月21日 张我军在《台湾民报》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一文，新旧文学之争开始进入高潮。

12月20日 李应章等在二林庄成立农民讲座，台湾农民运动渐次开展。

1925年（民国十四年）

1月27日 林本源制糖会社蔗农选举代表与会社交涉提高甘蔗收购价格，维护蔗农利益。

3月 台北5000余人在台北文化协会举行孙中山逝世追悼大会。

5月1日 凤山小作组合成立，台湾佃农组织起来对抗大地主随意退佃的行为。

6月1日 台北市洋服工人成立洋服工友会。同月，彰化县北斗郡下二林等四庄的蔗农反对日本殖民者的剥削压榨，成立蔗农组合总会，组合员约500人，李应章等为理事。后被强行解散，多人被起诉判刑。

10月 林本源制糖会社强制收割甘蔗，与蔗农发生冲突。同月23日，日警大搜捕，史称“二林事件”。

11月15日 凤山小作组合改称凤山农民组合，简吉任组合长。

1926 年（国民十五年）

6 月 台湾农民组合筹备委员会在凤山召开会议。

8 月 16 日 上山满之进任台湾总督。

10 月 为抗议日本人歧视，台北商工学校台湾籍学生全体罢课。

1927 年（民国十六年）

1 月 3 日 台湾文化协会分裂，新文化协会指导方针更为激进。

3 月 在郭沫若等人影响下，广东中山大学等台籍学生组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发表《告中国同胞书》，呼吁：“台湾乃中国之台湾，民族乃中国之民族，土地乃中国之土地。”同月，台湾中坜、桃园的佃农成立农民组合会，展开抗缴租谷的斗争。

4 月 6 日 台湾市 2000 位人力车夫和嘉义修理厂工人分别举行罢工。

7 月 10 日 蒋渭水等人脱离台湾文化协会，另组台湾民众党。

8 月 1 日 《台湾民报》在台湾岛内发行。

11 月 台湾文化协会组织新竹市数百名群众游行示威，抗议日警暴行。

12 月 台湾农民组合举行全岛第一届大会，成立了全台领导机构。农会会员迅即发展到数万人，农民运动蓬勃展开。

1928 年（民国十七年）

3 月 在台湾民众党影响下，台湾工友总联盟成立。

4 月 14 日 高雄浅野水泥厂工人罢工，抗议资方解雇工人领袖，要求改善工作待遇。同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帮助下，台湾籍共产党人在上海举行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第一

次代表大会，建立党的组织。

6月16日 川村竹治任台湾总督。

7月7日 总督府设立高等警察，监视台湾人民的思想及言行。

8月 日警查禁中坜、桃园两地农会，农会涌到警察派出所，捣毁其门窗。

12月 台湾农民组合召开第二届大会。大会号召台湾工人、农民和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团结战斗，反击日寇的镇压。

1929年（民国十八年）

1月13日 民族资本金融事业实体大东信托成立，林献堂为社长。

2月 日警疯狂镇压台湾农民联合会，总部及各地支部200多名领导者和干部被捕。同月12日，日本殖民当局突然出动全部警察、特务在全岛大搜捕，文协、工会、农会等组织的成员1000多人被捕下狱。此即“二一二”事件。

6月 国民党当局拒绝台湾民众党代表赴南京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同月，上海台湾青年团成立。

7月30日 石塚英藏任台湾总督。

11月 台湾文化协会在彰化召开代表大会，改组领导机构，修改纲领。

1930年（民国十九年）

1月2日 台湾民众党抨击总督府的鸦片政策，通电国际联盟。

1月9日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的著作《日本帝国主义下之台湾》被禁止在台湾发售。

2月 台湾工友总联盟在台北召开联盟大会，号召“拥护中国工农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被日警强行

解散。

3月29日 《台湾民报》改为《台湾新民报》。

6月21日 《伍人报》创刊，后改为《新台湾战线》。

8月23日 林献堂、杨肇嘉等人创立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10月 台湾籍共产党人在台北召开会议，提出要在工农民众中积极开展活动的方针。

10月27日 爆发震惊中外的雾社起义。

11月 台湾共产党成立赤色总工会。

1931年（民国二十年）

1月16日 石塚英藏因雾社起义引咎辞职，2月4日太田宏政继任。

1月27日 台湾共产党人在凤山成立改革同盟。5月，改革同盟领导人在淡水召开台湾共产党第二次临时大会。

2月18日 日本总督府取缔解散台湾民众党。

4月 上海台湾青年团改名为上海台湾反帝大同盟。

6月 日警在台湾境内搜捕共产党人，许多领导人和党员被捕，革命转入低潮。同月，厦门反帝大同盟台湾分盟成立。

8月15日 蒋渭水逝世。同月，台湾话文论展开。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1月1日 《南音》半月刊创刊。

3月30日 南弘任台湾总督。

4月15日 《台湾新民报》正式改为日报，为台湾人经营的唯一汉文日报。

5月27日 中川健藏任台湾总督。

11月28日 总督府下令禁止开设汉文书房，台湾人不得公开学习中国语文。

1933 年（民国二十二年）

7 月 15 日 《福尔摩沙》创刊。

10 月 25 日 台湾文艺协会成立。

1934 年（民国二十三年）

7 月 汉奸辜显荣被天皇特任为日本贵族院议员。

9 月 台湾总督向林献堂等下令，停止“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中紫云寺道士曾宗组织众友会起义，失败。爱国青年郑清水只身潜入日本基隆警察署，炸毁部分建筑物，炸伤两名日本人，即为“基隆爆炸事件”。年末台湾人口总计 5194981 人。

1935 年（民国二十四年）

4 月 1 日 台湾总督府公布自治律令，修正台湾街庄制，11 月正式进行半官选半民选的街庄议员的选举。

1936 年（民国二十五年）

3 月 “埔里社事件”，南投埔里几十名高山族青年袭击日警察所，击毙两名日警，并散发抗日传单。

5 月 台北二中发生针对日本人的袭击事件，也称“红毛巾事件”。其主要参与者组织了“中国急进青年党”，进行反日活动。

6 月 17 日 林献堂因祖国事件遭日本浪人殴辱。

9 月 2 日 小林跻造任台湾总督，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和南进基地化三大政策目标。

1937 年（民国二十六年）

7 月 七七抗战爆发，日本宣布台湾进入“战时体制”，强化对台湾的法西斯统治，强制推行“皇民化运动”，同时禁用中文。

11 月 宜兰等地 700 多位矿工集体暴动，反抗日寇迫害。

1938 年（民国二十七年）

日本殖民当局设置“经济警察”，推行其经济政策。

1 月 23 日 台湾实施志愿兵制。

4 月 1 日 实施中日事变特别税令，开征新税，强化税收征管。

5 月 5 日 台湾实施国家总动员令。

10 月 高雄、六甲等地相继发生反战暴动。同月，广州沦陷前，抗日志士丘念台等组织“东区服务队”，在惠、潮、梅所属的 25 个县中，宣传抗日，发展组织，训练民众。

1939 年（民国二十八年）

2 月 22 日 台湾民众的抗日组织台湾义勇队成立，以李友邦为队长。同日，在浙江金华成立了台湾少年抗日组织——台湾少年团，李友邦兼任团长。为驱使台湾同胞充当其侵略战争的炮灰，日本殖民当局颁布《国民征用令》。

3 月 13 日 千余名被征台湾壮丁，在高雄“哗变”，600 多人被杀害。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事件发生。

1940 年（民国二十九年）

2 月 11 日 颁布台湾户口规则修正令，在台湾开展强制改换日式姓名运动。

4 月 青年教师李钦明、李启明兄弟，组织成立“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事败，李氏兄弟被害。台湾总督府为推行改姓名运动，改订《户口规则》。

11 月 25 日 《台籍民改日姓名促进要纲》颁布，进一步强化改姓名运动。

11 月 27 日 长谷川清任台湾总督。

1941 年（民国三十年）

2 月 11 日 《台湾新民报》改版为《兴南新闻》。

同月 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成立，并发表宣言，号召台胞参加抗战。表示只有光复台湾，抗战才能胜利；只有协助祖国抗战，台胞才能获得自由解放。

3月26日 公布修正台湾教育令，废止公学校、小学校的区分，统一改为国民学校。

4月19日 成立皇民奉公会，将台湾社会方方面面强制纳入皇民奉公体系，皇民化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1月 原台湾文化协会成员吴海水等200余位知识界人士不满日寇统治被捕下狱，多人惨死狱中，是为“东港事件”。

12月8日 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9日 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公告废止中日间所有条约及合同，导致台湾割让的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包括在废止之列，并严正声明要求收复台湾、澎湖等失地，洗雪国耻。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西川满、滨准隼雄、龙瑛宗、张文环等出席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日本殖民当局以“密谋组织抗日起义”之罪逮捕煤矿巨商李建兴和500多位矿工。

2月17日 长崎浩、斋藤勇、杨云萍、周金波出席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5月21日 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

11月13日 台湾文学奉公会在台北召开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会后推动作家深入地方，创作决战文学。

11月23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蒋介石会谈纪要称：双方一致同意，日本以武力夺取的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

必须归还中国。

11月27日 《开罗宣言》发布，国际社会公告日本以武力从中国非法掠夺去的台湾、澎湖群岛必须归还中国。

12月1日 中、美、英三国签署《开罗宣言》，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台湾总督府进一步强化新闻管制，将岛内《台湾日日新报》《兴南新闻》《台湾日报》《高雄新报》《台湾新闻》《东台湾新闻》合并为《台湾新报》。

1月 日本在台湾各地的“皇民练成所”，强制推行同化台湾同胞的政策。

5月5日 谢娥等人密谋反日，暴露后许多学生被捕，被称为“台北二中学生与谢娥的反日事件”。同月，台北高等商业学校学生雷灿南密谋起义，事泄被捕，英勇牺牲。同月，台北帝国大学学生蔡忠恕等200余人密谋起义，准备收复台湾，迎接抗战胜利。日本宪兵突然进行大搜捕，蔡死于狱中。

8月20日 台湾实施征兵制，日本殖民者企图让台湾人民为天皇“玉碎”。

9月 日本实施《台民征兵制度》。

12月30日 安藤利吉任台湾总督。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4月3日 随着殖民地政治待遇改善的实施，林献堂、简朗山、许丙获选日本贵族院议员。

6月17日 废除保甲制度，封建保甲制度到了这时才废除，充分反映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不信任，体现了殖民

统治的残暴本性。

7月26日 中、美、英三国签署《波茨坦公告》，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洲、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8月15日 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9月1日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在重庆成立，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

9月2日 日本签署投降书。《日本投降条款》规定：日本政府“承担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

9月3日 中国陆军第七十军的先头部队第75师在基隆登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先遣人员“前进指挥所”抵台。

10月25日 台湾地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台湾宣告光复，重回祖国怀抱。

11月2日 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全体成员抵达台湾。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1月12日 中国政府宣告：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以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1945年10月25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

1958年

日本战后首次修改教科书，鼓吹甲午战争的成果，遭到岛内外中国民众的抗议。

1971年

1月 2500多名留美台湾学生在纽约游行，第一次喊出“中国领土钓鱼岛不容侵犯”。

1982年

中曾根康弘以日本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开日本高级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先河，引起岛内外华人抗议。

1992 年

首位台籍“慰安妇”公开身份，揭露日军暴行，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

1996 年

中国台湾保钓人士金介寿与香港人陈裕南、曾健成一同登上中国领土钓鱼岛。

2002 年

日本新版历史教科书中，大量删除有关“慰安妇”“南京大屠杀”和“三光政策”的记录，并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台湾岛内民众强烈抗议。

2003 年

9 月 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的保钓人士，第一次共同携手，保卫钓鱼岛。

资料来源：《台湾民众抗日史》《台湾抗战五十年》

参 考 文 献

- [1]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 [2] 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编：《台湾同胞抗日五十年纪实》，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8 年版。
- [3] 蓝博洲编著：《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一九一三～一九四五）》，海峡学术出版社 2006 年版。
- [4] 安然：《台湾民众抗日史》，台海出版社 2003 年版。
- [5] 戚嘉林：《台湾史》，海南出版社 2011 年版。
- [6] 薛军力、徐鲁航：《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 年版。
- [7] 楼子芳：《抗日烽火中的台湾义勇队》，世界综合出版社 2003 年版。
- [8] 陈正平：《李友邦与台胞抗日》，世界综合出版社 2003 年版。
- [9] 杨克煌：《台湾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小史》，海峡学术出版社 1999 年版。
- [10] 黄秀政、张勝彦、吴文星：《台湾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2 年版。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习近平

日本图谋侵华七十多年

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八年

3500 万中国人伤亡！

中国人民和军队英勇抗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诗篇！

让前辈告诉子孙，让历史告诉未来——

和平来之不易，悲剧绝不能重演！

ISBN 978-7-5162-0928-8



全套定价：370.00元